文化百科丛书

舊都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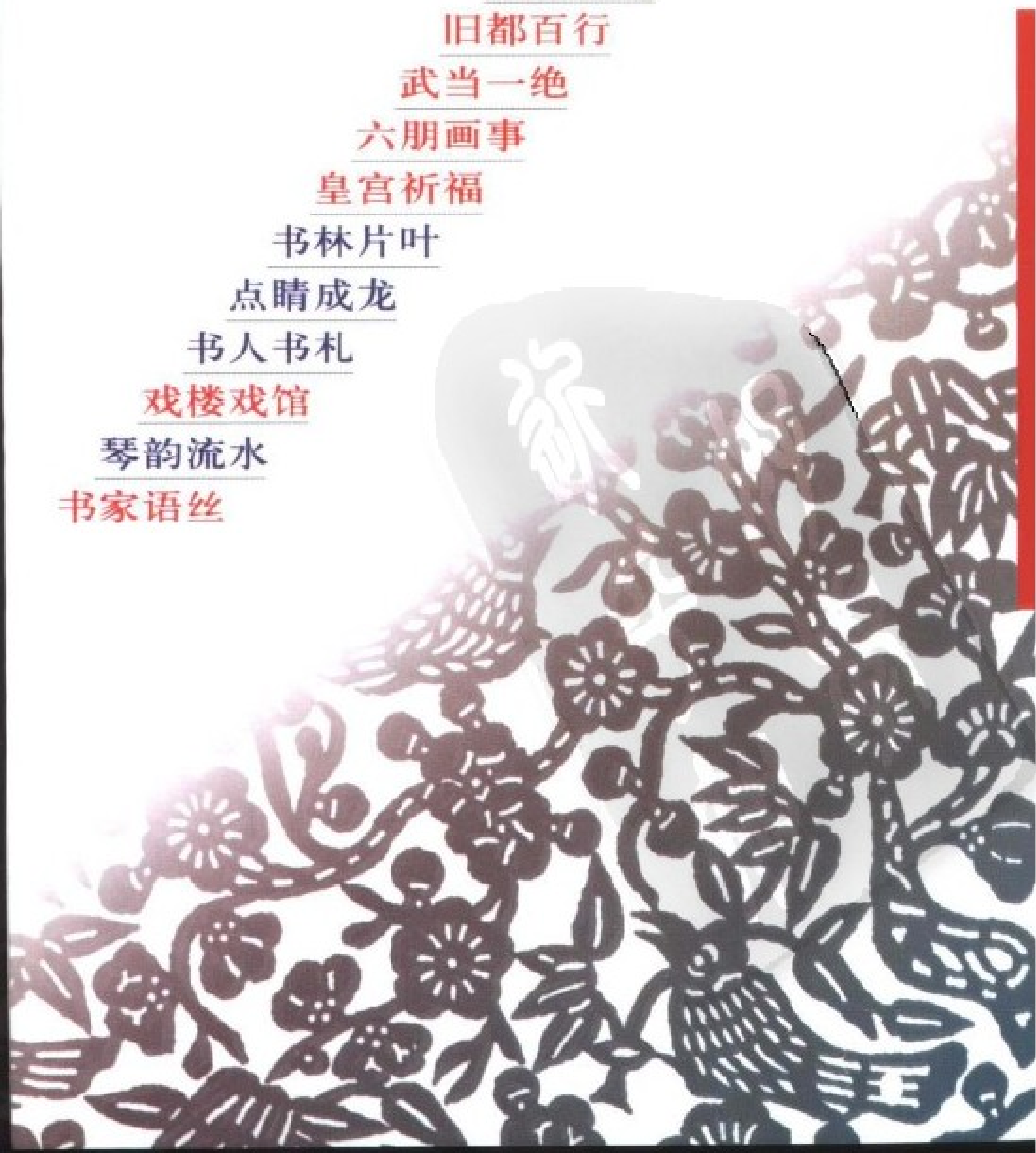
常人春 高巍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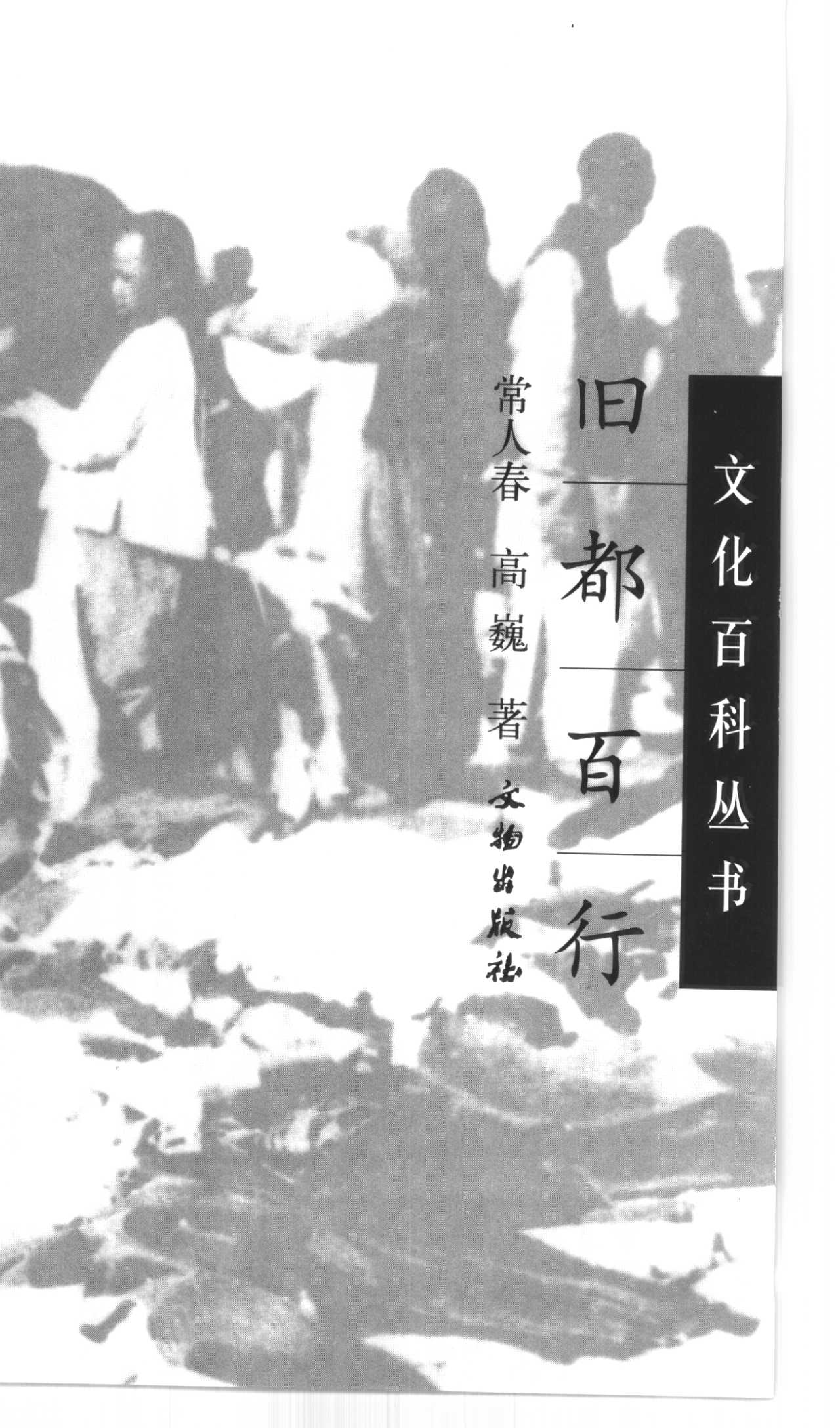


文物出版社

文化百科丛书

京韵杂述
女子游艺
故宫片羽
古城追忆
皇城春秋
踏歌寻典
街巷雅趣
老饕说吃
养生养气
旧都百行
武当一绝
六朋画事
皇宫祈福
书林片叶
点睛成龙
书人书札
戏楼戏馆
琴韵流水
书家语丝





文化百科丛书
旧都百行
常人春 高巍 著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　张希广
责任印制　陆　联
责任编辑　崔　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都百行 / 常人春,高巍著. -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3.12
(文化百科丛书)
ISBN 7-5010-1518-X

Ⅰ.旧… Ⅱ.①常…②高… Ⅲ.职业-史料-北京市
Ⅳ.D6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3947 号

旧 都 百 行

常人春　高巍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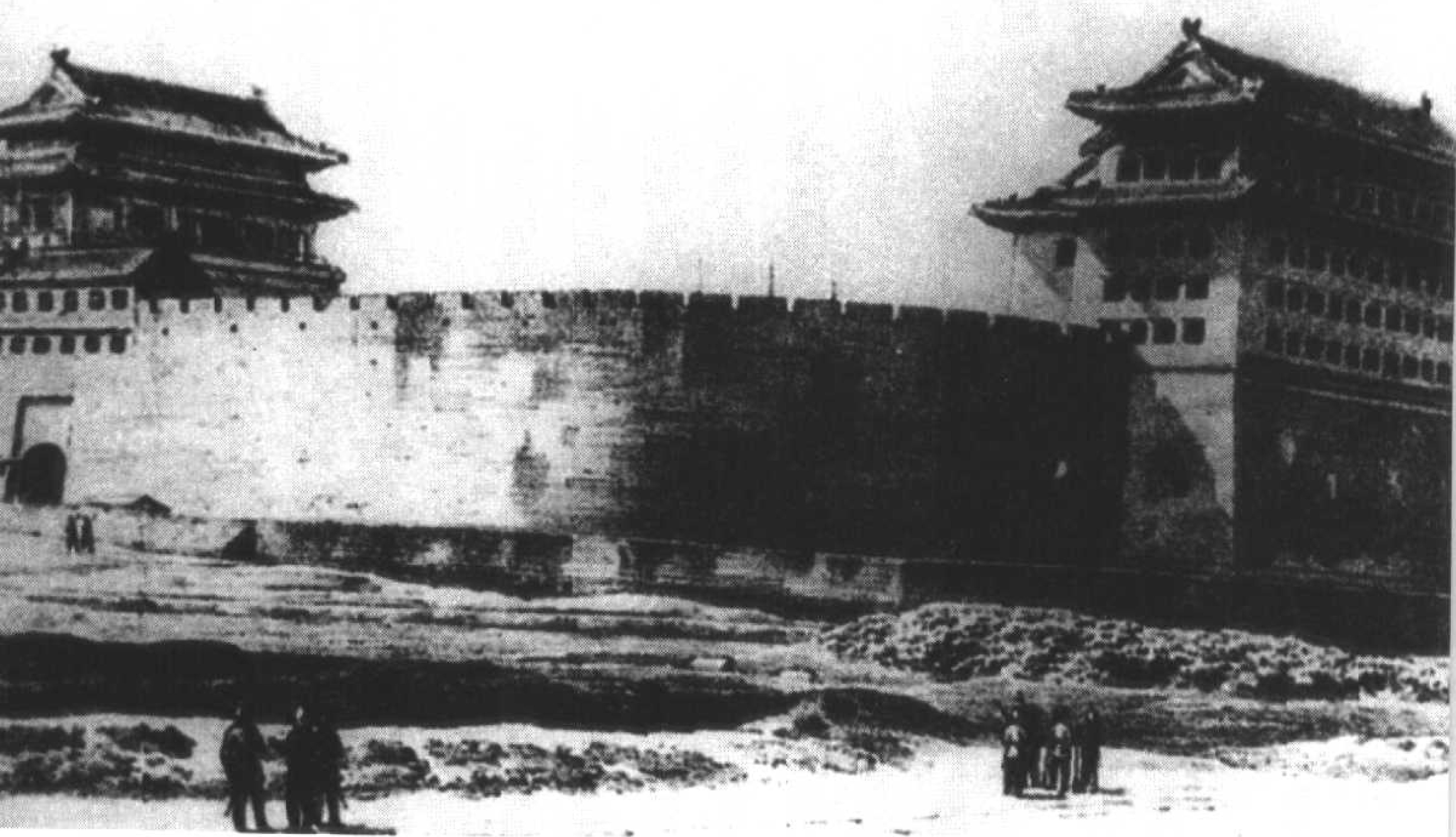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web@wenwu.com
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6　印张:$6\frac{1}{3}$
2003年12月第一版　200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518-X/K·756　定价:14元



常人春 1933年10月生，北京人，满族，民俗作家，民间自由撰稿人。出版的著作有：《老北京的风俗》（荣获第二届中国北方文学奖一等奖），《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荣获1993年度北京文教类优秀图书奖，2001年中国文艺山花奖）、《老北京的穿戴》、大型文献著作《近世名人大出殡》、短篇文集《老北京风情记趣》、《喜庆堂会》、《老北京的年节》、《老北京的民俗行业》等多种著作。现为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中国国际交流出版社特约顾问、编委，世界华人交流协会理事，中国民俗学会会员，燕京民俗研究和开发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民俗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他的传略已被收入《世界名人录》第五卷，《国魂跨世纪中华兴国精英大典》，《二十一世纪人才库》等多种典籍。



高巍，1958年生，著有《长城百科全书》（副主编）、《燕京八景》、《漫话北京城》、《四合院——砖瓦建成的北京文化》和《京城旧影》（上、下）等书。现任学苑出版社《苑都》丛刊主编。社会兼职：中国民俗学会苑京民俗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北京旧观

历史是延续的，今天来源于昨天；昨天来源于前天……而我们为了建设好今天和明天，必须研究和了解昨天，甚至前天。

站在新世纪的今天，回首昨日，我们并不为有些行业的消失所惋惜，因为那是历史的必然。

——摘自作者《前言》



旧货摊



旧衣摊



粮食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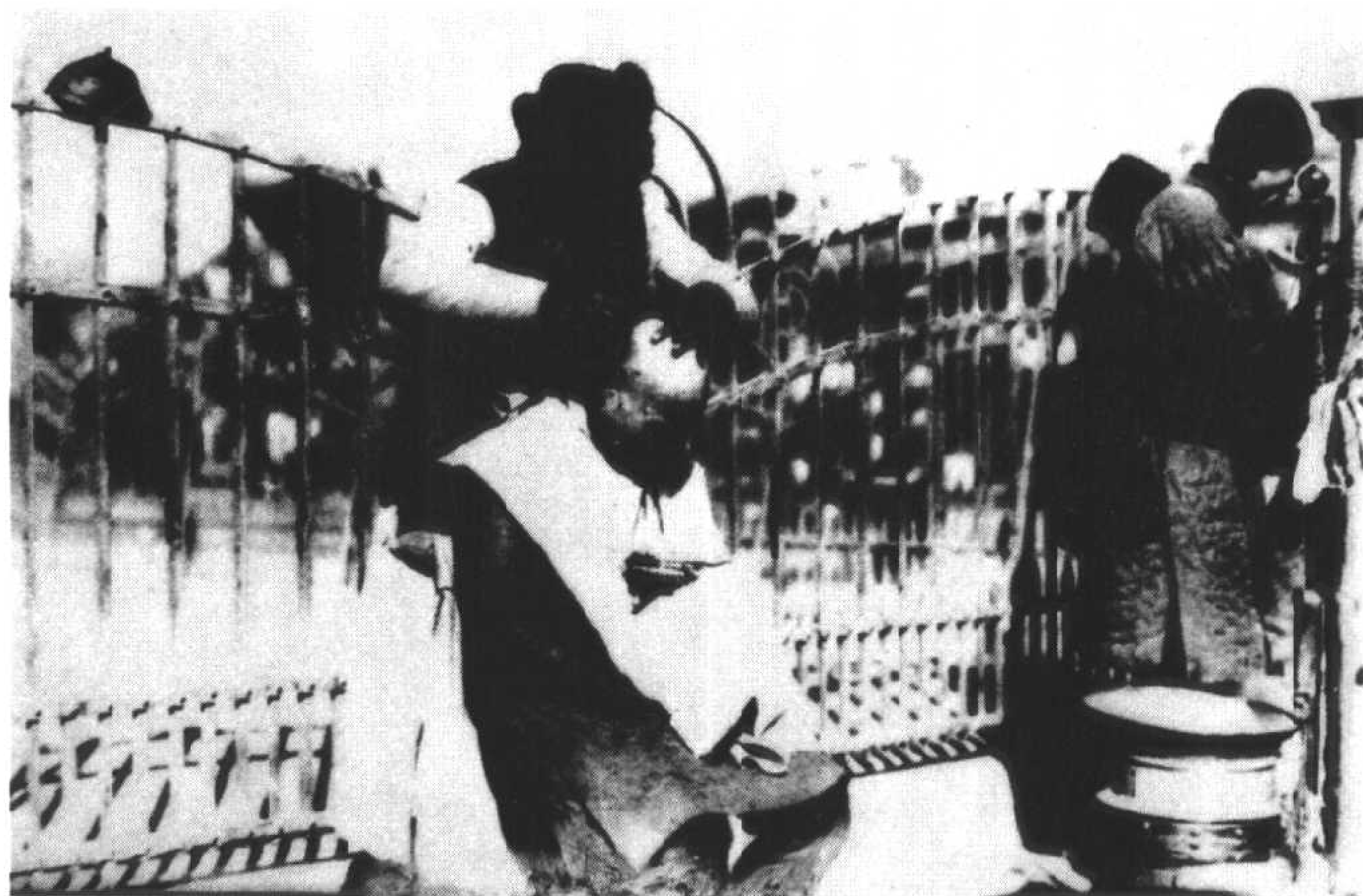
灯笼作坊



古玩店



剪纸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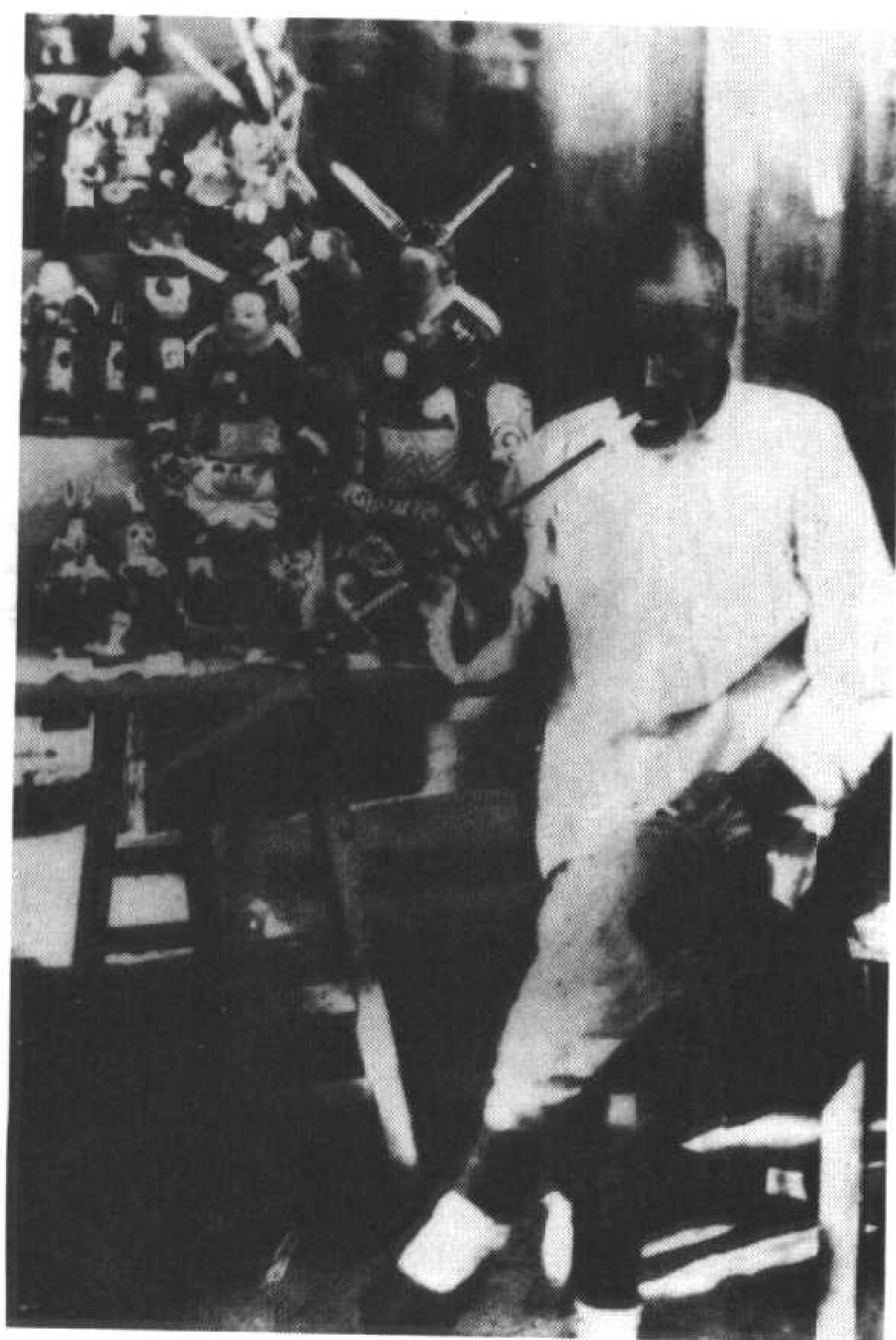
剃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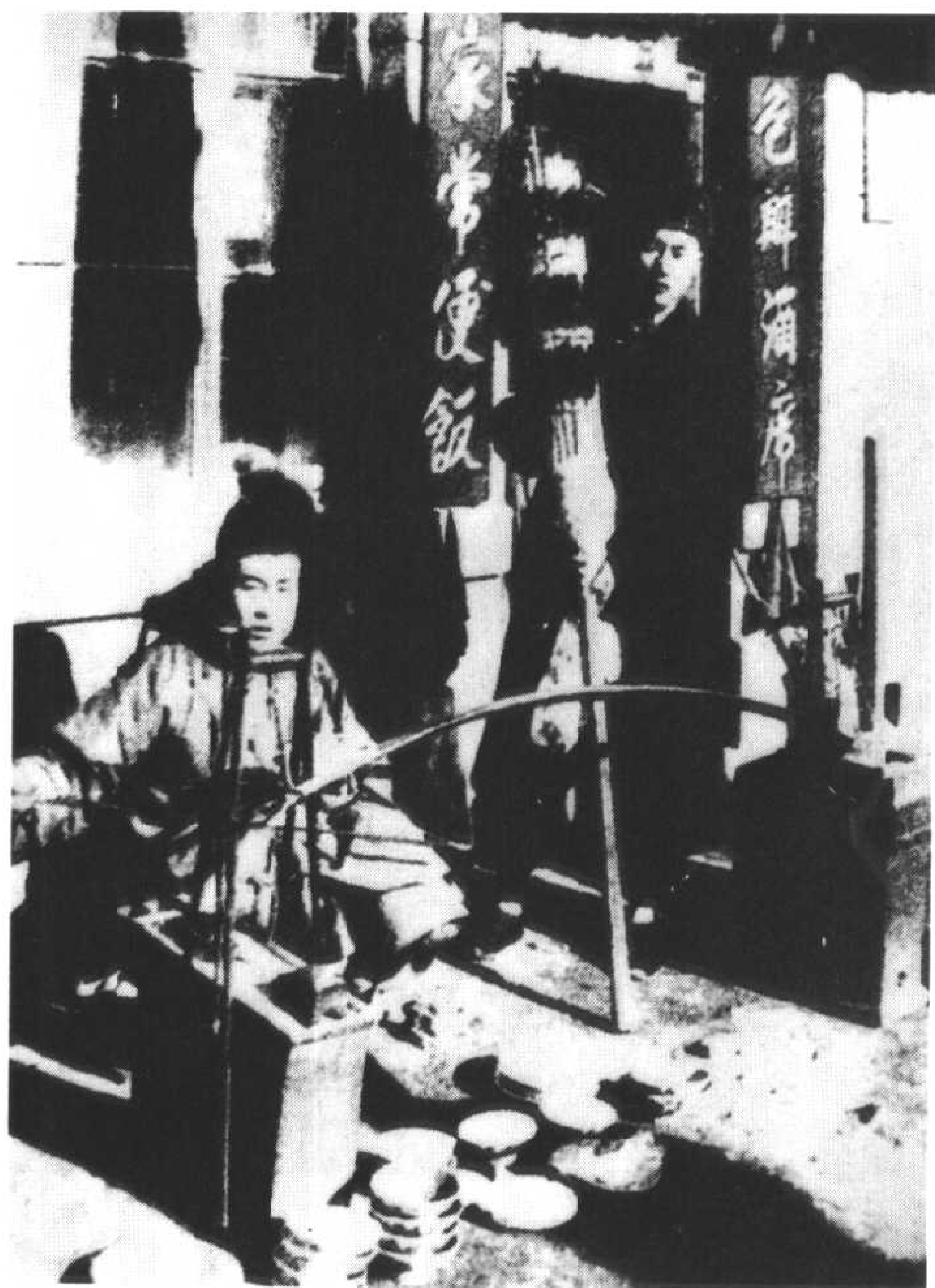
修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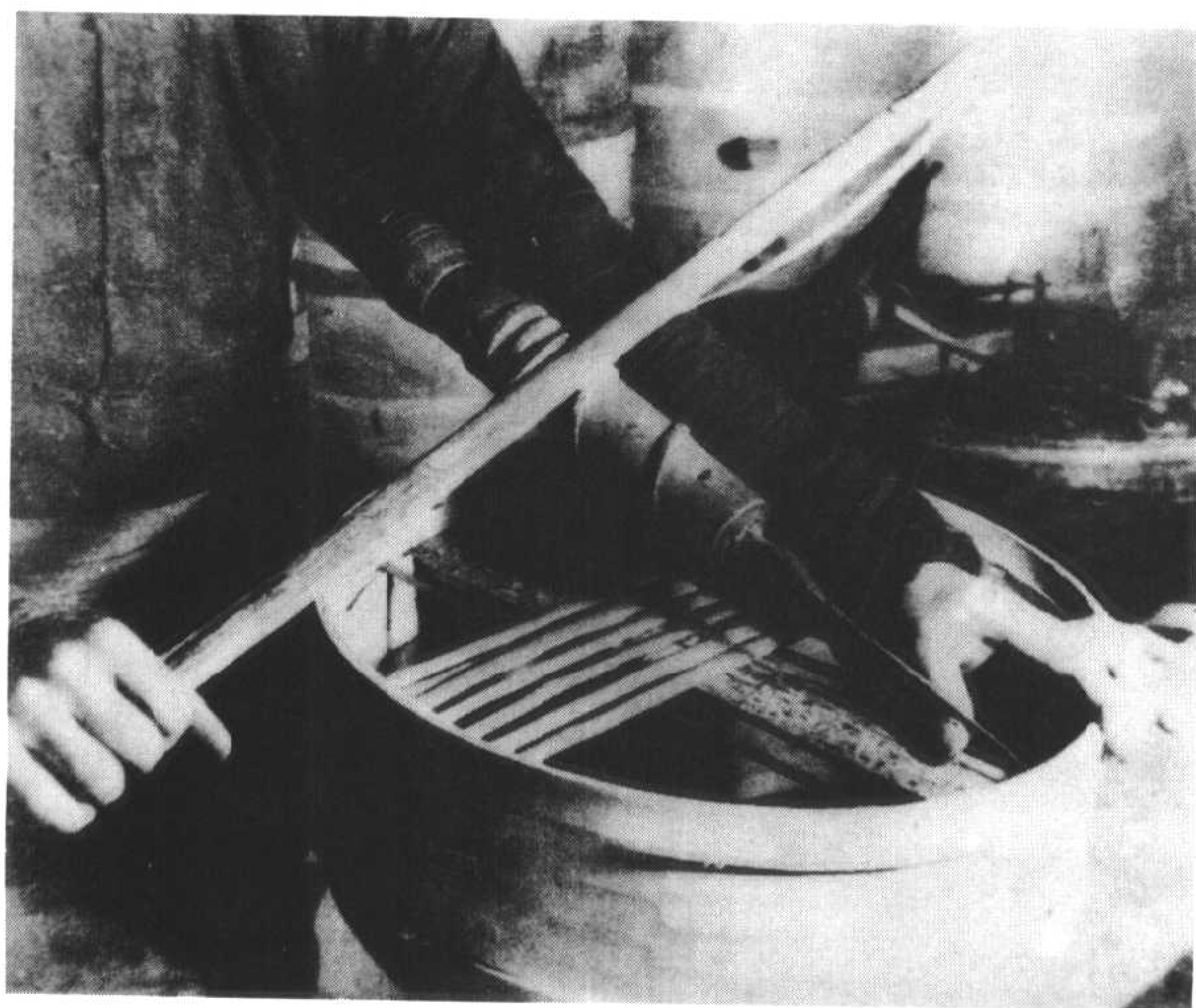
看风水



卖兔爷



锯碗


做笼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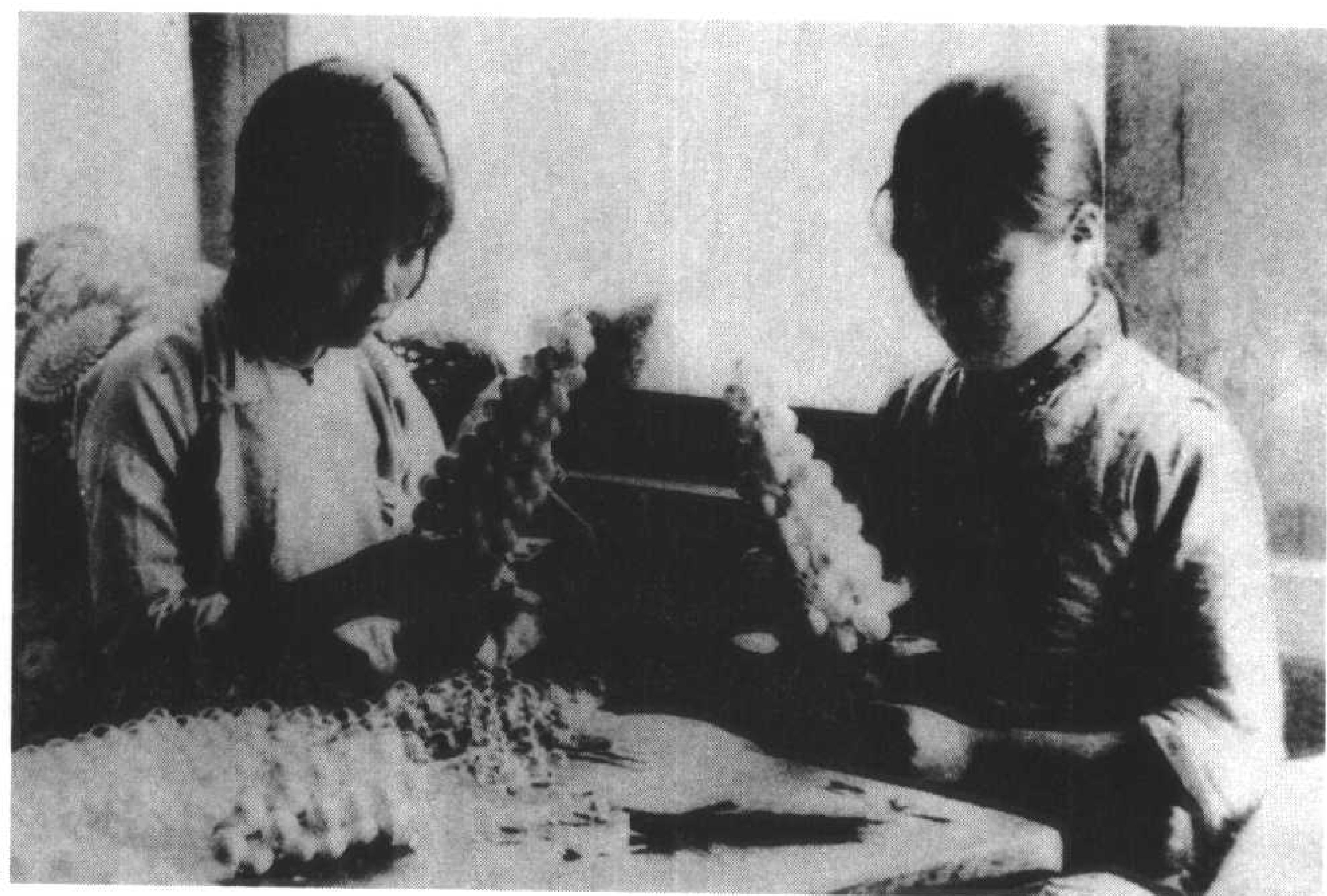


吹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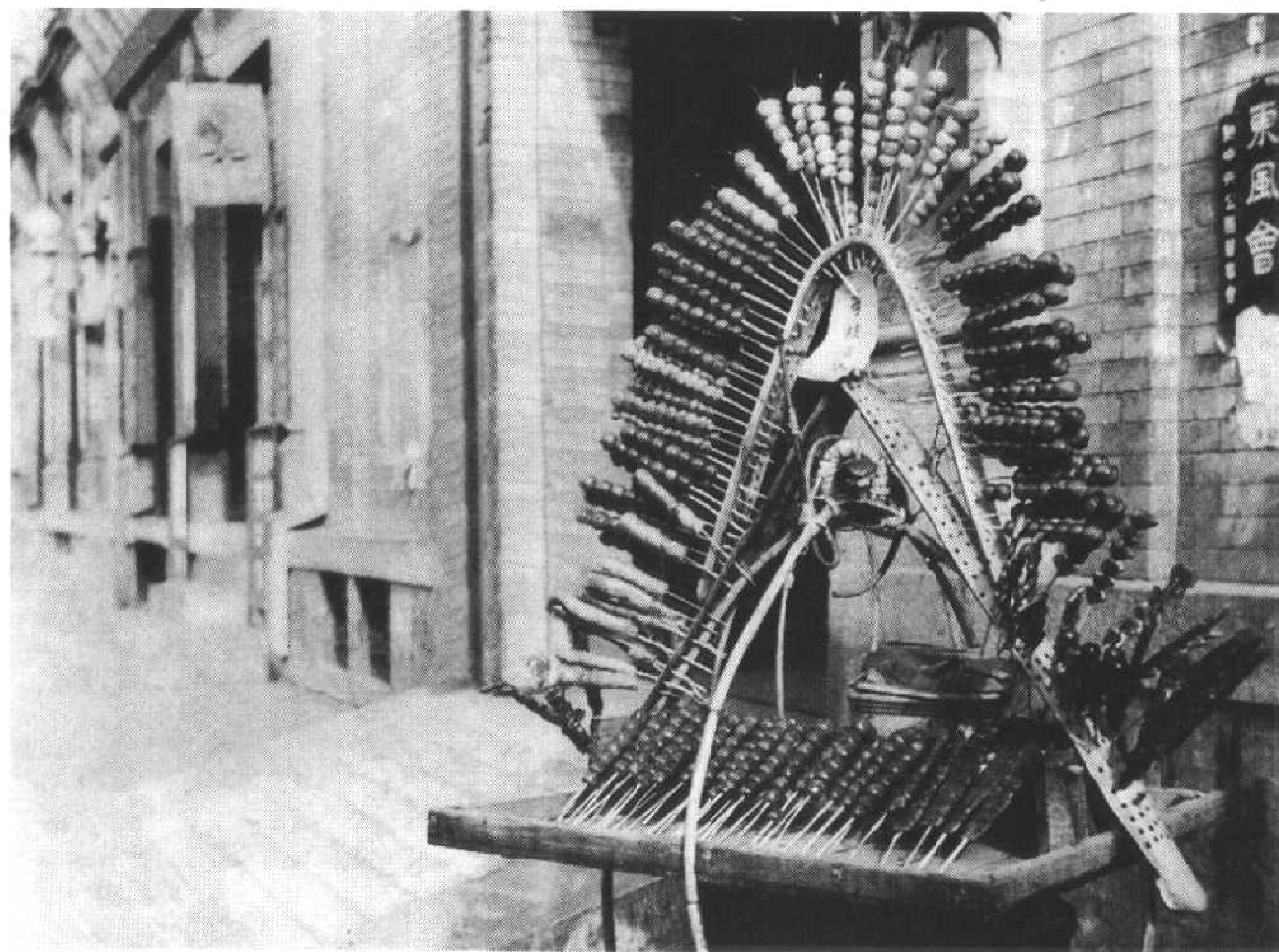
街头小吃


铜锡匠


手工艺品



地摊



大糖葫芦

独特的情结

北京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随着时代的发展，她的面目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包括从建筑到服饰，从习俗到思想，各个方面从大到小、从内到外、从具体到抽象，都呈现着全新的风韵和仪态。这一点是有目共睹，无可非议的。

说来也怪，今天的发展和变化越是明显，人们对一些旧日的东西，却越发思念起来。于是怀旧就成了一种时尚，老照片又重新焕发出璀璨的光辉。一些说不文物，而且又没有实用价值的物品，又意外地得到人们的青睐。一些久已忘怀的往事，又被人们提起。谁都知道，这不是什么倒退思潮，而是民族文化赖以传播的一种很独特的方式，一种说也说不清楚的民族情结，正是这种情结作用于这种方式之中，才使得我们民族文化具有了连续性。无论时空如何变化，

这种文化都是存在的、发展的。

我社已经出版的“文化百科丛书”中，有《京韵杂述》《老饕说吃》《踏歌寻典》等，都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了上面所说的变化和发展，以及眷念之情。本书名为《旧都百行》，讲的是旧日京城各行各业的一些情形。有的行业今天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只能从影视节目或舞台、画卷中看到；有的虽然存在，但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消失和变化，不是在一旦间发生的，而有一个缓慢的或者反复的过程，而我们常说的趣味性，也往往正在这里。

这种回味对曾经见到过那些旧行业的人，是回味，沉浸在一种温馨中；那么没有过见的，则是在了解，他们会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新鲜感。正因为这些东西能引起每一个人的兴趣，那么对它的搜集，整理和加工，就显得越发也重要。

本书讲述的近百个行业，其实就是一幅幅生动的民俗画页，那么连续起来，就是一件《旧都百行图》的长卷。慢慢展开可见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各操其业，忙个不停。再配以街巷楼舍，点缀上花草树木，简直可以和举目闻名的《清明上河图》相比。

这里的每一个行业，都可以讲述一个独具魅力的故事。假若连接起来，用几个人物贯穿其间，加上喜怒哀乐，分出春夏秋冬，就是一部长篇的民俗市井小说，也许《儒林外史》《老残游记》也会为之避退三舍。

本书的作者之一常人春先生，今年已七十高龄，坎坷的命运使他长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或基层，对我们说的“百行”都是亲身经历或亲眼看到的，他如实地记叙、积累，为我们留下了保贵的民俗资料。另一位作者高巍先生帮助他完成此稿，同样付出了许多心血。

应该承认，我们民族文化，正是赖以这样一些肯于吃苦、甘于埋名的有志之士的努力，才不断改善和发展的。而这些人或许会很容易就被遗忘的。我想，这起码也是不公道的，他们也是民族文化宝库中的财富，也应在他们所研究的成果体现价值的时候，得到社会和各界人士的尊重，日后，人们在说起往事的时候，也应该提到他们。

这也正是我社决意出版“文化百科丛书”的初衷；这也是对“与时俱进”的理解与落实。

让我们一起回忆一个昔日的北京，

也共同努力去建设一个新的北京。不要说今不如昔，也不要说今定胜昔，只有今昔相加才是一个真正具有民族魅力的全新的北京，正是有这种精神的趋使，也许日后我们还要编一本《新都百行》来。

崔陟 癸未重阳佳节于归燕堂

自　序

本书向读者介绍的都是明清以来北京城存在过的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各行各业的情况。这当中，有些已然消失，有些依然存在。消失与存在的相比，大致为7:1。可以说，这里介绍的大部分是已然消失的行业。

那么，消失、不存在的东西还说它干嘛呢？因为历史是延续的，今天来源于昨天，昨天来源于前天……。而我们为了建设好今天和明天，必须研究和了解昨天，甚至前天。

北京历史上存在的行业，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与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密切相关。具体来说，北京自金代起，曾经是六个朝代的都城。这一历史条件就决定了北京长期以来就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但近代以来，北京却不一定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因此北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一座消费性城市，而非生产性城市。尽管本书介绍的旧行业并非其全

部，但依然证明了这一点。

读者可以从书中看到，老北京存在最多的就是商业服务业，即便有一些手工业，也大多为玉器行业等服务于官僚富人的工艺器皿加工业。相反，像南方沿海城市，特别是南通那样的大机器生产的壮观局面，在北京一直未能形成。

在老北京，只要稍有收入或一技之长，能够保障基本生活者，其生活质量就要远比其他地区为高。毕竟作为一个消费城市，可供消费和提供消费的场所和行业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如本书中提到的，夏天出现于街头的“插扇面的”，这样微利的行业居然也有人做，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

过去，北京街头常见到各种茶馆。据说老夫妇俩，自家有间门面房，开个一间门脸的茶馆就够吃饭的。对此，说其是普遍的福利社会当然不准，但至少是有活儿干就有饭吃——这一点是普遍的事实。

当然，这样说并非一味的留恋过去，认为过去一切皆好。相反，求稳、求实惠，这是几千年封建社会带给人们的普遍心态。这当中，不无朴实而实在的感情，以及对人生本质与自然相适的追求。

尤其是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它所强调的，对利益的最大追求，实际

上往往不能真正满足人的全部需要，特别是精神方面的。有钱并不一定就有幸福。就拿昔日社会上存在的很多行业来说，往往又辛苦，又不好挣钱，是现代人不耻于去做的。但那年代的人依然去做，而没有像现在有些地方似的，看似冲破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实则与优良的道德规范大相径庭。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理想的社会除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以外，还要为每个人提供发展自我、展示个性的空间，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充分展示每个人的价值。

站在新世纪的今天，回首昨日，我们并不为有些行业的消失所惋惜，因为那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倒应该在回顾历史中，发现一些更能体现历史的本质特别是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作为我们今天建设新社会的参考。正是抱着这一念头，我们编写了本书，为广大读者提供一点借鉴。

由于时间紧促，加上五月间突如其来的压力，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肯定会有很多不足之处，尚祈读者专家赐教。

作者

2003 年 7 月于北京

目　录

油盐店

旧京油盐店实际上是油粮杂货店，但它自清代以来形成了固定的套路，通常油盐店与米面庄合营（后柜设有磨坊、碾房，进行粮油加工）。油盐店本身又分为油柜、杂货柜、鲜菜床子三部分。大的店铺后院还设有酱园，自行酿造酱醋，腌制酱菜。小的店铺则是从油房、京酱园进货。

老北京人居家过日子，俗云“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除了“柴”与“茶”单是一行外，其余基本上都概括在油盐店里了。它所经营的货物都是人们生活所必须的，可以说它是“菜、米、油、盐、酱、醋、杂”的店铺。所以，它服务的对象最广，故旧时谓“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老北京的油盐店有山西屋、北京屋、山东屋。其中以善于理财经营之道的山西人开的油盐店最为出色。

油盐店是种有赚无赔的行业，它基本上不受时局变化的影响。其次是它所售之物，可以任意作价，且无顾客还价之事，如买七角钱的香油、三角钱的黄酱，顾客在习惯上决不先问价钱，而是

由铺子给多少就算多少。再者，多数油盐店所售之物，除自磨的面粉之外，其余多是倒庄而来，酒是趸自各大酒店，青菜是趸自城郊大小菜农。百物皆有人供给，其售价是自己根据进货价格酌情定夺的，根本不可能亏本。俗说："商家有三不卖：亏本不卖，够本不卖，不赚钱不卖。"这种买卖是早晨趸来，一日售出，只赚不赔。所以，在任何历史时期油盐店都多于其他店铺，大街小巷无处不有。据不完全统计，20 世纪 40 年代末，北京约有大小不等的油盐店 1650 余家，从业人员约有两万人左右。成为京城的一大行业。

羊肉床子

老北京卖羊肉的店铺都设有一个床形的大木案，以便分割和摊放羊肉，进行售卖，故得名"羊肉床子"

当年，北京吃的羊肉全是大尾巴绵羊，肉质鲜嫩，不腥不膻，大半来自京北长城之外，俗称"西口大羊"。有些规模较大的羊肉床子，为了保证肉的质量，降低成本，设有小型的饲养场，自己饲养绵羊。

经营此业的几乎都是回民，他们克

勤克俭，重视卫生，讲求经营方式。大店铺掌柜的和伙计都着装利索干净，说话和蔼，笑脸迎人。他们把挂羊肉的木杠、放羊肉的案子、泡羊肉的木盆都刷洗得和新木头一样。连称肉的秤盘、白铜秤链儿、白铜秤砣也都擦得锃亮。大扇的羊肉都用钩子挂在临街窗口的木杠上，后边便是大木床子。顾客买肉照例把采购来的副食、蔬菜放在案前的大长板凳上，店家便主动张罗顾客。原则上，顾客指哪块就切哪块，只要顾客说一声是爆、烤、涮，还是吃馅，保证错不了。

到了盛夏，羊肉床子都卖自制的“烧羊肉”卖时现从卤水中捞出来，切成小块，用荷叶做包装，交给顾客。烧羊肉的品种很多，除正式羊肉外，还有羊脖子、羊头、羊杂碎、沙肝等。同时，顾客还可以带着碗，要些烧羊肉的汤，用来浇过水面吃。

此外，羊肉床子还经营一些副业。例如：把羊肠子灌上羊血羊脑，谓之“羊霜肠”。做熟后，有如紫色的小哑铃，又像双头的小红蘑菇，不但好吃，而且好看。羊肉床子照例把它挂在店外浅木盆的架子上出售，得到的钱则作为伙计和徒弟们的零花钱。

有的羊肉床子还把剩下的肉头剁成馅，蒸成包子，设专床临街叫卖。其菜馅因时而异，冬天多为白菜，夏天则为西葫芦、韭菜。每于包子出屉，小徒弟便把笼屉往外一端，扣在铺有苇帘的案子上，然后，倒退两三步，把耳朵一捂，扯开嗓门吆唤道："包儿来热的来，羊肉的包儿要热的……"，声音洪亮，悦耳可听，成为一种典型的街头音乐。

切面铺

古都的切面铺是一种经济实惠的小饭馆，它不只是卖切面，主要是设饭座招待平民阶层的顾客用餐。切面铺掌柜的一般都是行里出身，直接参加操作，精通本行业务，了解顾客心理。"跑堂的"伙计接待顾客热情周到。店堂虽窄，但其桌椅板凳擦洗得很干净。桌上放一小坛，内插竹筷，另有醋瓶、酱油瓶和蒜盆。使用的碟碗盘勺虽是糙瓷，但刷洗得都很干净。只要有顾客登门，"跑堂的"必主动给"看座"、"让坐"，问道："您吃点什么?"当顾客问到本柜都有什么菜时，"跑堂的"照例就像京剧《清风寨》里报菜名一样，非常熟练地将菜谱背一遍，并有意介绍应时当令的新菜。

顾客点菜后，照例以“喊堂”的形式，通知灶上。

切面铺所卖的主食有馒头、花卷、斤面（一斤、半斤、十二两均可），其浇头分打卤、氽卤、炸酱、麻酱，任顾客选择。其次是荤素炒饼、烩饼、馅饼、脂油葱花饼、荷叶饼、芝麻酱糖饼、螺丝转儿等等。炒菜如：炒肉丝、炒肉片、炒木樨肉、熘丸子、干炸小丸子、焦熘肉片、滑熘肉片、烧茄子（夏）、摊黄菜、炒活菜、肉丝炒韭黄（春）、肉丁酱、肉皮酱、辣子肉丁、炒豆腐、熘豆腐……总之，俱系家常菜。汤菜只有酸辣汤（带鸡血）、木樨汤（蛋花汤）、豆腐汤、高汤卧果……顾客还可以自带猪肉蔬菜，由柜上代炒，只收加工费，谓之“炒来菜”（有人说，这算一荤，铺子本身卖的肉菜也算一荤，故叫“二荤铺”）。

旧时，切面铺讲究人工抻面，有圆条、板条不等，吃起来很筋道。后来添了木制的切面机，用来轧面切面，切出来的面条可以盘成寿桃，作为给老人庆寿的长寿面。

切面铺的幌子多系一罗圈，圈上糊以金纸或银纸，下垂红棉纸条，表示带

卖煮面者，罗圈即象征面锅。如果是回民切面铺则在罗圈上糊以蓝纸条。此外，尚有一种扁形幌子，上为木板宽约尺余，下垂细纸条，纸条长约二尺左右。纸条有黄白二色，白色表示卖切面，黄色表示卖杂面。木板上有刻双桃者，表示售蒸食。

蒸锅铺

旧时，在北京经营蒸食的买卖有两种，一种是南冀州人开设的馒头作坊，其招幌是在门前插上一个大馒头。这种作坊多是卖一些戗面（硬面）馒头。另一种则是山东人开设的蒸锅铺，卖的多是发面（软面）馒头之类的蒸食，一贯标榜“山东馒首”。这种蒸锅铺有门市，有字号，其招幌多为一大寿桃，或一“斛食楼子”（即一小型酆都城的木制模型）。从这种招幌中可以看到，其营业项目已介入北京民间的人生礼俗——红白喜事。

过去，满、蒙旗人在结婚迎娶新妇之前，举行“通信过礼”仪式，要给女方送去“龙凤通书”（结婚证书），通知迎娶吉期，并送去如意、“鹅笼”、“酒海”、衣物、首饰等礼物。其中，有大喜

字馒头二百个，每个重半斤。这是当年蒸锅铺的大号买卖。

大户人家为老人祝寿，其晚辈或前来祝贺的亲友，必至蒸锅铺订制红嘴绿叶的大寿桃一盘（每盘十个，每个五斤）；盘成塔形，上罩红纸网套的寿面一盘，以为寿礼。

人死三天初祭，请僧、道，鼓乐送焚纸制车马，谓之“接三”。夜间，请僧人作“度亡法事”，谓之“放焰口”，向“十方法界无祀孤魂施食放赈”，其所用的“斛食饽饽”（即施食饽饽），例由亡人的男孝属出资向蒸锅铺订制。

俗传农历二月初一为太阳生日，旧京例于是日早晨祭祀太阳真君，其供品必用所谓“太阳糕”。因此，早年蒸锅铺必于是日一早供应太阳糕，此系蒸锅铺的应节货品。此糕通常是用糯米面加糖制成，上面以红曲水印上昴日鸡星君（金鸡）法像，或在上面用模具压出“金乌圆光”，每五块叠在一起为一碗，顶端还插一只寸余高的面捏小鸡，以象征昴日鸡星。蒸锅铺除自家售卖此糕外，还批发给一些走街串巷的小贩。

旧历年期间，人们为争取休息娱乐，外出给亲友拜年、逛庙，所以都在年前

腊月底做好大量“年菜”，蒸出大量馒头。有的家庭则是到蒸锅铺去买现成的馒头、花卷等主食储存起来，以备正月初一至初六甚至到“灯节儿”，半个月吃用。往往蒸锅铺在腊月底，必要昼夜突击“赶热活”，以求在年关有一笔“进项”。

蒸锅铺除了上述民间人生礼俗性的买卖以外，主要是供应人们日常吃用的各种蒸食。凡是蒸锅铺都在门前支上一个木案，上边摆一大玻璃罩子，里面码放花样品种不同的蒸食，除约斤馒头、花卷外，还有三角馒头（有红糖、澄沙的两种）、豆包、枣蒸饼等品种，任人选购。大点的蒸锅铺都预备几样点心，无非是什锦糖包之类，卖给那些“老本京派”的主顾。

蒸锅铺本小利薄，他们为了取信于群众，立足于社会，而且有利可图，不但勇于创业，而且精于守业。坚持自产自销，不外趸货。坚持“诚信为本”的原则，凡接订货，必如约按质按量按时交货。主动送货上门，不取运费。为了开展业务，刻意与附近切面铺、二荤铺、跑大棚的油、厨、茶三行进行交往合作，依靠这些社会关系推销产品，扩大营业。

同时发行礼帖、礼券，扩充财源。

20世纪50年代以来，作为人生礼俗所用的喜、寿字蒸食、斛食饽饽，以及岁时年节的应时蒸食都没了销路，蒸锅铺在传统业务上几乎“净了手”，成了名符其实的馒头铺，至此，只好与其他饮食业合并了。蒸锅铺一词当然也就不存在了。

饽饽铺

清代，北京市面上形成了满、蒙、汉、回四个民族三种类型的饽饽铺。第一种谓之“满洲饽饽铺”，也叫“鞑子饽饽铺”，根据满、蒙旗人的饮食习惯，经营奶油糕点，如奶卷（奶皮中卷蜜糕及芝麻盐儿）、乌塔（满语，即软奶子饽饽）以及芙蓉奶油萨其马，甚至还代卖鼻烟。因清代旗民都居住在内城，故这种饽饽铺也多开设在内城。但经营者不一定是满、蒙旗民。清末民初，由于市场需要，逐渐转化为满、汉结合的饽饽铺，被北京人泛称为“大教饽饽铺”，以区别于回民所开设的清真饽饽铺。第二种谓之“南果铺”，专营南方风味的糕点，如桂香村的梅花蛋糕、方蛋糕、桃酥、猪油夹沙蛋糕、杏仁酥、太师饼、

云片糕、眉毛肉饺、苏式月饼，以及各种南糖等等。经营者多为江浙等省的南方人。第三种谓之“清真糕点铺”，亦称“伊斯兰糕点铺”，经营者皆为回民。所制与满、汉饽饽铺同名、同型的糕点，均用素油（主要是香油）烤制，亦供应佛、道两教寺庙的供品，受到京城“僧俗善信”人士，以及有不同宗教信仰人的赞许。所以，在商业竞争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从清康、乾以来，饽饽铺在京城始终是一大行业。民国后，虽几经演变，在某种程度上呈衰落现象，但只是处于量变，并没有发生质变。据七七事变前《北平市商业调表》统计，北平糕点铺共有 206 家。

当年，北京有很多著名的饽饽铺，例如：坐落在前门外鲜鱼口内的毓盛斋；坐落在东城灯市口的合芳楼。它们各具有九间门脸。都有自设的红炉局，里外职工不下二百余人。年收入达百十万两银子。又如，地安门外大街并排而设的桂英斋、庆兰斋等皆以供应王府、宅门所需之糕点而发迹。

旧时，各著名的饽饽铺都有“非它莫属”的产品，如南文斋的满洲饽饽，

增和楼的咧子饽饽，玉庆斋的杠子饽饽，致美斋的福寿饼，滋兰斋的玫瑰饼、水晶糕，兰华斋的蜜糕，芙蓉斋的芙蓉糕马、黄白蜂糕，聚庆斋的蜜供尖，瑞芳斋的莲子缸炉，复兴斋的茯苓饼，一品香的奶油花糕，泰华斋的萨其马，致美斋的中秋月饼……因有独特出色产品的老饽饽铺诚是举不胜举。

当年，满、汉糕点的花色品种多而杂，虽都是面制品，但很讲究应时当令，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品种。春深时节有酥皮带馅的玫瑰饼、藤萝饼，初夏有牡丹花饼、绿豆糕，八月有各式月饼，九月有重阳花糕，十月有玉面蜂糕，腊月有成堂蜜供、套饼和面鲜。平时，就其传统品有：大小八件、七炒、枣花糕、蝴蝶酥、到口酥、杏仁酥、桃酥、桂花缸炉、破边缸炉、油糕、盅糕、喇嘛糕等。满洲饽饽铺则卖些奶油糕点，如芙蓉糕马、奶油光头、奶油“炉条”、奶油七星饼、奶油“火纸筒”等。

烧饼铺

北京的烧饼铺是以制做、售卖烤烙面食的小铺，多数兼卖炸货儿，故又谓之“炸货屋子”。有的以售卖稀粥、面

茶、杏仁茶为副业、则可谓之“粥铺”。但均以卖烧饼、火烧为主，且以早晨营业为最盛，成为居民的早点铺。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所卖的食品经济实惠，符合一般平民的消费水平。且符合北京人的饮食习惯。其食品花样品种繁多，甜咸有致，干稀搭配得当，老少咸宜。

烧饼铺多开设于居民聚集区，在市内大街小巷星罗棋布。其从业者多为回民，少数为汉民。但所制做、售卖的食品均为素食。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

一、烤烙类：芝麻酱烧饼、椒盐马蹄、驴蹄、螺丝转儿、精白面烤成两层皮式的“水马蹄”（吊炉烧饼）、麻面饽饽式的凸盖烧饼、蛤蟆吞蜜式的澄沙火烧、芝麻酱红糖火烧、小米面贴饼子(有带枣与不带枣的两种)。

二、炸货类：除长圆圈形的油炸果(“果”读作“鬼”音)、小焦圈外，有独根独挺的炸油条、绳结式的脆麻花、芝麻麻花、蜜麻花（糖耳朵)、炸大小油饼儿、炸糖饼儿、炸薄脆、炸馓子、炸排叉（包括蜜排叉、姜酥排叉)、炸饸饹、饴糖拌炸白薯片、饴糖碎供等等。

三、茶食类：豇豆粥、豌豆粥、粳米粥、杏仁茶、豆浆、面茶等。有的是

烧饼铺自营的，有的则是外约来的"粥挑子"。

烧饼铺历来从五更天即开始作业，烙烧饼、炸油果。为招来主顾，惯以擀面杖敲打案板，其响颇有节奏。出工干活的劳动者，如拉排子车的、做瓦工的即闻声而至。一般烧饼铺室内都设有简单的客座，亦有小伙计（学徒的）进行张罗。此是旧时名符其实的便民小店，通常顾客只要买两套烧饼（带油果），或两个烧饼一个炸大油饼，再配上一碗杏仁茶或面茶，花不了几个大钱，即可果腹。

饭　庄

清末民初，北京饮食业最高等级的是饭庄，它的营业项目主要是包办酒席，承办红白喜事。它的服务对象是贵族、官僚、豪绅、富商，人们称它为伺候大宅门的。

饭庄字号照例称为"某某堂"，都开设在较为繁华的地区。其中，历史悠久，名声较大的有东皇城根隆丰堂，专作王公府第买卖，各王府阿哥（少爷）以至管事官员欢聚宴乐均在此进行。其次是白米斜街的庆和堂（后迁地安门外大街路西），专作清宫内务府买卖。再次是方

砖厂德丰堂，专作北城绅商和提署买卖。第四是烟袋斜街庆云楼，专作世家人士买卖。以上是脍炙人口的“后门四大饭庄”。此外，还有什刹前海北岸的会贤堂，西单报子街聚贤堂，东城金鱼胡同福寿堂，东四钱粮胡同聚寿堂，前门外肉市大街天福堂，前门外取灯胡同同兴堂，前门外观音寺惠丰堂，西城锦什坊街富庆堂，东城总布胡同燕寿堂等等。它们在清末民初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首善之区这个特定环境里，生意兴隆，盛极一时。

这些饭庄共同特点是，有着宽阔的庭院，清雅的房间，陈设着高档家具，使用成桌配套的盘碗勺筷，院内有铅铁罩棚，设有戏台，可供举办“堂会”，唱大戏，演杂耍。同时，它们的头灶、二灶厨师可以被办事的人家叫去做“外活”，在办事的人家里摆筵席。

旧京饭庄多是旗人出资为“东方”，山东人出力作具体经营，是为“西方”，旗人只当空头东家，而掌柜的、掌灶厨师以及打杂的徒工，一般都是山东人，而担任招待顾客和红白喜事服务的“茶房”却是北京人，因为他们懂得京城内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且为上下公众认可的

礼俗。汉人宴会，凡让座、上菜、“本家谢席”，必须以京腔京调朗声喝礼。如“本家儿道谢啦，话到礼到了您哪！”方为得体。

此外，还有一种专门承揽红白喜事的，平时不卖散座的北京人开的饭庄，这是为中下层人服务的买卖，人们叫它“冷庄子”。如什刹海义溜河沿的启华堂，前门外西珠市口的天寿堂，北新桥石雀胡同增寿堂和天丰堂。冷庄子平时不升火，也没有固定厨师，只是开门应酬办事客人订座而已。遇有婚嫁、庆寿、弥月、拜师、开吊等办事客人，定妥日子、席面好坏、桌数多少，临期升火，现找厨师、茶房，有时甚至从人市上找“跑大棚”的厨子，所以，所做的菜肴比起热庄子当然略逊一筹。冷庄子除赚席面钱外，还赚喜房或寿堂钱，甚至还要喜房设备（如天地桌上的礼器、供品、钱粮、香烛）喜字儿钱。这是它们的额外收入。

饭　馆

饭馆比饭庄子规模略小，既包办酒席、承应中小型的喜庆宴会，同时设有散座，随时招待就餐的顾客。有的是经营单一品种的饭馆，其历史悠久，且各

有特色。

北京饭馆没有纯粹的北京馆，按金受申《北京通》的说法，只有西四沙锅居（和顺居）的白肉馆和其他卖小烧煮的饭馆勉强可算是北京馆。但爱新觉罗·瀛生著文则说，沙锅居应是满洲馆，也非北京馆。真正的北京风味菜馔只有过去“跑大棚”（应酬红白喜事）的厨师才能承做。

但是，北京人一向以山东馆为北京馆。有清以来，山东庄馆柜上、灶上全都是山东东三府的籍贯，自幼来京，按北京人的饮食爱好和口味，学习烹调技术，做出的菜馔能适合京师朝野上下的官绅富豪显贵的需求，故能立足于天子脚下。被呼为北京馆，实是一种荣誉。

山东馆以善做鸡、鸭、鱼菜见长，如炸胗儿、糟鸭头、拌鸭掌、抓炒、软炸等，非山东灶不精。山东灶也各有所长，如泰丰楼的汁水便是一例。北京以烧鸭出名的全聚德及早年关闭的便宜坊都是由山东人经营的。山东的济南馆，如丰泽园、新丰楼所做的菜肴介乎南北之间，别有风味，尤善做大件菜，如燕菜、鱼翅、甜菜等珍细品，历来为人所称道。

在清咸丰、同治年间，北京的著名饭馆很多，如致美斋、福兴居、广和居、龙源楼、同兴楼、时丰斋、毓兴居、宴宾斋、裕兴居、富兴楼、毓兴合、吉兴斋、裕兴园、万福居、同兴居、泰丰楼、如松馆、才盛馆、便宜坊等。这些饭馆所做的菜肴并不一定是北方菜，但很有特色，成为地方风味菜。最典型、最著名的是广和居，据说，当时京官中有些善于烹调的南方人，多向这些饭馆传授心法，制作一些特殊的菜。如“五柳鱼”（即西湖宋嫂鱼）传自陶凫芗，叫作“陶菜”。又有“潘鱼”传自潘炳年，“吴片鱼”传自吴均金，“江豆腐”传自江树昀。这几个人当中，吴的名气最大。吴字闰生，光绪时官内阁中书，在京有“菜圣”之名。

光绪末年，除旧日饭馆大部存在外，前门外又添了天和玉、醉琼林、正阳楼等，城内则有隆福寺的福全馆以及后来居上的东兴楼，形成一个极繁盛的时期。骡马市大街明湖春是民国后才开业的，以济南菜相号召，房间和菜馔都极漂亮。后来因为有人想在那里赊账，没有达到目的，于是造谣说明湖春闹鬼，因此，其营业大受影响，一蹶不振。

民国十七年（1928年）以后，是北京商业最不景气的时代，前门外一带异常萧条，饭馆业忽集中于西长安街，如雨后春笋。一时出现了庆林春、方壶春、东亚春、大陆春、新陆春、鹿鸣春、四如春、同春园等，当时有“长安十里遍是春”之谚。广和居也由城外迁到西长安街路南，改名广和饭庄，仍以潘鱼，江豆腐相号召，但营业始终不好，不久就关闭了。

盒子铺

旧时，北京卖生猪肉兼制做熟肉冷荤的店铺，谓之“盒子铺”，其熟肉冷荤谓之“盒子菜”。菜目种类繁多。如烤鸭、酱鸭、熏鸭、酱鸡、熏鸡、卤鸡、桶子鸡、童子鸡、酱肚子、熏肚子、酱肉、熏肉、腌肉、卤肉、肘花、熏肘花、酱爪尖、熏爪尖、熏排骨、香肠、小香肠、灌大肠、灌小红肠、小肚、酱大肚、熏大肚、卤什件、酱熏什件、鸡冻、鱼冻、虎皮冻、烧奶猪、酱口条、酱猪头肉、熏猪头肉、熏黄鱼、熏鸡蛋、松花蛋、糟蛋、松肉、扣肉、米粉肉、红烧肉、叉烧肉、炸大扁丸子、炸小丸子等。在这些冷荤中，夏天以熏货为主，冬春

季则以酱货为主。

为什么叫“盒子铺”、“盒子菜”？皆因其售货时所用的容器皆为“冷荤盒”，此是福建特产的扁圆形的大木盒，朱漆描金为饰，是一种工艺品，讲究的还要绘以吉祥图案，用于喜事的有子孙万代、龙凤呈祥、牡丹富贵，用于办寿的有八仙庆寿，用于奠亡的则有五福捧寿等图案，盒子分上下两部分，盒内有屉，上放九个较小的漆盘，装各种小件冷荤，中间放一个较大的圆形漆盘，装鸡鸭等大件冷荤。这些冷荤盒子可以待客，也可以当作祭品、礼品，而且是北京人节日或日常生活的美食。如果立春或二月二“龙抬头”接“姑奶奶”（指已出嫁女儿）吃薄饼，自家炒几个热菜，如再叫上一个盒子就很丰盛了。平时，人家吃饼，买上几包什锦盒子菜一卷，谓之“吹喇叭”，也是美餐一顿，改善生活。

经营“盒子铺”的多是山东人，他们有制做冷荤的传统技术和经验，与山东风味饭馆密切相关。北京的“盒子铺”遍布城内，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五坊”、“五楼”、“两号”、“一馆”、“一斋”，它们都开业于前清中叶末。

“五坊”是指宣武门外菜市口“老便

宜坊"、骡马市路南"便宜坊"、前门外肉市"六合坊"、前门外鲜鱼口内"便宜坊"、西单舍饭寺口外"便宜坊"。"五坊"历史悠久，专卖烤鸭和鸭子席。

"五楼"是指前门外西河沿的"合香楼"、东四牌楼"普云楼"，西四牌楼"德庆楼"、新街口"普云楼"、东四牌楼"庆云楼"。"五楼"的冷荤各有特点。"合香楼"的食品花样多，品种细，味美适口。"德庆楼"以烧奶猪（即烤全猪）著名，这是当年近亲至友对亡人祭奠的礼品。此外，"德庆楼"的卤肉、叉烧肉亦远近驰名。东四牌楼的"普云楼"、"庆云楼"，新街口"普云楼"三家食品也各有千秋。

"两号"是指前门外西河沿的"天盛号"和西单牌楼北"天福号"。"天盛号"的特味是青酱肉，其形类似金华火腿，色香、味美、醇厚，驰名本市，有"北方火腿"之称。"天福号"以制做酱肘子驰名，其特点是肥而不腻，切片之后皮与肥、瘦肉相连，皮烂而不脱。在掌握火候上有独到之处。至今门市销售供不应求。

"一斋"是指西单牌楼路西报子街口外旧刑部街迤南"宝元斋"。以烤鸭、熏

鸡驰名。约在1921年因扩展西单十字路口道路被拆除而歇业。

“一馆”是指东安门大街的“金华馆”。其冷荤早年专供清宫御膳房选用。该铺伙友曾达八十余人。民国后，生意一落千丈，不久即歇业了。

黄酒馆

黄酒馆即“南酒店”，但北京的黄酒馆不只卖“南酒”，还有山东黄酒、山东黄酒和北京黄酒，合起来总称“黄酒馆”。清代，黄酒馆代卖碗酒。凡到这里饮酒的，大半是坐大鞍车的贵族，尤其是“年高有德”的老翁，数人聚在一起，谈些前八百年后五百载的旧闻轶事。到了夏天，自带白杏一枚，令伙计剖为八瓣，杏核破为两半，加上碎冰，一两黄酒，欲饮又谈，不知温了多少次，一耗就是一天。试想黄酒馆怎能赚这种人的钱？所以至清末，黄酒馆便纷纷关闭，或改“南酒店”，不卖碗酒。

山东黄酒以东珠市口德胜居的历史最悠久，早年也卖碗酒，后来除发庄外，可以零沽，但不卖碗酒。民国以来，虽然许多黄酒馆都不卖碗酒，但营业并不衰落。山西黄酒味最淡薄，喝的人很少，

所以山西黄酒和山西特产汾酒只能作为大酒缸的附属品，至于独立的山西黄酒馆是很少了。北京酿造黄酒的，以护国寺西口外柳泉居最有名，后来其铺东又在崇文门外开设了“仙路居”，也是酿北京黄酒。柳泉居、仙路居虽都发售北京黄酒，铺东铺长却都是山东人。柳泉居早年也卖碗酒，后来因酒座起腻，甚至要借地打牌才停止卖碗酒。代卖北京黄酒的以安定门外头道桥鸡鸣馆和阜成门外月墙虾米居为惟一所在。虾米居虽然开在关厢，但以能制兔肉脯、牛肉干而出名。

大酒缸

大酒缸是北京平民化的白酒馆，当年多半是山西人开设的。其特点是将贮酒用的缸埋进地下四分之一，缸上覆以朱红的缸盖，代替桌子，周围设凳，酒客环缸坐饮。因此得名“大酒缸”。它所卖的原封官酒绝不掺入鸽粪、红矾等强烈杂物，饮者无慢性中毒之虞。但兑水是免不了的。

大酒缸以卖小碟酒菜招来主顾，它所卖的酒菜不但为劳苦大众所欢迎，甚至文人墨客也以为富有诗意而前去聚饮。

大酒缸的酒菜分为自制和外叫，自制的又分为常有与应时两种。像花生仁、煮花生仁、煮小花生、豆腐干、辣白菜、豆豉豆腐、豆豉面筋、拌豆腐丝、虾米豆、玫瑰枣、冷炒芽豆、豆儿酱、老腌鸡子、拌海蜇、饹馇饸、炸虾米等，都是四时常有的酒菜。像冰黄瓜、冰苤蓝、拌粉皮、拌菠菜、芥末白菜墩、醉蟹、蒸河蟹、蒸海蟹、熏黄花鱼、卤千子米、鱼冻、排骨、酥鱼、香椿豆、鲜藕等，都是应时的酒菜。大酒缸除冷食酒菜外，有的还卖“铛炮羊肉”。如果酒后以二两羊肉多加大葱，外添几个火烧，也可当做一餐，经济实惠。酒菜还有一种“铛炖鱼”是热食中的一种应时菜，分炖黄花鱼和炖厚鱼，前者以尾计价，后者以段算钱。春日乍暖还寒，冷饮小酌后，忽有热鱼一菜带汤而上，不但暖肠开胃，还能醒酒。

大酒缸除自制酒菜外，还有外叫酒菜。当年大酒缸门外，经常有卖熏鱼儿肉、驴肉、刮骨肉、牛蹄筋、羊腱子、牛羊杂碎，白煮羊头肉，甚至有卖苏造肉、卤煮小肠、卤煮炸豆腐等，既可下酒，又可果腹，且售价低廉。此外，大酒缸有带卖主食的，有清水煮饺，馅随

季节而变。“馄饨火烧”虽无好汤，也还是穷人乐的吃法。山西人开的大酒缸还有卖“刀削面”、“拨鱼儿”的，也可作为酒后一餐。

一般大酒缸皆为小市民阶层所设，只有东四牌楼恒和庆，东安门丁字街义聚成设有后堂，尚能号召文人墨客等上层人物，生意也格外兴隆。

果子干挑子

果子干是老北京特有的冷食，它是以大红干（即熟杏晒成的上等杏干）、柿饼加适量的温水浸泡而成，上层覆以熟藕片或梨片。夏天以天然冰镇之，食之酸甜爽口，可以解除油腻。它历来为儿童们所喜爱。

经营此业的小贩皆以“棕绳撬扁杖，各种细瓷具、白漆圆笼，周身铜什件，带环，前放方盘，中置小笼，安锅。手敲二铜冰盏”（《一岁货声》）走街串巷。夏季生意尤盛。

说是“果子干挑子”，实际上是糖豆酸枣、什锦杂食，一应俱全。所卖品种季节性很强。正月里卖次山楂不去核煮成的“糊子糕”，也叫“红果抹咕”；再用小枣加桂花煮成的“玫瑰枣”；以黑豌

豆加碱煮熟后再放些糖，谓之“带汤儿的糖豌豆”。二月以后则开始卖果子干，一直至端午节方撤。四月添上青水杏儿蘸蜜（饴糖），以小秫秸棍裹“蜜”，将刚刚成形的小杏粘在上边叫卖。入夏后，则又添上以琼脂（洋粉）熬成的坨状晶体冷食，白色透明的谓之“玻璃粉儿”，熬制时点上杏干汤成为咖啡色的谓之“桃脯”，漏成长形条条的谓之“小拨鱼儿”。售卖时，均放于碗中，切碎，浇上酸枣汤、杏干汤之类的酸甜调料，成为当时京城一种特有的冷食。

果子干以及上述冷食，从制作到售卖方式均不够卫生，常常引起疾病。故《燕京小食品杂咏》诗云：“杏干柿饼镇坚冰，藕片切来又一层。劝尔多添两三碗，保君腹泻厕频登。”故此，20世纪50年代后即被禁止出售，果子干桃子亦随之绝迹。

卖河鲜儿的

北京人泛称河里所产的鲜货为“河鲜儿”，如果藕、菱角、鸡头米、莲蓬子等。此是夏季至初秋的时令鲜品。从业者有临河支棚而售者，如昔年什刹海荷花市场杨五斧（回民）的杨记藕局、景

四斧的景记藕局，以及卖“灯笼红”大荸荠出名的郑记藕局。此外，也有臂挎小筐沿街呼售单一品种的。

俗云“红花莲蓬白花藕”。果藕皆为白花藕，中端粗大而节短（红花藕细长）。早年以紫禁城周围的筒子河果藕最有名，白嫩酥脆，汁水足，纤维质少。后以“汤山温泉果藕”相号召，实则大宗产地仍在京西六郎庄，其次为清河南岸荷田所产。

菱角嫩的可以鲜食，老的煮食。沿街叫卖的小贩多以“老菱角”为名，街头应时小贩能进入人家门里的，除卖晚香玉、茉莉花的外，只有卖菱角的。卖菱角的总带一把夹剪，有顾客购买时才临时将菱角从中夹开，但不将皮壳完全剪断，剪后合起来，以保持水分。

鸡头米正名“芡实”，本系一年生水草，茎叶、果实都有刺。因其果实长在一个生满利刺的紫包中，形似鸡头，故名“老鸡头”。售者多带皮整售，吆喝“老鸡头才上河吔！”遇买主临时以特制的工具剟取。芡米分为老、嫩、“二仓”（不老不嫩的）三种，以“二仓”最佳。

莲蓬一般不卖籽粒，而是成棵成捆（十棵为一捆）的出售。只有做“冰碗”

时，才剥皮取其籽核与其他河鲜儿配套。

卖河鲜儿的除售卖以上品种外，还带卖鲜核桃、杏仁（多为煮沸过的苦杏仁，但仍很脆），以及“大灯笼红”荸荠、连枝带叶的鲜松塔。同时，他们将果藕（切片）、鲜菱角、鸡头米、鲜莲子加上杏仁、鲜核桃仁、甜瓜（切小块）、蜜桃（切片）搅拌在一起，洒上白糖，放在垫在碎冰的瓷碗或玻璃缸中，谓之“冰碗”。这是夏天京城特有的清凉食品。

卖河鲜儿的季节性很强，从业者只“吃”一夏半秋（但利润很大），秋后即要改行卖鲜果子去了。

西瓜贩子

旧时，北京西瓜市为批发性质，十瓜一堆，趸购的瓜贩，只凭眼力挑选某一堆，不许堆外更换，运回再以拍听的办法，分其生熟，以便作先卖后卖的顺序。

瓜市上批发的西瓜，大部来源于京市西南，其种类很多，产于宛平、庞各庄、良乡、涿州等地的有“画眉子儿”、“黑鬼子”、“大三白”、“绿三白”等瓜。画眉子、黑鬼子皆黑皮黄瓤，乍看相似，不过画眉子瓤色微深，如金黄色，瓜子

色红，瓜形微长。黑鬼子瓤色稍浅，瓜子色黑，这二种味甜适口，为西瓜中的正品。大三白皮瓤皆白，绿三白皮绿瓤黄，真甜的很少。产于保定的有“花皮瓜”（又分绿花、黑花两种），“锦皮瓜”花皮瓜色深绿，上有黑道及黑绿道，皮道分明，锦皮虽似花皮有道，但不太分明，形似满皮暗花。这三种花瓜，有红瓤、黄瓤、白瓤三种，红瓤较多，皆为黑籽，口味较画眉子等稍差，价亦稍廉。产于德州的有“枕头瓜”，形长而细，黄瓤黑子，如为真正佳品，味最醇厚，高于一切瓜，如为劣品，反不如花瓜。

市面西瓜贩以果局、南货店所售多为佳品，他们将瓜刮去外皮一小方，加盖戳记，以示只卖好瓜，并以作为商业信誉。其次为西瓜摊，后列瓜堆，前设木案、木桶，除整售外，并切块零售，且较整售利高。夏日傍晚，西瓜摊皆大肆活跃，摊贩手执去边的芭蕉扇，一面驱蝇，一面吆喝：“斗大的西瓜，船大的块来！”足以吸引一般顾客。还有下街吆喝“管打破，打破西瓜吔！”的瓜贩，分“瓜挑”、“瓜车”两种，挑贩大多为北京人，瓜虽比车贩稍好，但生了不管换。车贩大多为乡下人，手推独轮车，车边

拴网，内盛西瓜，表示来自瓜田，其实也是趸自瓜市上的货。傍晚，叫卖无门时，也在车头切块零售。其中也有推两轮车的，就确乎是本市的瓜贩子了。

吹糖人的

旧时，冷天的庙会或街头，有一种哄孩子玩意儿——吹糖人的。其人肩挑木柜两个，一头用来装工具和原料，另一头则扎一小木架用来插上已吹好的成品，成为样品展示，以招来主顾。

走街串巷的皆以鸣锣代替吆唤，庙市上固定摊位则是不断向游人吆喝："又吃又玩又哄孩儿!"都是边做边卖。通常是将小糖子熬化，趁其未完全凝固时，用两块模子合在一起，用嘴吹之，吹成空膛的禽兽、人物等玩物。常见的有小鸭子、小鸡儿、小兔儿、金鱼、胖娃娃、孙悟空耍金箍棒，都粘在一根小苇棍上。因为是空膛空腔，顾客临买时，可以灌上糖稀、芝麻仁，既是吃食又是玩具。最令人哭笑不得的作品是"猴拉稀"，吹出一空腔的猴子，内灌糖稀，使之从屁股下边流出，流入一小"马桶"中。名称虽然不雅，但颇得小孩们的欢心，争相抢购。

因糖人需制做者用嘴吹，不免溅入吐沫，颇不卫生。所以讲究的人家，大人绝不许孩子买这种食品。20世纪50年代以来是个绝对禁制禁售的品种。

干果铺

老北京的干果铺，几乎都是山西人所开设的，所以有人直呼为“老西屋子”。实际上，干果铺是个海味杂货铺，有的标榜为“南货铺”、“姜店”。但以售卖干鲜果名为主。

这一行业的特点是货品齐全，包罗万象，而且四季兴旺，没有淡月，遇到节日，更是货源充足，门庭若市。正月上元节，不但要卖区别于饽饽铺的细馅元宵，还售卖从河北束鹿、湖南浏阳产的各种花炮。三月清明节，应扫墓之需，卖从南方运来的金银箔（叠纸锞子用）。端午节售卖什锦果馅的江米粽子，以供顾客买去送礼。进入六月，瓜果上市，五月的鲜桃，深州蜜桃、羊角蜜甜瓜、闻香果、沙果，摆列齐全。门口码放着西瓜，大多来自南京，间有德州名品，价格虽比街上推车的瓜贵，但保证个个沙瓤。接着葡萄、鸭梨、苹果陆续上市，于是各店铺预备了大量果筐，供顾客选

购送礼。盛暑，各店铺又采来鲜藕、莲蓬，比荷花市场的藕局还略胜一筹。同时，南方运来的热门货，如葵扇、凉席、温州雨伞、油布也一应俱全。

夏季，南货店制做的酸梅汤，可与琉璃厂信远斋比美。如地安门外聚盛长（“小门姜店”）的酸梅汤远近驰名，例以“打冰盏儿”（两个小铜碗形的响器，一手拍打）的形式为号召。

中秋节前后，大量果品上市，如河南石榴、广东香蕉、烟台梨，摆满店堂，果香四溢。而且月饼随之上市，但不卖北京饽饽铺的“自来红”、“自来白”，而是卖南方苏式月饼、广东月饼，显着款式高雅。节后，届入“已凉天气未寒时”，各号门前支锅，卖糖炒栗子。九月，南方鲜货登场，广柑、甜柑、蜜橘、沙田柚子，罗列满堂。

入冬后，各店铺用山楂、白海棠等制做蜜饯海棠、温朴、金橘、红果，均装入绿釉瓦罐中出售，人们买回去，可以用里边的蜜汁拌梨丝、拌白菜心，红白相映，为酒席增色。

一进腊月，它们便卖“腊八粥”的果料，如菱角米、薏仁米、鸡头米、榛瓤、葡萄干、松仁、桂圆肉、糖莲子、

百合瓣，都是在别的铺子买不到的。腊月二十三祭灶以前，必定要把关东糖、糖瓜、南糖摆出来应市。

春节前，各店铺搜罗的货更全，如金华火腿、兰州百合、南京板鸭、富阳冬笋，上至燕窝、鱼翅、海参、干贝、银耳、下至口蘑、黄花、木耳、花椒、大料、虾仁、虾皮、紫菜、鹿角菜、应有尽有。干果如大小花生、黑白瓜子、核桃、小枣、榛子、大扁（杏仁）、桃酥（油炸核桃仁）。水果如苹果、柑橘，还有木瓜、佛手，这两样是为上供用的。但大宗买卖还不在此，各店铺把一年来卖剩下的蜜饯果脯，如桃脯、杏脯、苹果脯、糖藕、瓜条、金丝枣、糖莲子，加上核桃粘、花生粘、搀成“细杂拌”。把苹果干、梨干、杏干、海棠干、糖豌豆、金糕条、柿饼条、胶枣、天津豆（花生仁裹面而炸之）掺成“糙杂拌”，一包包地包好；把桂圆、荔枝、生栗子、红枣、柿饼配在一起，包成“年饭果”。顾客买回去，把它摆在“年饭”上，供于神佛前，以取吉利。

过年期间，各店铺的生意越做越宽，什么泗安酥糖、山西醉枣、苏州采芝斋奶油瓜子、上海冠生园陈皮梅和嘉应子，

以及烟台张裕葡萄酒、天津三星白兰地。罐头食品有沙丁鱼、烧四宝、鲜芦笋、菠萝蜜等各种新颖食品和洋酒也全上市了。各店铺还卖百果年糕、桂花年糕、猪油玫瑰年糕，制作精细，一般饽饽铺难与相比。

干果铺这种买卖，清末民初，在北京约有几十家之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前门大街的通三益；西单牌楼的源兴昌，西四牌楼的隆景和；阜成门大街的吉益公，地安门外大街的聚盛长、聚盛公、聚盛和三家。它们都是三间至五间大门脸，两进至三进勾连搭的店堂，后面有堆房，有的还自设果窖，使货品保鲜。

这种店铺从不利用广告自我宣传，而是以长期的信誉和热诚的服务取得顾客的欢心。所以，在近百年的营业中持久不衰。

果子市

旧京城内，共有两大一小的果市，两大是前门外果子市，谓之“南市”，德胜门果子市为“北市”，一小是东直门外十字坡果市。另外还有枣市、甜瓜市、西瓜市……

从果市在历史上形成的顺序来看，

是先有的北市，后有的南市。南市以细果南鲜为主，北市以北方所产的各种果子为主。从规模和经营范围来看，南市大于北市，南市有果行六十余家，北市仅有十三家。南市经营有南鲜，如甘蔗、桔、柚、柑、橙、菠萝、鲜龙眼、橄榄、百合、香橼、佛手等。北鲜如桃、杏、梨、枣、李子、樱桃、石榴、苹果、海棠等。干果如花生、瓜子、榛子、杏仁、核桃、栗子、白果和各种果脯、果干等。瓜类如西瓜、甜瓜、鲜瓜等。河鲜如藕、芡米、慈姑、莲蓬、菱角、荸荠等。北市只有北鲜和干果。南市有万成、同顺、顺昌、恒星四大果行，北市只有同发一大果行。十字坡在东直门外下关南岔，路南上坡，土阜纵横，中有果店六七家，各以姓氏为店名。如老金家店、老卢家店……专卖北山糙货，城内零售小贩皆到此趸货。至于枣市，以安定门外二道桥北，东直门外鸾桥较大，其他各门也有枣市（如朝阳门内南水关糖市，也有果枣，但果不称店，枣不称市），还有颐和园后青龙桥北岔，夏秋之间的枣市，为西路产枣总汇，北京名品“董四墓大枣”即在此发售。西瓜市在阜成门外月坛，甜瓜市在东直门外鸾桥。每于夏季

均热闹一时。

北京的果子市始于明朝，但南市的形成与发展是在清初，果子市的店铺多建于乾隆年间。当时果子生意十分兴旺，竞争非常激烈。清政府为了便于控制管理，曾发放“伢帖”（也叫官帖，两张毛道纸，一正一副，盖有官印，用墨笔书有经营品种）。在南北两市，比较老的字号都拥有这种“伢帖”，如南市公盛、天盛拥有桃杏仁、栗子帖、恒兴、万成、顺昌拥有花生帖、同裕、德昌、天义成、顺昌、同顺、德成、三胜福拥有西瓜帖等等。对某种竞争激烈的商品，政府还发给“独帖”，如在南市里的红果店（也称贾家店，字号永盛），从清初一直至20世纪五十年代始终垄断红果经营权。另外，枣邓家、瓜子崔家也是世代专门经营。

果贩子

清代只有果局，北京人通称为“果局子”，发售南鲜北果、河鲜时物，并且成为世传职业。市面上平时并没有大果摊，只有应节（如中秋节）果摊，不带南鲜细果。早年果局子做的是以“诚信为本”的名誉买卖，各有存货，自办窖

货，不卖劣品，不欺顾客。

清末民初，市面上的果摊多于果局，竟然将果局子顶了。果摊虽然生活挑费小，但因露天，受风吹日晒寒侵关系，损耗比果局子大，于是，摊主在卖货时不得不使用偷梁换柱的“手彩儿”，以劣货顶好货，原果局子的信用一扫而空。

民国后，各大庙会及什刹海荷花市场又有一种小果摊，所售大半为糙货及鲜核桃等，平日推手车下街，集期即支车为摊，将果列为大小堆，以堆论价，售价公道，适合当时平民、贫民的消费水平。

果贩的货源俱来源于南北果子市。当年果子例于破晓开市，十点钟达到高潮。北京全市城外关厢所有果局、果摊、街头叫卖的游动小贩，分别汇集各市。每个批发果店门前都用头号长筐箩，分装各种果品，五光十色，陈列在街市两侧。基本上不零售，买果子起码要五斤以上，趸柿子起码要百斤。趸货人要买某种果子，问好价，到柜上先交钱，取得宽约八九分、长不满三寸的东昌纸纸条，行内称“写帖儿”，上盖有小水印和收款数目，拿这张小帖儿，再到门外果摊上，交给掌秤的卖货人才能得到果子。

另外，在果子市趸货，按规定，是不准动手挑拣的。

果挑下街叫卖的小贩，分“京挑”、“乡挑”、“山背子”三种，都是卖北果的大路货，绝没有细果南鲜。京挑是卖北京的糙果子，如杏儿中的“老爷脸”、“关公爷”、“果子吧哒”、“北山土杏”等，以及有残缺而个小的“筐底货”，下街卖给小孩。其次是乡挑，通常是下架双筐卖甜瓜的高挑，挑盘之上蒙以蓝布。从业者都是京东农民，在农闲或歇工年份，来京作高挑买卖，冬春卖大酸枣，夏天卖带霜的“虎拉车”（果行称“虎拉槟”但并非槟子）、沙果、苹果，秋天卖“秋果”（大海棠）、沙果梨、酸梨等。虽是糙货，却很整齐。所趸购之货大半为东直门外十字坡发售的北山货。至于山背子，是乡下人（也可以说是山里人）打扮，身背荆条筐，沿街吆喝“大叶白的蜜桃啊”“玛瑙红的大蜜桃啊”！话中表示出来自山间自家果园所产。大宅第认为其不经果市，货必佳廉。所以除向果局购买外，只照顾山背子果贩，故山背子倒能挣一些钱。早年，山背子以卖大桃为本业，鸭梨、苹果为副业，后来才有卖其他鲜果的。

茶 馆

清代，人们多视品茗休憩为最好的享受。当时，凡中等以下之人，尤其是在旗的，最讲究"泡"茶馆，适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茶客中，有的是干吃"钱粮"，终日清闲的"太平父老"；有的是刚交完差使的官员、衙役，甚至官至三四品者，亦置身其间，"与圉人走卒，杂坐谈话，不以为忤也。然亦绝无权要中人之踪迹"（《清稗类钞》）。

当时，茶馆分为两种。一种是江南茶馆，屋梁下悬有红铜的"搬壶"，中贮沸水，随时可以取用。它虽然以卖清茶为主，但还设有"红炉"（即烤糕点用的烤炉），带卖红炉点心，谓之"南果"。二是二荤铺式的茶馆，具有茶、点、饭合一的性质，但所卖的食品有其固定的套路，如窝儿薄脆、盐水焖炉儿、蜂糕、肉馒头、烂肉面等，经济实惠，符合当时一般市民的消费水平。由于茶叶与水资是分计的，故有提壶，自备茶叶的，仅出水钱而已。

民初，相继出现了中小型的清茶馆，一些悠闲遛鸟的老人，都在这里驻足落座。沏一壶小叶香片来消磨时光。他们

叙家常，评时事，说茶经，论鸟道。茶馆主人为扩大营业还举办“串套”活动（即听鸟鸣），邀请养有好鸟的知名老人前来赛会，因此，众多鸟迷们都慕“鸣”而来。午后，则是拉房纤的、收买旧货打小鼓儿的在此聚会，互通信息。比较热闹的是书茶馆，不但有评书、鼓曲演出，还有戏曲爱好者在此“过排玩票”。此外，还有棋茶馆，顾客可以边品茗边对弈。

郊外有“雨来散”式的野茶馆，有其特有的“野趣”。如南豁子外的野茶馆，设于永定城壕之滨，河水滔滔，源源混混，故在此落座的游人，除了粘知了（蝉）、网蜻蜓、捕天牛，还可垂钓，且可解衣入水，沉浮于青波白浪之间。倘逆流而西，可游抵永定关厢，如顺水而东，则可泅至左安桥下。浩浩东流，茫茫五里之水域，诚为一最大的游泳池。一些青少年在此相率“扎猛子”、“骑水骆驼”，或搜捕鱼虾，或捉蚌蟹，或捉迷藏于水底波间，或“叠罗汉”于苇塘蒲地。待夕阳西下，微风轻拂，暑热消退，始游回茶座，彼此各具一席，畅饮开怀，佐以茶座上特有的炸田鸡腿儿、炸蚂蚱等野味，确别有一番享受。

茶叶铺

北京茶商最早往南方采办茶叶的，为冀州一寇姓。清初，安徽人方、张、汪、吴四家始运茶来京。其后，山东商人孟姓（瑞蚨祥鸿记）也加入此行，成为六大茶商。再后，又有山西人在京经营茶叶店的，最早是山西人开的南货海味店代售茶叶，后来改为山西人开的茶叶铺代售海味。一切采办、尝样、主持皆为山西人。

由于安徽为产茶名区，歙县附近尤盛，所以，北京大茶店在歙县茶山附近均设“坐庄”，采办新茶，更有包一角茶山的。小一点的在津“坐庄”，更小一点的便向津方茶庄趸货。

北京茶叶铺所卖的茶叶大致有以下几种，首推茉莉香茶。即包括所有一切经过茉莉花窨焙的香片茶，其中细目不下二三十种，以“蒙山云雾”、“蒙山仙品”为最佳，其次有“黄山凤眉”、“黄山仙雾”、“双窨梅蕊”、“双窨茗芽”、“老竹大方”、“铁叶大方”。此类香片茶也曾当做贡品，由两淮盐运使呈进，以黄山所产为主。至于此类四字雅名，只是茶店对顾客的称谓，实际内行各有简

名，即便是顾客也只说多少钱一斤的×茶，没有呼名的，所谓×茶就是香片、龙井等名。这是茶店的大宗货。此外，还有“珠兰清茶”、“武彝红茶”、“龙井绿茶”、“普洱茶”等，各卖一路主顾。茶店例来标榜“红绿花茶”，红即红茶，绿则指龙井及六安素茶，至于所谓的花茶，有的说是指茉莉花、珠兰花熏出来的茶叶；有的说指茶店代卖的玫瑰花、菊花熏成的茶叶；有的茶店则把花茶列入绿茶中。其实，就是前边所说的茉莉香茶。

茶店趸进茶叶后，首先加以筛分，先拣去茶梗，再以数种大小不同的筛子依次筛分，分为高、中、次、末四等。茶店亦熏制香茶，其所用之茉莉花系右安门外各花厂所产（每年旧历五月节收买）。熏成的茶往往用“双熏”、“双窨”等名称。筛茶熏制均甚费工夫，故茶店用人往往达三四十名之多。

逢年过节，京郊四乡八镇均有前来选购者。老北京居民清早遛鸟的，为茶叶不走味，总是现买现喝。茶叶铺历来是一两茶叶包五包（二钱一小包），一斤包八十包。另外有两包奉送，表示酬谢。历年春节，茶叶铺照常营业，不休息，

谓之“连市”。并且从头年腊月二十左右至次年正月灯节之后，代卖花盒、鞭炮。平时则代卖一些成药，以扩充财源。

卖羊头肉的

羊头肉上市的季节性很强，它几乎在立秋之后，跟着甜葡萄脆枣儿一起乘着秋风而来，给人以亲切的时令感。卖羊头肉的小贩用一椭圆形本色（不上漆）的小木箱，摆在“大酒缸”门前等主候客；有的则是走街串巷，用两头翘的棕绳扁担，挑两个大圆扁筐，晚间则手提一只方形玻璃油灯，用来照明。边走边吆喝，“哎，羊头肉哎！”羊头肉比猪头肉简单，除一只羊头外，别无他味，顶多带一些羊蹄或蹄筋儿，也一律白煮。一只羊头从当中劈为两半，部位分为脑、眼、两颊肉和舌头，各有专名，舌头谓之“芯子”，上膛（硬腭）谓之“天花板”；巧舌（软腭）谓之“通天梯”；颊肉称为“脸子”，以羊脸子味最香醇。这些都很廉价，可以零切零售。

羊头肉味道全淡，但不宜蘸酱油和其他调料，只靠售者自制的一味特种五香椒油，这种盐带有不浓不冽的茴香味，其色青灰，香味淡远，与清淡的肉味配

合得极为协调。盐不装在瓶罐之中，而是用一只挖空的巨型牛角，将其根部锯开，另用一只大木塞为盖，以毛蓝布扎紧，从角尖处钻一小孔，从小孔中把里面的香盐均匀地洒在肉片上。故老北京人有句歇后语“卖羊头肉的回家——不过戏言（细盐）”，盖出于此。

20世纪30年代，卖白煮羊头肉最出名的是前门外廊房二条，以推车设摊的清真“羊头马”一家。其特点是制做精良，重视清洁卫生，售货人身着蓝布衫、白围裙、白袖口，所有用具无一不洁。他家使用的香盐是特制的，除了大料、花椒、小茴香、桂皮、肉果之外，还有丁香、砂仁、豆蔻、山柰、白芷、甘草等，与盐共研成极细的面子。羊头肉虽切成薄如纸的大片，但不散不碎，到口咀嚼有咬劲，筋道但又不生，这是任何卖羊头肉的无法比美的火候技法。

卖驴肉的

老北京街头巷尾卖猪头肉（熏鱼儿）的都背个木制的红漆柜子，谓之“红柜子”，而卖驴肉的小贩都背个木制本色（不上漆）的柜子，故谓之“白柜子”。这是旧京卖熟肉的所特有的标志，也是

多年所形成的惯例。

谚云“百菜白菜美，诸肉猪肉香”。但有的“酒鬼”却说“非也，美味无比的首推驴肉”，还说什么“天上有龙肉，地下有驴肉”，真把驴肉捧上了天。

老北京的驴肉的“活驴香肉”为上品。驴肉作坊分为北路和南路两类，北路多开设在安定门外白坊村，从业者屠宰活驴煮肉，肉质较细，而且洁净；南路作坊多开设于永定门外南苑一带，为降低成本，牟取利润，多收买一些死驴煮肉，甚至以死骡马肉顶替驴肉，质劣且脏，没有经验的“外行”人往往上当。

驴肉尚咸，以口重为妙。只求“咸中有味”，不求“淡中之鲜”。所以，回锅重煮的次数越多，则肉味越咸，味道越美。卖驴肉的皆称自己的货是“回锅驴肉”，以招徕顾客。

真正的上等驴肉细腻，以瘦肉为主，分为肘子、里儿、下碎（内脏），也分为肠、肚、心、肝、肺各部分。甚至“驴鞭”也成了“鲜货”，因为中间尿道有孔，切出来酷似铜钱，故谓之“钱儿肉”。在买不起山珍海味、鸡鸭鱼虾的情况下，驴肉则是较为理想的酒菜。所以，驴肉作坊和驴肉贩子也自成一行。

过去，北京市面上，还有以骆驼肉冒充驴肉来卖的。因为骆驼行进要靠人来拉拽，故卖骆驼肉的在懂行人的面前，美其名曰“拉牛肉”。其肉质粗糙，且无驴肉之香，只能卖给一些嘴馋而囊空的“赤贫”者流。

卖熏鱼儿肉的

黄花鱼，即文人习称的“石首鱼”，这是种季节性很强的食品，一般只限于在春三月春雨闻雷的时候上市，人们视为“时令鲜品”。吃法很多。当年，有一种作坊是将长约八市寸大小的黄花鱼用两片秫秸皮前后夹牢，以细绳缚定，上火熏烤而熟，然后，连同其他熏制的肉食一起批发给游动小贩，走街串巷吆喝叫卖。谓之“卖熏鱼的”。但只要季节一过，黄花鱼下市，这种买卖立即改卖其他熏制的海味和肉食，主要是熏对虾和熏猪头肉。此外，还有熏猪下碎（如猪肝、猪肥肠、猪脑儿、口条、粉肠之类）。有的还代卖熏鸡、熏鸡蛋，秋来卖熏螃蟹。由于黄花鱼进货较难，成本也高，季节性又强，所以，演变到后来，卖熏鱼的干脆甩开了“鱼”字，不再卖熏鱼儿，全部改卖猪头肉。因此，人们

都叫他们“卖熏鱼儿肉的”。

熏鱼儿肉从色味上都不同于一般猪肉制品，其色绛紫，味道醇厚。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多食而不腻，与膘肥的酱肘子迥然不同。且含高蛋白，营养颇丰。既可佐餐，又可下酒。民间将它视为“发物”之一，小孩接种牛痘时，吃些熏鱼儿肉可以让病毒充分发出来。

但猪头肉一物，如制做不得法，难免腥恶，难以入口。同样的猪头肉，家制不如店制，店制的不如街头小贩的熏制。同样的猪头肉，赶市摆摊的不如串街叫卖的小贩熏法得味，这当中自有独到之处。所以，久吃熏猪头的，专等定时下街的小贩。

老北京的街头巷尾，每于夕阳西下，便有身背红漆木柜的小贩吆喝：“熏鱼儿面筋来哟！”或吆喝“烂肉哎！”这便是卖熏鱼儿肉的。因为一般制做熏鱼儿肉的作坊，多是夜间及上午作业，下午两三点钟才能搞批发。凡是自己没有作坊的从业者都须等到落日前才将货趸来，然后走街串巷地叫卖。有的还给老主顾送货上门，不等主人出来就拍门而入，将货放在门房或交给下房仆人，每天送货多少有其固定数目，等到“三节”（春

节、端午、中秋）再算账讨债。有的则是靠在一个“大酒缸”（酒馆）门口等主候客。遇有买主儿，便以背箱的盖板背面充作案板，巧手用刀，将肉切如纸薄，这样，既得吃又好看，四两猪头肉就切一大盘，其实只是盖个碟子的大面而已。

熏鱼儿肉从来不招苍蝇。据说，熏肉所用的松木屑所带来的烟气是可以驱避苍蝇的，这样，更显得干净卫生，给人留下个好印象。

北京人吃熏鱼肉讲究夹在一种特制的“片儿火烧”里，这种火烧是发面洒椒盐儿烙成的，像两层皮的烧饼，中间空隙很大，为给夹肉留有空间。只有卖熏鱼儿的才代卖这种食品。

卖熏鱼儿肉的还预备一些等外熏食，如熏猪心、熏猪肺、熏苦肠儿……其中，熏苦肠儿有如一把把棕色的细彩带，香中却稍带些苦味，老北京人把它买来切碎剁烂，掺在大米饭里，当成家庭宠物猫、狗等小动物的饲料。

卖糖葫芦的

北京冬季街头以及庙会上有许多挑担卖冰糖葫芦，他们将山里红、海棠等不同的果子用竹皮穿上，以铜锅熬冰糖

或白糖，一串串地往锅里蘸后平放在石板上晾凉，糖如玻璃，吃着香脆不粘牙、颇受儿童们喜爱。

干鲜果品店出售的糖葫芦较为精细，上好的山里红去核加上澄沙馅或山药泥馅，使之外露，一黑一白，在红彤彤的山里红上形成深浅对衬的视觉效果。同时，还要镶上瓜子仁、核桃仁，外蘸冰糖，在灯下一照，五光十色，颇能吸引顾客。

走街串巷卖糖葫芦的则肩担两个大木盘，上有半弓形竹条用来插货，外设玻璃罩。其品种较多，有山里红、压扁的熟山里红的，有白海棠、熟山药、山药豆的，还有橘子瓣、葡萄珠、荸荠的……

当年北京最有名的是“吴大少的冰糖葫芦”。吴大少是西城吴宅的大公子哥儿，喜食冰糖葫芦，不仅自己喜食，而且自己动手做，经常让听差的到果子市采购山楂、海棠、山药等原料。红果必须直径盈寸才要，豁开去核，使每个山楂半开半合，填上澄沙、枣泥、豌豆泥为馅，瓜子仁摁在吐露在红果外的馅上，成一朵小花，极为精致。山药去皮后，挖成不同形状的小孔填上馅儿，摁上山

楂糕丁、青梅块，成为黑、白、红、绿相间的圆柱，割成小段，间穿山楂，用上好纯糖熬制。吴大公子逢年过节用他自制的冰糖葫芦馈赠亲友，后来居然自己购置一套挑子，让听差的上街去卖，他跟在后头吆喝："葫芦来咳——冰糖儿的咧！"每串售价不及成本的一半，完全是为了取乐儿，因此小孩编顺口溜说："半膘子，吴大少，卖葫芦是玩票。"

后来吴宅败落了，吴大少生活没着落，有人就出主意何不卖糖葫芦。他就向朋友借了点钱，在旧刑部街口租了一间门面，开了个干果局子，但主要是卖冰糖葫芦。因为市面上的冰糖葫芦无法与其相比，生意十分红火，后来很多人向他学艺，成为特制的精品。

烟袋铺

烟袋铺是京城的老行业，一般都开设于清咸丰、同治年间，如隆福寺街西天成姓记烟袋铺，打磨厂天成烟袋铺，地安门外双天成烟袋铺。地安门外鼓楼前烟袋斜街就有广顺号等数家烟袋铺。它们都是一百年以上的老字号。

旧时，烟袋铺在门前都横挂或竖立一大烟袋模型为店幌。它们出售的烟具

主要是烟袋和烟袋荷包。其除门市售卖外，还向外地批发，有的还跑内蒙古、西藏及蒙古等地销货，供应蒙藏客商。其成品来源多为北京崇文门外东晓市的手工作坊。同时也有的烟袋杆趸自南方来的“坯子”（半成品），由本店再加工为成品。烟袋杆加工后，再配上烟袋嘴和烟袋锅，即可出售。

烟袋铺的成品有：旱烟袋、水烟袋和烟袋荷包。

旱烟袋的烟袋嘴，有玉石、翡翠、玉石根子等制品，也有铜的、料器的制品，烟袋杆有花梨的、乌木的，也有斑竹和凤眼竹的。烟袋锅一般都是铜的。一杆烟袋的长度是一尺二和一尺五。也可以根据个人爱好，随意指定长短，故也有杆长至五六尺的。

水烟袋则全部是铜制的，全长有二尺，部件较复杂，烟嘴又高又弯，下部的前端有水壶，水壶后部设一盛烟的盒，其一旁插火纸捻，水壶上端插烟锅。抽时锅内装满烟丝，水壶内放半壶水，吹着火纸捻，抽烟人手托水烟袋，仰脸而吸。但北方抽水烟的人极少，故店铺备货不多。

早年比较讲究的烟袋荷包，是用绸子做成的，黑色较长的大荷包，面上钉

带两条，上压蝙蝠形或车轱辘钱。抽口用的是丝绳，绳端缀上荷包坠，常用的荷包坠是一大铜钱，或玉钱、玉扳指等，既是实用品，又是饰物。

抗战以来，由于交通不便，同时纸烟兴起，抽旱烟的人逐渐减少，当然，烟袋铺的生意也日渐衰落了。

卖豌豆糕的

旧京的街巷中，常有一种卖豌豆糕的小贩，背着个圆笼，或挑个担子，手中敲着一面糖锣“喤，喤，岂喤喤，喤，喤，嘁喤喤”，纯是一种哄小孩的生意。

他们将豌豆去皮，蒸烂为泥，用以做成各种玩意儿，可吃可玩可供观赏，一般都是现场作艺，招徕主顾。他们的手艺亦分两种。

要粗手艺的多是身背木质的圆笼，手敲小锣。他们只不过是将豌豆面放在木质的模子里，磕出几种玩意儿，例如各种花朵、乌龟、螃蟹，或者用手捏一些小鱼、小猫、小狗、小兔、小鸡、小鸭等动物。在这些玩艺中间都加上特制的糖面和芝麻，成为名符其实可吃的“糕”。同时，他们还用一种赌博的方法引起儿童的兴趣。一般都是用两根大铁

钉子，其中一根下端绕些丝线，系在手中，让小孩抽之，抽出带线者即赢，反之则输。例如每抽一次一百元，赢者即可得一百三十元的豌豆糕；输者则得八十元的豌豆糕。因其钉头均不相同，常与之打交道的小孩已心中有数，故抽签者，十分之九皆赢。其实这乃是一种减价推销的方法。

耍细手艺的大多挑担，前面放一玻璃格子，里面陈列着各种已经做好了的玩意儿，后面是一个圆笼，里面放些原料、工具和颜色水。他们的手艺非常精巧，制做各种玩意儿决不用模子，如用手捏出各种水果、各种动物或带花朵的花盆。做完后，再染上各种颜色，与真的无异。假如捏个龙睛鱼，他们就取一块豌豆面，里面加些芝麻，很灵巧地捏成一个鱼的轮廓，然后用小刀分开尾巴，再以小竹刀在鱼身上打出鱼鳞，用一把旧木梳在鱼尾上印出骨刺的印痕，最后用细竹枝在头部扎两个洞，将两小粒熟豌豆嵌了进去，再染上红绿颜色，作为眼睛。至此，就成为一尾栩栩如生的龙睛鱼了。

耍细手艺卖豌豆糕的人很少，只不过在各大庙会如：东岳庙、白云观、厂

甸及什刹海荷花市场能够见到。因本小利薄，从业者将能维持生活，故后辈无人学徒，此行遂即失传。

打糖锣的

早年，有种走街串巷专卖儿童玩具和小吃食的挑子，时人称它“要货挑子”。由于他们以敲打小铜锣招来主顾，所以又叫“打铜锣的”。其所卖之货的特点是：一土、二杂、三为价格低廉。所谓“土”，即纯为民间手工操作生产的玩具，带有“传统性”、“原始化”的性质；所谓“杂”，即品种多，一件玩具能包括吃、喝、玩、乐多种功能：三是售价符合当时儿童消费能力。总之，打糖锣的是在充分研究儿童心理、爱好和经济承受能力的情况下形成的，是一种小本经营，哄孩子的买卖生意，只能维持最低生活。

所卖之货与季节有关，如冬季年关，在食品方面有糖瓜、白糖棍、芝麻棍、糖饼、糖片、冰糖子儿、螺丝糖、桂花糖、香蕉玫瑰糖、酸枣面儿、杏干酸“皮带”、果丹皮、玉米花、凉炒豆、小麻子儿、小蒲包小炸食……玩具方面有：聚宝盆、摇钱树、玲珑塔、消寒图、乞

巧图、升官图、吹筒箭、小弩弓、纸花篮、小折扇、压腰葫芦、小沙燕、琉璃喇叭、扑扑登、围棋、象棋、老虎棋、骨牌、泥骰子、地陀螺、小哨子儿、皮老虎、皮猴儿、皮耗子、布老虎、布娃娃、泥美人、泥胖小子、各种泥模子、高帽子、毛鬼脸、黑胡子、西湖景、转花筒、积木、苍蝇笼、木勺、木碗儿……还有代卖花炮的，如机器鞭、摔炮儿、小旗火、耗子屎、滴滴金儿、黄烟带炮、手拿花、炮打灯儿……其货多是趸于晓市。

有的带所谓“抓彩”，吆唤“没有白，没有票，这个买卖真公道”。有用白矾水写字条，让小孩抓来按在水盆里映字儿的，根据所映出的字决定得何奖。有也一大纸匣子，分出二十五格，每格装着实物，或写有奖品的纸条。上边以纸密封，抓彩者任捅一格。还有用一木盘，四角摆上玩具、食品，中设一转轴的木杠，杠的两端各按一条带针的线，让转彩者转动其杠。看线所系之针停在何处，即得何奖。如落于空地则为输，照例给两块糖，表示“没白没票”。

糖 房

旧时，北京人每于旧历腊月二十三晚上祭灶。俗说灶王为一家之主，监察人间善恶。腊月二十四朝天，向玉皇大帝奏本。故人们在灶王上天前夕以关东糖为供，给他送行，意为粘住灶王之嘴，让他“好话多说，坏话少言”。

最早，祭灶用的关东糖为糯米所制，系上好佳品；是由关东运来的。那时每年冬天，关东客商都将关东糖、关东菸、吉林松子等土产运到北京出售。到京后，即在朝阳门外东岳庙以东一里许的关东店住下来，熬制关东糖，进行批发。这种真正关东糖，质料很重很细，口味微酸，中间没有蜂窝，每块重分一两、二两、四两，多是长条四方的杠子形，坚硬无比。

后来，京城逐渐有了自己制糖的作坊，谓之“糖房”。但都是以麦芽糖（小糖子）仿关东糖者为多，谓之“醋色白货”，质轻中有蜂窝，远不如真关东糖质量好，但他们颇会艺术加工，将麦芽糖做成甜瓜形、北瓜形，甚至做成葫芦、小鸭形，但都泛称“糖瓜”。表皮上有带芝麻与不带芝麻的两种，但中心都是空

的，皮厚不及五分。虽大小不一，但仍以分量计价。大的糖瓜有重一二斤的，不过多用于幌子，买的人很少。

早年，北京的糖房还制做所谓“南糖”。此以小巧玲珑见称，种类很多，不外条、块、片几种。例如：冰糖花生仁做的厚片名“花生酥”，长方条的名“花生条”，雪白色的细条名“鸡骨”，外蘸芝麻的为“芝麻鸡骨”，内灌酥糖末为“带馅鸡骨”，芝麻蘸的长圆条为“麻寸”，黑白圆块的名为“黑白芝麻饼”，外面芝麻圈中间加澄沙的为“澄沙圈”芝麻糖，小方块上蘸红白糖如芙蓉糕的名“红白面麻糖”。总之，因形命名。

据有关资料记载，民国二十一年（1932 年）北京有糖房约二十余家，如西四丁字街万泰成、宫门口天成、阜成门永盛魁、西直门义元、德胜门协泰、海兴隆和德泉涌、安定门义兴盛、东四义兴泰和景贤、前门外东海、崇文门外东海兴和实诚、宝魁、广安门广海和兴合盛、恒元、德兴玉等。其中以广安门内大街和德胜门内大街的糖房最为有名。由于这两处糖房集中，手艺精湛，产品优良，在同业中颇有名望。这些作坊所在的地方均以糖房称之。广安门内的称

糖房胡同（在牛街西侧），德胜门内的称糖房大院（在后海西端）。

20世纪30、40年代以来，由于“洋糖”盛行，土产土造的“白货”一落千丈。所以，糖房大部都改做新式的糖果了。

奶酪铺

奶酪号称“人间美味”，一向被人们誉为“饥者甘食，渴者甘饮，内以养寿，外以养神”。所谓“酪”，汉代已有此名，叫作“酥”，实际就是奶油。李时珍《本草纲目》“释酥”说“酥乃酪作”，“性与酪异”。但北京的酪为纯奶制品，同时还善于经营，发展多种奶制食品。

清末，北京还有很多家奶酪铺，但到20世纪20年代，东城只剩了有限的几家，西城只有二和顺、二和义两家，进入30年代也都停业了，只剩下西安门内香蕾轩一家，又残存了几年。只剩下东安市场的丰盛公和前门外门框胡同的“奶酪魏”几家，北城地安门外大街还有老德顺一家。据说，丰盛公奶酪铺曾受慈禧的恩宠，曾发给它“腰牌”（内廷通行证），以奶酪供奉皇宫。吉祥戏院许多名伶在上装之前或卸装之后往往到丰盛

公吃碗奶酪。还有知识界、文化界人士也常年光顾。

奶酪是奶酪铺经营的主要品种，它是牛奶加工凝冻而成的酪浆，其质洁白，凝而不散，以碗定形，讲究能够“合碗”。还有一种果子酪，在酪的表面放上瓜子、核桃仁、山楂、青梅等，在装饰上非常美观。夏天，有冰镇奶酪，成为一种清凉小吃。

奶酪铺另一至味是奶卷、奶饽饽。奶卷等食品是以纯奶蒸发掉水分，打成纯奶油，再用器皿定形，制成奶皮，用以包制成奶卷或奶饽饽。此外，还有酪干，是用牛奶温水炒成，收干水分，成为微黄色的块状，其味带有焦香。另一种名“水乌他”（蒙语）是用奶水加糖冰冻而成。

奶酪铺制品中，除奶酪外，只有奶卷最受欢迎。不过，售价较高，只有富人才能享受。抗日战争爆发后，奶酪铺及奶制品均逐渐消失。

荷包铺

清代，荷包既是一种有实用价值的装饰品、工艺品，又是一种礼物。原来，名门闺秀在未出嫁前，都特意做些小件

的刺绣针线活，俟过门之后，举行“开箱礼”时，赠予公婆，当作“贡献活计”；赠给婆家其他成员的则谓之“见面礼”，意为让长辈们检验自己的针线活计如何。但有的少女无暇自做，或根本不会做，乃买于街市，亦曰“活计”。

清代，皇帝在节年或庆典之日，赏赐大小臣工时也有荷包（内装银两）。一般民间办喜寿事时，亲友也常以荷包当成礼品。

作为礼品的“活计”一般以盒为单位，每盒少者四件、八件，多则十六件。其中包括槟榔荷包、眼镜盒、扇络、钱褡裢、扳指盒、表套、怀镜、小靴掖、烟荷包等，有的或有手绢、汗巾之类。商界通称为“荷包”。其做法种类很多，有平金、绣花、戳沙、打子、纳锦、堆绫等等。但均须“过行”（由这一行转交另一行代做叫“过行”），但成品皆由荷包铺售卖。

旧京，荷包铺非常之多，前品大栅栏、鲜鱼口皆有此行。前门洞左右荷包巷卖此货者更多，所以该巷以所卖的货物而得名。

烟儿铺

旧式烟铺，清代有的代开银票，名“烟钱铺”，一经官面登记，挂出钱幌子来，便能兑换银两，开具银票、钱票，可以行使于市面。代理人们和商家存款，与大银号炉房全有往来。除了不能开“龙票”代理官库以外，一切本地的金融流通均能办理。

但一般烟铺只能经售烟叶、烟丝，兼售槟榔、豆蔻、宿砂等药物。北京最著名的烟儿铺有前门外大栅栏南豫丰、鼓楼东大街北豫丰、隆福寺街恒丰厚等，开业最早。至 20 世纪 30 年代末，还很发达。店内冬天点着盘香，夏天点着火绳，供过客吸烟使用，此是传统的旧规矩。

烟儿铺经营的烟类很多，烟力最大的以叶子烟为主，计有“顶上拣选关东烟”、“顶高关东烟”、“高关东片”、“中关东烟”和“原把台片烟”等几种，还有“白定子烟”，掺在烟叶里可以减低烟力。另有一种带香味的烟，只妇女老太太们喜欢吸，通称“老太太烟儿”、此即“兰花烟”，吸者还要带点兰花子，以增加香味。故俗说“老爷子烟，关东杆儿；

老太太烟，兰花子儿”。由此可以想见两种不同的烟力。还有一种“杂拌儿烟”，也是“老太太烟”，香味很浓，但又不同于兰花烟。再有一种“水烟”是一种贵族化的烟，以烟丝为主，有“永茂净丝烟”、“锦川净丝烟”、“中和净丝烟”、“顺和幼丝烟”、“顺和老叶皮丝烟”、“青条丝烟”、“丹凤牌皮丝烟”、“老国旗牌皮丝烟”、“金狮牌皮丝烟”，连高中次不同等次的也有十几种。带牌号的皮烟丝，虽然是后兴之品，也有近百年的历史。

此外，烟儿铺还代售槟榔，有生槟榔、熟槟榔、胡槟榔和盐水炒过的槟榔数种。有的在柜台上安有不足一尺长的小铡刀，有顾客来买槟榔时，临时将槟榔放入铡刀切成四瓣。还有去口中秽气的豆蔻，有名的是“东坡豆蔻”、“紫豆蔻”确和入药的豆蔻大不相同。还有“蓿砂”以“整蓿砂”、“广蓿砂”为上品。

大粪厂

旧时，有专门经营大粪厂的山东人，他们依仗自己在历史上形成的“粪道”（收取粪便的范围）雇人掏粪、晒粪积肥，卖给农家当肥料，从中获利。

据说，清乾隆年间，曾由“街道厅”规定四城城外的粪厂子掏粪的范围，办法是划出城门附近的城内几条街道若干胡同，由某粪厂负责掏运粪便，并指定他们在此范围内的僻静之处设立公厕，时人谓之“官茅房”。后来，城内市区中心各地段也都划出“粪道”，分别由城外各厂派工掏运。为避免粪业之间争夺“粪道”权益，官方便让厂主持“白字”（一种原始私人字据），打三家连环铺保，到左右翼去“税契”，领照。从此粪厂主人即将“粪道”视为个人私产。平时，雇人到自己的“粪道”范围内掏粪、倒马桶。不准外厂或他人侵越。

被厂雇用的工人，谓之“粪夫”，每天推着元宝形的粪车或身背粪桶、手持粪勺挨门挨户掏粪、倒马桶。人们贬称他们为“屎猴儿”。还有些未被粪厂雇用的粪夫，经常去串胡同捡拾人畜粪便，卖与城外粪场子为业，偶尔也被住户叫去掏茅房，但这是侵犯粪厂的粪道的行为，算是“偷粪”，一旦被发现就会发生争执。粪夫之间有时也为了“争屎”而抡起屎勺子打架。时人称这种没有粪厂归属的粪夫为“跑海的”。故老北京有歇后语说“大头鱼背鞍子——跑海”——

本此。

粪夫将掏来的大粪在粪厂里加工，由于质量和加工的方法不同，又分为“粪捡儿”和“粪片儿”，其中以“粪捡儿”质量为最好。粪厂子例于处暑后，开收从城里背出的较好较纯的“桶粪”进行晾晒，先在平地上铺一层炉灰面，然后将粪稀倒成条状，次日再用勺子剁成鱼鳞形、饺子大的“捡儿”，再晒成黑紫光亮的粪干。“粪捡”论“浅儿”（即柳条荆条编制的圆盘）出售。“粪片儿”比“粪捡儿”质量差，加工也粗糙，首先，铺地的炉灰厚，用勺子摊，用杈子翻，晒成茶盘大小、不整齐的片，售价比“粪捡儿”低，但利钱并不少。另外，还有论车售卖的粪稀和冻块。

粪厂的主人恃其私有的粪道大发其财，不仅不出钱白得肥料，还按月收取清洁费，名为“月钱”。三节（年节、端午、中秋）还要按月钱比例加收“节钱”。有还借故勒索“酒钱”。这些钱都是厂方拿大份，工人拿小份。所以，时人管开粪厂的老板叫“粪阀”、“粪霸”，言其巧取豪夺盘剥之甚。

快手公司

这是一种加工烟卷的摊儿或作坊。

加工烟卷所需的烟丝，都是来自人们吸剩下的烟头。为此，“快手公司”雇佣一批捡破烂的小孩，他们每天出没于人声鼎沸的市井或街巷，手拿一根竹竿儿，头上绑一枚钢针，见到烟头时就用钢针将其剟起，积攒一定数量后送到“快手公司”出售。每卖出一斤烟头，可得铜元十大枚。

收来的烟头来自不同的品牌，大多肮脏不堪。然而，“快手公司”并不对其进行加工消毒，而是直接用来制作卷烟。

其制作的工具极为简单，仅为一个人加一架如抽屉般大小的手推式卷烟机。这台卷烟机不过两三块银元，但使用起来比手工要快许多。“快手公司”的生产程序也很简单，不像正规卷烟厂那样，要经过选料、抽梗、切丝和包装等一系列复杂的工序，只是将收集来的烟头儿剥开，连同烟纸一并放入机器的布兜内，双手一推机器上的圆形铁棍儿，即可制出一支一尺多长的烟卷儿，用剪子剪成四五节儿，就算完工。卖时并不卖整盒，而是零支卖。

由于这种烟的加工成本极低，而且零支出售，所以很受广大劳苦大众的欢迎。当年，这类“快手公司”大多集中在天桥一带，服务对象也大多是来天桥闲逛或家住附近的穷人。其销售方式，大多是由小贩从“快手公司”趸货，然后手托装着盛满零支烟卷的铜盘，出没于市场、戏园或杂耍棚子出售，以高声吆喝吸引顾客。

响铜作

旧时，人们在习惯上管各种乐器泛称“响器”。清代，北京有种手工作坊，专做鼓乐当中的铜质打击乐器，如大小铙钹、铜锣等，谓之“响铜作”。据说“响铜”是我国一大发明，是我国特有的产品。用铜加药料（此不外传）铸成乐器，声音格外响亮，不加药料者不响。此为一特技，一般普通铜工是绝对不会做的。西洋人到清末为止还没掌握这种技术，他们制造的铜质乐器，美观而不响。如果用铙钹之类的铜质打击乐都须到我国购买。所以，响铜作、响铜铺能挣到外国人的钱。

当年，民乐队所用的青铜大锣、大小铜鼓（大小疙瘩锣）；民间香会文场所

用的“八扇铜”，即铙钹、镲锅等八件铜质打击乐，以及戏剧文场用的大小锣、镲锅，甚至卖针线手摇的小铜铃（锣），都靠响铜作制造。民国以来，过年期间，为改变聚会赌博的陋俗，城乡内外的商号均预备一份锣鼓，令伙友敲打，进行娱乐，以慰寂寞，避免赌博。所以，当年响铜作、响铜铺生意非常兴隆，形成一大行业。只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才逐渐衰微。

教　馆

旧时的学塾称为“蒙馆”，即儿童启蒙教育的初级小学。历来门外贴有“招榜”，大书一“学”字，下书“秋爽来学”四小字，也有写“童蒙任附”者。这种私塾，先生只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课本，如果塾外标榜“经文书馆”，则是由上述三本小书教起，直教到《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一整套四书五经的课程。

我国的教学制度历来有放寒暑假之说，旧时私塾亦然。照例是酷暑过后，秋高气爽就要开学。一般根据孔夫子的诞辰，即八月二十七日开课，但新生不一定都要这天报到，而是允许“择日来学”。

旧私塾课堂内设有“至圣先师孔夫子之位”的神牌，以为膜拜。开学时，每个学生都要请一股高香（但不一定都烧），由老师拈香，大学长带头行三叩首礼，然后，再给老师叩首，这就是开学典礼。最后，由学生依次向老师递上红封套，内装现金，上书“束脩”字样，这就算是缴纳了学费。据说，清末花“大个钱”时，每人无非每月四五百钱。此外，学塾夏日搭凉棚、冬天取暖，都要让学生摊钱，而且三节（春节、端午、中秋）两寿（教师和师娘的生日）以及春秋祀孔，都要给教师送礼。

当时，教书先生多是些落魄文人，官场失意，走投无路，只好去当“教书匠”。俗云“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孩王”。《同治都门纪略》有诗云：“蒙馆舌耕不自由，读书人到下场头。每逢年节先生苦，亲去沿门要束脩。”甚至有的先生难以养家糊口，只好抛却斯文架子，在学堂里做起小买卖，向学生兜售零食，如糖果、小点心之类，借以弥补亏空。

收生姥姥

旧时，有一种专应民间助产接生之事的妇女，老北京人俗称她们为“稳

婆"、"老娘婆"、"收生姥姥"、"吉祥姥姥"。前清时，从事该行的有明有暗，明者为官方批准的，例于门口外悬挂一白漆黑字的木牌，下缀红色幌绸，牌上写着"快马轻车，吉祥姥姥"，或写"快马轻车，×氏收洗"。暗的则不挂牌，只凭亲朋邻里介绍，是未经官方批准的。其实这两者均未必有正式的行医执照。民国后，才由主管部门审查发照，并加以训练，受公立助产医院的指导，废除了旧时一些不文明、不卫生的做法。

这种旧式的收生婆，有的是姑媳相传，有的是母女相传，所以就出现了"老某姥姥"、"小某姥姥"，成为家传的职业。她们大多没有什么文化，有的上过几天私塾，有的没有念过一天书，一个大字儿不识，甚至连助产基本知识的《达生编》都念不下来，其业务技能只凭家传，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而已。如果真要遇到"横生倒养"的难产，也束手无策。

从前，妇女怀孕两三个月，呈现有"吞酸"（嗜好酸食）之症，即请医生诊断，如果被确定已有"获麟之兆"，乃择吉邀请"吉祥姥姥"来家诊视，谓之"接姥姥认门"。姥姥对孕妇检查诊视的

方法很简单，一是掐孕妇的中指，断定生男还是生女及产期远近；二是看孕妇的肚脐儿，看腹形平凸形状，仍是断定生男生女。当然，生男生女也未必能应验，即便不应验，也没人向她追究责任。这只不过是根据人们重男轻女的心理说几句吉祥话，讨产妇及其家属的欢心，多得几个“喜钱”而已。

孕妇怀胎十月，瓜熟蒂落，无须助力。所谓“赶阵儿”只是转胎。胎儿落生时，有正生（即头朝下），有坐生（即先露臀），均属正常分娩。极个别的才会“横生倒养”，或盘肠产，或先下一手一足，皆属难产。稳婆束手无策时只能叫产妇的长亲向神佛许愿。胎儿降生后，稳婆首先要给剪脐带，旧法不用刀剪，而是用银簪挑脐带，以烧红了的火箸烙断，然后敷以煅白矾粉。降生后的婴儿如果不啼哭，为了由腹呼吸改为肺呼吸的常态，其实只须轻拍婴儿的后背或浸于温水即妥。但旧收生婆必大拍婴儿三下，随拍随叫婴儿父亲的乳名，什么傻柱儿、三秃子、二嘎子叫了个欢，实在可笑。

只要婴儿一啼哭，稳婆就算胜利完成任务，下炕给产妇的婆婆和娘家妈请

安道喜。并叮嘱几句产房注意事项，遂领“喜钱”告辞而去，专等“洗三”之礼了。

嫁妆铺

过去，嫁女普遍重视陪送嫁妆，谓之“陪奁”，满、汉皆如此，满、蒙旗人尤甚。满族旗人家庭多钟爱女孩，男尊女卑的思想意识较轻。一旦出嫁，父、母必为她精心办上一份体面的嫁妆，使她心满意足，高高兴兴地走向新的生活。人们认为，妆奁如果体面、阔绰、能使婆家人和婆家的亲友高看一眼，在某种程度上能高抬姑娘的身价。有利于婚后妯娌之间的地位平等、和睦。故富户办嫁妆往往不惜代价，要求好上加好，多多益善。就是贫苦人家也要想方设法尽到自家经济能力，给出嫁的女儿办些嫁妆，哪怕是象征性地办一些，也得盖盖大面，否则就会被对方亲友指责为“不尽情理”。

汉、满两族嫁女，虽然都要陪送妆奁，但具体要求却不一样。近人所著《燕市积弊》谓“凡聘姑娘的主儿，不论大小户、贫富，但有一线之路，都得陪送点嫁妆。满礼是男家糊好了屋子就得。

一切陈设，桌椅板凳，直到炕席毡条，都归娘家这头陪送。汉人净管桌面上的摆设，不管桌椅木器。所以，汉人的嫁妆比满洲的省俩钱儿。”过去汉人婚前置设屋内家具摆设是有分工的，习惯上，男置木器家具，女置陈设摆设。故女方陪奁只顾桌面上的东西和手使的用具。

嫁妆有其固定的套路，例如：仅炕面桌面上的摆设和手使的东西即有：箱子一对，匣子一对，镜支一个，锡蜡扦一对，锡油灯一盏，帽筒一对，盆景一对，玻璃鱼缸一个（从前用牛角），铜盆一个，茶叶罐一对，油盒一对，粉盒一对，锡茶壶一个，锡酒壶一对，立镜一个，手镜一对，茶碗四个，筷子一箍，痰盂一对，鸡毛掸子两个，布掸子一对，鞋拔子一对，马子一个。以上套路之内的东西，除极贫寒之家外是非有不可的，只能多，不能少。如果缺其主要的一两件，必被他人讥为外行。故此，当年市面上有种嫁妆铺，懂得满、汉两族人的风俗习惯，专门为人设计、掂配嫁妆，用主只要说出打算花费的数目，店主马上拿出一套至数套丰俭不同的嫁妆清单来，让用户斟酌选择。保证合乎传统习惯，能盖过大面。这样，事主就不必再

分心劳神，省去了很多麻烦。所以有的家主办嫁妆都乐于与这种店铺酌商办理。最后由嫁妆铺满包满了，事主只听店方的“一口价”就算了。

不过嫁妆铺必须资金雄厚，广为置办，而且社会交际要广。为了扩展业务必与大宅门管事的、媒婆、合婚命馆先生经常联系，扫听信息，闻知谁家要办嫁女的喜事，主动将妆奁单递过去，兜揽生意。甚至托人请客拉买卖。但民国以后，社会风气变了，嫁女妆奁多尚俭朴，故此行生意逐渐衰微，终于成为民俗行业中首先被淘汰的一行。

老妈子（女仆）作坊

北京人管女仆叫“老妈子”或“老妈儿”。《清稗类钞》引《京中竹枝词》云：“粉面油头青布衫，女奴多半是京南。老妈称谓何曾老？弱齿无非廿二三。”清同治、光绪年间，进京打工的老妈子以河北三河、通州为最多。她们不外乎是丈夫失业或被丈夫遗弃，生活无着，或因受婆家虐待私自出逃。更多的是家乡闹灾，粮米无收，不得已，进京谋生。

凡进京待雇者，都凭铺保住进所谓

"老妈子作坊"（亦称"老妈儿店"，民国后称"佣工介绍所"）。老妈儿必须自带行李，房钱按日支付，饭伙自理。凡介绍一个女仆，店主就要剥削她第一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并向雇主索取赏钱，每年按节与女仆分节赏，数目以女仆所得多少为标准，同时还向雇主索取节赏，来个"两头吃"。这种勒索直到这个女仆被解雇为止。失业的女仆如欲急谋职业，必须贿赂店主。所以，有点钱的女仆刚从张家下来，便能被派往李家，那些穷苦无钱的女仆，待雇一年半载的也没人理。

老妈子作坊的主人皆为一老妪，是为介绍老妈子的"媒人"。在京住户或各省新来之绅商，雇用女仆多托她代为介绍。凡被介绍雇主家的女仆，一般试工三日，彼此合意，先开工资，不到一个月主人若将该仆辞退，工资例不找还，若仆人辞主，则须按日退还工资。民国初年，其工资每月三至四元，每届年节有赏。此外，还讲究有零钱，如主人请客酒宴、打牌，均有赏钱。雇主家小孩多的及零钱少的，她们都不愿去，但迫于生活，有时不得不委曲求全，聊以偷生。

清末民初，北京老妈子之多实冠于其他各省市。据不完全统计老妈子作坊多至千处，若以每处十人待雇计算，失业的老妈子则为万人左右，若以在业老妈子计算更是不计其数。老妈子及老妈子作坊亦系当年旧都一大行业。

扛肩的

老北京有一种特技搬运工人，名为“扛肩儿的”，俗称“窝脖儿”。当时，这种工人既隶属于喜轿铺，又隶属于车脚行，因为他们主要是给贫户嫁女时扛嫁妆的（富户嫁妆多的用人抬），另外就是给大家主搬家时扛些神像、佛龛以及硬木家具、古玩玉器等珍贵物品。

扛肩工人技能很高，操作时，通常将物品摆在一块长二尺五、宽一尺八的木板上，用软绳拢紧，将物品固定住。然后在肩上置一布垫，再放一根板条，蹲下身来，由二人将码好物品的大木板抬起，放在他的肩上，最后低头挺身，把物品一“窝”而起，一手扶板条，一手摆动，便大步流星地行进了。到了地点，仍由二人给卸肩。他们技高心细，很少有打碎主顾东西的情况，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信誉较高。

扛肩的不但要善于负重，善于长途行走，还要会拆卸、安装硬木家具，因为有些大件不拆开就无法“窝”起来。同时，还要懂得礼节，会讨好请赏。给人家送妆奁时，把东西一放，马上要给本家道喜；给人家搬家，如有佛龛、神像，照例要走在头前，到新居后一定要先通知本家老爷接神，然后需两人抬进去，把龛放好后，照例要给主人请个安，说声：“您新乔多吉啦！”这样主人自会多赏些“酒钱”。

扛肩业属于重体力劳动，不养老，不养小。他们为生活所迫，一生如牛马负重，不敢稍有松懈。到晚年多落下不同的残疾，有的脖子上长个大包，有的成了驼背，境况多窘困凄凉。

粮　行

古代，前门外粮食店街、东城的米市大街、北城鼓楼一带是粮商集中的地方。清代，大粮商多集中在西珠市口至广安门一带。到民国后期全市经营粮食的商户约有一千三百多家，居各行业之首。这些粮商经营各有侧重。早时，专门经营大米的，称“米局子”；经营大米白面的，称为“米面庄”；经营五谷杂粮

的，称“陆陈行”。后世，粮店皆综合经营，成为米面杂粮店，有的还兼营蔬菜、油盐酱醋等杂货，成为油盐店与粮店合二而一的店铺。这是老北京街头巷尾到处可见的买卖生意。

较大的杂粮店货源很广，除本地伏地米面外，还有来自东北关外的大豆、高粱、玉米，来自河南的白面、小米、徐州黄豆，以及口外小米、绿豆等货。较大的米面庄，售卖的面粉以产地分类，美洲粉、香港粉为上品；上海粉、彰州粉、徐州粉、天津粉、保定粉为中等粉；北京粉、青岛粉为下品。大米亦分国内外两种，国内有上海米、南京米、江西米、九江米、芜湖米；产于近郊者又有京西米、南苑稻、玉泉山稻；其来自国外者有西贡米、仰光米等。

旧京，米面杂粮店的面柜上总是做一木架，吊着一杆大秤，秤杆尾端插进一个木质大钱的方孔内，钱上书刻“招财进宝”；柜的正中上端供有利市财神关圣帝君的神龛，上书“以义为利”。前者把秤杆插进钱眼里，后者又标榜“以义为利”，似乎发生矛盾。其实，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充分反映了旧商人深知“义”与“利”的关系。

杂粮店旧谓“陆陈行”，店内挂有“陆陈广聚”匾额。原来古代人们把粮食概括成六种不同的形态，即方、芒、角、楞、稻、穗。芝麻长在小方筒里是为“方”；麦类成穗有针芒是为“芒”；豆类长在豆角里是为“角”，荞麦实粒有楞是为“楞”；至于“稻”则是指大米，“穗”则泛指糜黍之类。“六陈”即将上述各种不同形态的粮食罗列在一起，以便交易。“广聚”的含义则不外乎“趸八方之粮，聚四海之财”。

明代有人对粮商、粮行有专著，并在首页题《西江月》词曰：“聪慧蒙童易晓，愚顽皓首难明。世间六陈任纷纷，此事粮之根本。知粮不知其性，如临暗室昏昏。漫同高手细评论，视彻无容方寸。”

煤　铺

清光绪庚子（1900 年）以前，北京无铁路，亦无煤厂，仅街市中有煤铺多家，最大的煤铺有两家，即内城东四牌楼钱粮胡同的鸿顺煤铺，外城观音寺的大德生煤铺。当时，煤铺均自养骆驼，赴西山自运“南末北块”。北京的煤多来自南山、北山，南山即周口店（南窑）、

坨里（北窑）以产煤末出名，北山即门头沟、安家滩、禅房、斋堂、板桥等处，以产硬煤块出名。故老北京的煤铺都在门口以“匠”字标榜“乌金墨玉，石火光恒”，“自采南山高块”。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铁路修到永定门，即由火车运煤，始有煤厂之设，北京的煤铺才用大敞车直接从煤厂趸煤。煤铺除筛选煤块外，主要是做方形的“煤简”，至于摇煤球至今不过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这些选煤、摇煤球的工人，均是煤铺雇的伙计，多系河北定兴人，时称“定兴黑子”，居民则泛称他们“煤黑子”。他们有相当技术，起初是将煤简儿放在筛子里，在木棍上来回滚，摇成煤球。后来改进操作方法，改用“吊筛”，以木杠做成架子，用绳系住筛子，来回摇动，较前简便省力。最后，改用“花盆筛子”，只要手力均匀，煤球就越发光净。最快者每天能摇三、四千斤。

用户到煤铺买煤，谓之“叫煤”。煤铺预备圆形扁筐，无论硬煤煤块，每筐五十斤。有叫煤者，马上装上敞车，送货上门，管装管卸，不外加费。煤铺一律代售“南山高炭”和劈柴，与煤同时发售。

厨 行

旧京普通人家办红白喜事全是用“口子厨行”，通称“跑大棚的厨子”。这种厨子不是受雇于饭庄、饭馆，而是自己要手艺、等待用户召唤。

“口子厨行”在北京四九城各居一处，每个“口子”都有其固定地点，为了树字号，不肯轻易迁移。每个“口子厨行”都有承头人，即相当于饭庄子、饭馆子的经理。因为属于非正式营业，一般不称掌柜的，只称王厨子、李厨子，或尊称为“王二爷”、“李二爷”。承头人的住家，就是“口子”的聚集点，其所用的厨师都是半固定、半临时的。一个厨子一旦吃上某个“口子”，就要经常干下去，绝不轻易“跳槽”。还有一些“冷庄子”（不卖临时散座便饭的庄馆）的厨师，也附于某一个“口子”上待雇应话。最早“口子”门前也挂着“堂号”木牌，如“六部口某某堂王”、“旧鼓楼大街郑”。后来，为避免缴纳苛捐杂税，才大都改为“厨行某寓”。

“口子厨行”为用户做菜，通常分为“散作”和“包席”两种，散作只是大体上有个菜码，办事时视来宾上座的情况，

决定桌数，厨房做一桌菜，本家付一桌的钱。包席是事前说好，大致上有多少号人情，预备多少桌，每桌都是什么菜码，连同工钱一共多少。如果剩下归本家所有，临时加席另议。

厨子应了活后，首先让办事人备好整砖、碎砖、黄土、净水，由厨灶伙计相度地形，砌上圆形灶，谓之“陀罗”，是用来坐蒸锅，下边蒸米饭，或煮面条，上边馏肘子、丸子等“合碗菜”。同时砌上炒菜灶，是以砖砌成的长方形灶，其类别、规格不一，各有名目。视用主办事的天数，人情号数和预备的席面多寡来决定。

凡办事规模较大的，厨子（包括打下手的油行）历来头天就要进棚试灶，做些准备工作，谓之“落作儿”（“作”读平声）。主要是做好“合碗菜”，如米粉肉、扣肉、肘子、南煎丸子之类，一碗一蒸，预备多少桌席，必有多少碗菜，许多不许少。根据惯例，这天早、午、晚都得给本家做几个糙菜，谓之“落作儿饭”。如果办事的规模小，厨子则须等到办事的当天早晨才进棚操作，行话谓之“暴抓”，也叫“暴攒儿”。这种情况自不会有什么“落作儿饭”。同时，菜肴

也比有“落作儿”的要粗糙些。大抵都是用火锅做成，临时分碗，再配上一些熘炒菜就行了。

旧称厨行即指“了桌掌灶”的。凡担任切肉、切菜，谓之“抱刀”；凡在灶上掌勺，掌握火候的，谓之“抱勺”；配菜者，谓之“爬梯子的”。

至于油行，是指在厨房里看锅灶的，行话谓之“看水道子”的，看五六截大笼屉（内蒸鱼、肉）者，谓之“看大塔”的；肘子、丸子等肉菜下了蒸锅后，进行合碗扣菜的，谓之“钉碗的”。这些给厨师打下手的“小工”都是“油行”。他们将菜馔摆到“接手桌”后，茶房才能往席面上摆。

旧时，红、白棚里厨行、油行、茶行是相辅相成的三行，三者必须互相配合，才能把活干好。

茶　房

老北京人对茶馆、饭馆、酒馆、旅馆的服务人员均泛称“伙计”，并不称为“茶房”，只有对红白棚（包括在饭庄子里办红白事的场面上）与厨、油两行人分工合作，兼管赞礼的杂务才叫“茶房”。

茶房必须是地道的北京人，说一口流利动听的京腔京语，否则赞起礼来就不中听。他们有师有徒，师徒授受相传，自成一行。茶行口子无固定形式，南城茶行口子有其固定聚集点，而且分为南礼、北礼两种。北城有名，但无聚处，遇有雇主时，由承头人挨门现找。

茶房通称为“茶行”，它与厨、油两行人在红白棚里相辅而行。茶房专做台面上的事，与厨房互为表里。通常办红白喜事的人家，正日子若用两名茶房，头天落作儿（升火试灶，准备菜馔）则用一名。茶房必须比厨、油两行人早到，黎明进棚后，即一身不闲，操持各项杂务，如调摆官座儿，张挂桌围软片，套上椅帔坐垫，架好圆桌桌面，铺以白台布，摆好接手桌——茶桌、油桌，安置好火炉、水壶、水囤。等水壶、水囤的水烧开后，还要将全部茶具、餐具统统洗涤干净。然后，在每个茶座的茶壶里沏好菜卤，串满酒壶，置于水囤中，小菜置于碟中，一切准备就绪，就敬候贵宾光临了。

出份子的亲友陆续光临后，茶房先配合知宾进行招待，让座、斟茶，听候“监席”人（即撒绯子的）吩咐，摆男宾

席、女宾席各多少桌，由茶房向厨灶上发话传令，照例由油行师傅将各种合碗菜等大件放到油桌——接手桌上，再由茶房往台面上摆列。每摆一桌，茶房必须主动计数，向监席的如数索要绯子，以便日后结算。原则上，既不许漏计，也不允许虚报，因为事关信用。

　　如果本家来客很多，摆席必须紧凑，茶房必须很好掌握，决不让就座耽误时间。亲友就座后，茶房马上支会本家主人到各桌之前行礼“谢席”。

　　茶房在红白棚里是半个礼宾，所以，当茶房的必须懂得满、汉礼俗。满蒙旗人办事，茶房可以暗中指挥本家或亲友之间的礼仪，使双方行礼如仪，不失体面，但不让茶房喝礼，以保持严肃大方。汉人办事则必让茶房喝礼，如宾主行礼时，由茶房在一旁赞礼打圆场，以保全盘礼仪周隆圆满。如果本家主人和本家邀请的司礼人在礼节上有疏忽之处，亦由茶房及时提醒；若当事人根本不懂礼节，则由茶房事前教会，谓之“拉串儿”。总之，决不会让办事的本家主人与亲友失礼露怯。别看茶房在红白棚里是半个礼宾，其实一位真正的好茶房必须是个“礼仪通”，其掌握的知识很广，上

至《大清会典》的条例，下至民间的“婆婆大全”无不通晓，备而不用。

茶房还应是个美食家。清代，茶房都会做北京风味的甜食，如山药糕、山药饼、慈菇糕、莲子羹、奶卷等，不下百余种。这些小点心可以直接上席，成为宴会上所特有的食品。但可惜，这种手艺逐渐失传。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会做些简易的小食品，如玫瑰枣、糖核桃、炒红果、温朴、蜜饯海棠等。还有的庄馆茶房能泡制黑酱菜，并会做些细豌豆黄、芸豆糕之类的小点心，作为“四到底”（四干、四鲜、四点心、四冷荤）席面上的辅助食品。但多数茶房在宴会上只能“摆台”，削削果皮、掰掰桔瓣，如果能把黑、白瓜子用糖水粘成“小塔”摆上去，那就很不错了。

剃头棚与剃头挑子

剃头匠原属“整容行”。始自清初，清政府为了统一全国人民的衣冠、发式，曾两次下令强迫人民一律剃光前额，梳上大辫。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包派“包衣三旗”的剃头匠，在地安门、东四、西四、正阳门等主要路口，搭起席棚，内供清帝圣旨牌，凡过往行人有留发者，

便拉入棚内强行剃发，违抗者当场杀死，将人头悬在棚杆顶上示众。当时，这种剃头棚，全是官棚，并不收费。后来清政府为了彻底贯彻这一命令，便扩大剃头匠的队伍，准许清军入关时在京东各县掳来的民伕，向政府请领牌照，在各街道、胡同建立剃头棚作剃头生意。从此，北京就出现了私营剃头行业。当时干这一行的大部分是武清、三河、香河、宝坻等京东各县的人，尤以宝坻人最多。以清初直至民国二十年左右约三百年里，北京的剃头行业大都由宝坻人担任。

清初，剃头的这一行业，除剃头棚之外，还有剃头挑子。此又分为“下街挑子”与“桥头挑子”，前者是走街串巷，后者是固定在某个桥头，如后门桥，北新桥、银锭桥等。清初这种挑子也是有定额的官差。

后来，剃头的逐渐形成一种私营个体行业，但所用的挑子、工具，一如旧制。挑子的一头是热炭炉，上座铜盆，立杆上挂着象征“剃发上谕”的磨刀布。后又挂上“朝阳取耳，灯下剃头”的招牌。另一头是个红漆小柜，当作顾客座位，柜上钻一方孔直通第一个抽屉，是让顾客付款用的，下层抽屉是剃刀。从

清初至民国剃头的一直是以铁“唤头”作号召。但须按规矩使用，做到所谓“三不鸣”，过庙不鸣；过桥不鸣；遇同行不鸣。行规颇严，后来也渐松懈，光绪年间经过一次整顿，稍事规范。

至于理发师，清代只各公使馆中自带。光绪庚子后，大饭店中始有之。至市面上有理发馆，则始于民国初年，且多为日本人所开设。

修脚的

旧京，修脚的人是一种要手艺的行当，也是一种服务行业，带有足部外科医生的性质，但彼时却被人们所鄙视，认为是“下九流”，说他们是“江湖”上的生意。

修脚的向来分为三类，最没有本事的只有奔澡堂子内要手艺，必须按规矩为客人服务，不准有任何敲诈行为。其待遇最低，每给客人修脚一次，柜上只给他们制钱一文，谓之“工钱”，余者都归澡堂所有。但每日两餐是吃柜上的，无非是玉米面窝头菜汤而已。其最大的收入是每天可分得一大份“零钱”。民国后，由于币制改革，每修脚一人次，由制钱一文改为铜元一大枚，稍有点本事

和心计的多是腰里掖着刀包子，打着竹板去走街串巷，在居民当中兜揽生意，如商家、住户之人修脚，可将其唤入室内操作。其工资不多，一人次仅二三十枚，但他们为了增加收入，本来客人的脚没有多大毛病，他便故意夸大“病情”，不是说有“脚癔”，便说有“鸡眼”。并依足部筋骨血道，使劲按其痛处，只要客人一呼痛，他便说“有足疾，须根除，否则定成大患，日久恐难举步。”如果客人愿意根治，他便假装从客户脚部皮肤粗厚之处，修下些“鸡眼”、“膙子”，再给点外敷药。最后，要了大价，客户只好照付。此外还有的是在山坛庙迹临时摆个浮摊，江湖上谓之“搁明地儿”。为招来游人，他首先将一幅画有各种脚疾的图样拿出展示，并且用一木棍指着图样向围观的游人讲述各种脚病的病源，什么“瘊子”（大痦子）、瘤子、脚鸡眼、脚垫、脚痔、脚漏、脚气，都说得原原本本，头头是道，足以服人，这样，也能招来客人。他们向来看人行事，见客人肯于花钱，便夸大“病情”进行敲诈。但有的修脚的是“靠地儿”的长摊以挣长主顾的钱，必须得有“回头客”才成，所以不敢花言巧语地做手

脚，只能规规矩矩地耍手艺。

民国以来有些女子修脚的，专能在人的脚指甲上修出各种的花卉、羽毛、山水人物，（还可染上不同颜色的指甲油）可为一绝。招引得许多贵族公子、小姐们纷纷求修饰足部之美，不过价格奇昂，每人次约大洋二三十元不等，结果修脚的大发其财，但这种风气并没持久，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澡堂子

旧京，澡堂子是实用性的，且是多功能的，除了洁身保健这个主要功能外，不论过去、现在，澡堂子都是兼带吃、喝、抽、赌、玩（棋、牌、唱）综合实用性的设施。

据说，沐浴业是由旅馆业引申而兴起的。《京都梦华录》载，宋代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甜水巷设有浴堂。北京最早的沐堂则在西四附近，名为“涌泉堂”，开业于清顺治年间（1660 年前后），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清末民初，提倡维新，社会风气逐渐开化，清洁卫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浴池业遂兴旺起来。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回民穆紫光首先在前门外杨

梅竹斜街仿照上海浴池模样，建起了三层楼式的“东升平”浴堂。其规模“灿然可观”使人眼界一新。民国以来，澡堂子为适应市场的需要，遍地开花，尤其是繁华闹市，澡堂子几乎平均半里地就有一家，而且都是颇具规模的浴池。

老北京的澡堂子都有其固定的模式，规范化的设施和经营方式。普通官塘（大池子）分为温、暖、热三池，塘内设有搓澡用的木床、木凳、木枕、丝瓜瓤、皂角石、搓脚石等物。头等盆塘有带套间的“对盆儿”。还有一般盆塘只供单人洗浴。有的添设女部，如果一家子夫妇领着小孩去洗澡就可以包个单间。

普通官塘（大池子）外边大厅里的散座是供顾客洗后休息的，分为雅座、普通座两种，俱是以木板隔成的小床铺，以每一对铺为一单元，床上有枕与枕巾、床单、浴巾，床下备有木拖鞋。两床之间放一炕桌，普通座上只备简陋的茶具。雅座的小桌上放有帽筒、小镜子及全套茶具。座位上端钉有统一的木横梁，是给顾客挂衣服用的。高级盆塘单间内则有衣柜、穿衣镜、梳妆台，台面上有雪花膏、香皂等，相当讲究。

浴池业的从业人员大多数是河北定

兴县的人，少数为易县、涞水人。他们父子授受，邻里相携，从而形成了此业人员的地区性。

马粪厂

民国的后期，骡马粪都是与其它的粪合在一起，用于农田肥料。清代，北京未修筑铁路以前，煤炭全靠骆驼运输，成本很大，售价也高。因此，骡马粪便当作燃料，用于生活、生产，以辅助煤炭之不足。当年有所谓“马粪厂”，均系山东人所开设，一般都设有较宽阔的场地，作为晒粪厂。平时雇人到各处捡拾骡马粪，或包买住户、铺户马圈之粪，但只要骡马的粪，不要别的粪（因别的牲畜粪不是草质粪）。买回场中摊平晒干。平时存货极多，往往将粪晒干成为草末后，即堆积成垛，高达两三丈，平齐壁立，远看好似一大垛细草纸，异常美观，可算是绝妙技术。

马粪厂将晒干的马粪卖给各小户人家及卖吃食的小贩，如烀白薯、羊头肉、猪头肉、粳米粥等作坊作为燃料。由于骡马粪进价很低，卖价并不低，所以有利可图，形成一专门行业。但自从有了火车运输之后，煤炭供应充足，价钱便

宜，故没人再以马粪当燃料，此行乃随之自消自灭。

香面摊

清末民初，每逢盛暑，街头有卖香料者，但均属土产，如“松子”肥皂、香豆面，再则即应时之香面而已。

香面内裹细纸，外装透气的罗纱锦囊，刺绣颇工，当出于女红之细针线，确为一种很有观赏价值的工艺品。

盛暑时节，人们除佩戴“芸”、“降”，“茄楠”等香的“十八子”（手串）外，就只有戴香面口袋了（挂在内衣的二纽上）。据说可以祛炎夏之汗腥气，所以，三街六市无处不有香面摊。

卖香面的生意人为招徕主顾，置有阔绰的设备，无论在何处“撂地”，必高搭毛蓝布帐，成一长虹状，谓之“仙人过桥”式，上挖“五福捧寿”窗孔，殊为可观。内设栏柜式的大案子，上陈玻璃瓶，几无隙地。还有当作招幌的大麋角、麝香皮子等。帐篷上端悬着各种式样不同、大小各异的罗制纱裁的香囊，任顾客挑选。

其卖法则是以唱当先，其唱词不外乎以现有之香品为题，编成小曲。如

"这个香，送停当，回手再取那个香。"一边唱，一边以铜匙向各大小坛罐中，依次掬取，倾诸纸上。经他一唱一夸，甚至不值几文的金毛狗、干木瓜之类，也均登上龙门而高其身价。如铲木瓜、金毛狗时，必唱"木瓜乃香中之王，专去汗渍，金毛狗专避五毒。"另一伙计则接唱："金毛狗儿咬邦邦，惊醒楼上木瓜娘，木瓜姑娘开言道，叫声丫环小麝香，听言良，为何金毛狗儿叫汪汪，莫非是木香贼子把墙跳，来盗姑娘紫降香。"唱至一段落，一人必道白："伙计，常言说得好，货到街头死，肉贱鼻子闻，又说是卖瓜的，不说瓜苦，卖酒的不说酒薄。诸位，话可又说回来了，真金不怕火炼，好货不怕人看，您的眼睛是观宝珠，嘴是试金石，来，来，来，我送上您一点儿，诸位列位在其位，您扰我一鼻子，试验试验，考究考究，不好您只管嚷嚷，不算您欺生。"说着，便以铜匙取香面，隔案一吹，"扑"的一声，香面飞扬，飘浮四散，其距案较近之人，不落一"满脸花"才怪呢！然而竟无一人怪罪，反而争先恐后购买。

但自从花露水、香水精等物问世后，其固有的香球、香饼儿、香囊、香串等

各盛暑应时香品，皆退避三舍。卖香面者当然也就绝迹了。

盲人卖艺

旧京，每逢傍晚经常有三五成群的盲人在街头巷尾巡游卖唱儿，一人弹着三弦，一人打鼓，一人打板，谓之“瞎子逛街”。居民住户可以把他们叫到家里或在家门口拉个场子，向他们随意点几个曲子，或让他们弹奏些音乐，来个小型的娱乐晚会。

据说，在清初卖艺的盲人也归皇家“教坊司”所辖，而又单称“太卜院”，还有御赐的铁印一颗，铁马竿（杖）十三根，后至雍正年间才被裁撤“乐籍”，而后流落于民间。早年，北京盲人虽不太多，却有四五处聚会点，年代最为久远的要属大佛寺的公益堂；其次为乃兹府三皇庙内的务本堂，东裱褙胡同的信义堂，以及后立的西城天成永和堂。北京外城也有所谓“五会”，不过没有一定会址，有事临时召集。

盲人学艺须拜三位师父，其中一是业师，即启蒙师父，教弹唱的基本功，学成后不管好坏，总可以拉出马竿去挣饭吃；第二是保师，保证业师必须尽心

教授，保证徒弟学成供养业师；

唱曲是盲人的主要技能，盲人唱曲大半都会弹大三弦（自弹自唱）。所唱的曲子分为“细活”和“大路活”。细活有几种：一、“弹套”，即丝竹合奏，从前北新桥九顶娘娘庙专住弹套的盲人，他们的合奏多近于“神乐署”、“中和韶乐”，所以比弹小曲高雅得多。二、子弟书，分东西两类，“东韵子弟书”是韩小窗所编，每篇八十句，以表现忠义刚烈人物为主；“西韵子弟书”，非韩小窗所编，每篇大半一百句，以情意缠绵的段子为主。子弟书编作、演唱都较难。三、马头调，属于阳春白雪，调高和寡，非常难唱，须要自弹自唱，必须唱熟百曲以上的才能掌握。还有岔曲（也有放在单弦前边的），单支昆曲都算盲人曲目中的细活。民国以后，盲人能演唱细活曲目的逐渐减少，以至于无。

盲人曲师的大路活也有几种：一、奉天调、乐亭调的“铁板大鼓”，讲究说唱整本书。二、木板大鼓，像梅花调、小口大鼓等，但多半是单段的。单段小曲以活泼见长，整本书以情节扣子拉人，说唱好坏是为次要。三、快书，盲人快书的书目很少，同时都是坐唱，既无身

段又无表情。四、单弦，盲人唱单弦，多半自半是自弹自唱，以弦子得好的时候多，以唱得好的时候少。由于盲人合宜伺候宅门、住户，不适合上馆子或撂地。所以，盲人卖艺这门生意逐渐衰落。

插扇面的

清代以至民国期间，每逢盛暑讲究的人皆以纸制的折扇扇凉，且当作饰物，甚至与衣服鞋帽配套，以显示文雅。故每于立夏之后，便有走街串巷从事“插扇面”的，也叫“粘扇子的”。其人以胳膊挎着一木制小箱，箱上竖一木杆，扎系线绳数条，绳上拴满小铜铃铛，走起路来，绳颤铃响，居然也成为街头“响器”的一种，以代替吆唤。

折扇扇面均系纸制，极易破损，经过一夏必然需要更新。插扇面的针对这种需要，乃准备大量花、素不等，规格大小不同的扇面，给一些住户进行更换(其所售扇面都是一般化的，符合平民消费水平，讲究的人换扇面只能去琉璃厂)。有的粘扇子的还可以修理扇轴、扇骨，从中赚些手工钱。但此业季节性很强，只要一立秋，立即转营他业。

报贩子

旧京街头巷尾的报贩子有两种，一种是长期正式以挨门挨户送报为职业的山东人，另一种是没有劳动能力的小孩儿和老人。卖报的小孩儿俗称“报童儿”，他们都是因家境贫寒，为衣食计，迫不得已而为之。尤其是小孩到了学龄，不能上学就读，却挟一卷报纸沿街叫卖。

有种报贩子是专门卖“快货”的，人称之为“打快勺子的”。过去，军阀混战，政局不定，风云变幻无常。民生凋敝，丑闻层出不穷，于是有的报社遇有重大新闻，便不等次日见报，抢先来个“号外”，这就给报贩子提供了牟利的好机会。

报贩子的货源大部分是从“二道贩子”、“三道贩子”手里趸来的。原来，那时有一种报纸批发商，大多与各大报馆发行部门有某种瓜葛。当时，在和平门南柳巷永兴寺庙内设立有本市报纸批发站，每天将各报社发行的报纸分给东、西、南、北城的小批发商，然后，他们再发给各报贩。有的则是直接到报馆去趸。久之，自然形成一个报纸的批发网点。

旧时，报馆大多开设在南城宣武门一带，例如《时言报》报社等就在宣外铁老鸹庙。远处的报贩子到这里趸了报，归途时，边走边吆唤，为引诱买主，故意渲染内容，如“买报瞧，买报瞧，瞧瞧闭门屋中坐，祸从天上来的消息。瞧，飞机坠毁积水潭，砸死母子二人的奇闻……”不等到家就卖光了。

过去，北京的服务行业都讲究所谓“道”，掏粪的有粪道，倒水的有水道，卖报的也有自己的报“道”。所谓“道”就是自己经营的地方范围，如街巷、公园或娱乐场所门口……这种“道”本来是天长日久自然形成的，但一经形成就变作私有了，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势力范围”，因此，各有各“道”，互不侵犯。每个卖报的除了有自己的“道”，还有包月订阅的熟主顾。当年闯出一条道很不容易，需要地熟人和才成，所以，“道”不轻意转让，只有到年老力衰，不能继续经营时，才将“道”卖掉。

刻字业

旧时，没有发明石印、铅印以前，一切印刷品都要靠人工刻木版，因此，刻字与印刷就形成了一个行业。旧京有

刻字作坊与专门在此耍手艺的刻字匠。手艺好的可以应名戳、票据、带花信笺之类的细活，一般都是应大路活刻书，以木为版，每版有竖格，以宋体字为主，楷体字次之。刻版分为两道工序，即“伐刀”和“挑刀”。伐刀的管刮版、上样、柱线，把字的正面伐好，然后交给挑刀的去挑；挑刀的把反面挑好，外带铲空（即无字的空格）。早有乡会试时，刻字作坊照例是应些“朱卷”、“闱墨”（科举专场的试卷）或应些佛、道两教的“善书”，诸如《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桃园明圣经》、《观音灵验记》之类的活。

此外，市面上另有一种刻字铺，专应刻制名章、水印（店铺的图章），但他们的大路活却是给办红白喜事人家印制请帖、谢帖、讣闻。清代，一般都是木刻版印刷的，光绪以来才改用石印，喜事请柬、谢帖出现了硬片烫金者。这些刻字铺，实是小型的印刷局，在这里耍手艺的虽然多是一些粗通文字的匠人，但由于经常给人家承印请帖、讣闻，留有各种不同内容、形式的请帖、讣闻底稿，可资参考，故对于当时市面上婚丧、社交等通用文件的术语、格式，都能掌

握，从无错差，即使原稿有误，他们也会自行更正。有还为顾客代拟社交文件，诚可谓名副其实的“刀笔”先生。

京纸店

旧京的纸业向来分为两类，一是南纸店，其货源多来自南方各地，以经营竹纸、元书纸、毛边纸、玉版宣、虎皮宣及各种南宣，兼营文具、时人字画等，基本上是服务于文人的。另一类是京纸店，其货源多是束来自北方或北京的土产货。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纸店为了扩大营业，也代售一些中、小学学生使用的文具纸张，大都也标榜所谓“南纸店”，其实所售之货仍多是本京及北方的伏地货。

京纸店最大的特点就是为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民俗服务的，充分反映着旧时的民风、市风。也可以说，京纸店就是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播者，其主要体现在作为民间风俗之源的民间俗信上，在一定程度上，它成为香蜡铺的补充。香蜡铺主要是供应敬神用品，而京纸店主要是供应民间人生礼仪婚丧寿庆等方面的用品，两者“分工”相当明确。这乃是在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格局。

当年，京纸店经营的纸张品种大体分为六大类：

一是民间俗信用品，如旧历年贴于门楣的挂钱；贴在钱柜和生产工具上，象征招财进宝的“道西儿”“小挂钱”；旧历正月初八“顺星”捻灯花用的灯花纸、黄表纸；中秋节供月儿用的“兔爷马儿”等等。

二是奠亡用品。出售“官吊作”制和的大、小烧纸、叠元宝锞子用的金银箔、佛、道两教的往生钱、冥钞、纸洋钱、“接三”时当作火把的引路香、出殡扬撒的花、素纸钱、十月朔祭祖奠亡用的“寒衣纸”、“包袱皮”（装冥钱用）。

三是婚丧礼仪用品。如用于给办喜寿事人家随礼，装礼金用的红封套、给办丧事人家随礼用的黄封套；绷在贺幛、挽幛上的“幛光”；空白装裱的红、白联；供办红白喜事人家收礼登帐用的红白账（篇）；用于娶聘的双喜、单喜字、各式请帖；拜盟兄弟用的“金兰帖”。

四是供应各冥衣铺（纸扎冥器的店铺）各种彩纸、蜡花纸、电光纸、秫秸（即高粱秸）等原料。

五是室内装饰用纸。如裱糊四壁、顶棚的大白纸、带暗纹吉祥图案的银花

纸、糊窗用的东昌纸、高丽纸、粉连纸，以及裱好印就的红对联、隔扇心等等。

六是中小学生所用的文具纸张。如铅笔、色铅笔、蜡笔、石板、石笔、各种毛笔、墨锭、大字纸、小字纸、行书纸、供小学生初学毛墨字描摹的“红模子”，以及少量的机关办公用品。

京纸店从清末到20世纪50年代的百年中，为求得生存竟“三易其辙”。一是二三十年代，由经营纯京纸土产，转化为代卖南纸，名不符实地改称“南纸店”。二是40年代以来，除经营南纸以外，还经营洋纸，其品种有大报纸，东西洋皆有，以东洋货为多。至此，京纸店成了北南中外混合型的纸店。三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时代的更新，社会需求方面发生很大变化，原京纸店所经营的品种，如民间俗信用纸，奠亡吊唁用纸，婚丧礼仪用纸，以及冥衣铺用的蜡花纸之类，均被淘汰。所有的纸店都转成了为文教事业服务的文具店，当然也就没有南纸店与京纸店之分了。

香蜡铺

旧京，汉满两族人民都有佛、道两教的信仰，每逢节年，家家都有规模不

等的祭祀活动，因此，社会上有种专门经营香蜡纸马的香蜡铺。如前门外珠宝市合香楼，新街口宝兴斋，后门大街闻异轩，北新桥桂林局、永安楼、东芝兰轩等。它们大多后设作坊，前设柜台。

香蜡铺都有着古香古色的门脸，有的门前立有大型木雕冲天牌楼，悬有“冲霄汉”、“射斗牛”的横匾，冲天招牌上写着“本轩虔造诸品名香，神烛纸马，桂花猪胰，一概发行。”店内设黑漆凳凳，供顾客休息。柜台正中供着象征财神的幌子，如闻异轩供的是一匹“金驴儿”，顶棚上挂满了纸制的元宝。

香蜡铺主要经营祭祀用的香烛。当时，通常烧的香谓之“高香”，另一种较高级的香，叫“大金锭”、 “小金锭”、“百速锭”，还有年禧时用的“子午香”，状如鞭杆，为防折断，绑在一根秫秸上。此外还有檀香、芸香、引香面、炭筋等。当时祭礼用蜡谓之“素蜡”，其实都是用羊油做的，中间是根苇管，作为蜡芯，有“小双包”、“大双包”之分。至于大蜡是论斤的，上面烫有金字。

香蜡铺所售“神纸”（即神像）均是极糙的木刻版印制的，然后刷上水色。颇有民间工艺美术风格，如“金灶”（常

年供奉的灶王纸像)、"烧灶"(一次性祭用的灶王纸像)、"增福财神",年禧接神用的"百份"(诸神像册)、"天地三界十八佛诸神",办生日用的"本命延年寿星君",给小孩"洗三"用的娘娘马、炕公、炕母马,不一而足,凡民间诸神之像,无所不备。

同时,还卖所谓"敬神钱粮",即黄钱、千张、元宝。旧时祭祀礼成送神时必焚之。谓此是给传达于三界执符神的酬谢。俗说"钱能通神"盖出于此。

年禧是香蜡铺的盛季,无论是梳着旗髻的大奶奶,还是缠足的老太太,出门办年货,左肘跨着盛满年货的菜篮子,右手便提着一封高香和几挂纸元宝,这才是典型老北京年禧时的街头景象呢!

香蜡铺为填补淡季的收入,大多兼营些老式化妆品,如当时妇女用的锭儿粉、碗儿胭脂、桃形香城、桂花梳头油、团形的猪胰子球等。

中医大夫

中国的医家在北京(北方)俗称"大夫"、"儒医"、"汉医"。在清光绪年间以前没有西医,也没有专门培养医生的学校,都是靠所谓家传、祖传、师传,

甚至无师自学而成材的。加上官方考核不严，所以，挂牌应诊的大夫良莠不齐。有的只要熟读一些《医宗金鉴》、《内科正宗》、《外科正宗》、《儿科正宗》的医书，基本上弄通五脏六腑、十二经络等生理学说，再念过一部《汤头歌》、《药性赋》、预备一套林屋山人的《验方新编》就能开业，敢称"国手"。门口挂几块"悬壶之禧"的大匾和患者鸣谢的赠匾，既是荣誉，又是招牌。

当年，中医大夫都是自由职业者，有在药铺坐堂（多是自家开的药铺或应某家药铺邀请）应诊。看罢让患者就此抓药，这样，大夫与药铺相得益彰。但多数都是坐家应诊，患者自动上门求医，或请大夫"出马"到家诊治。

中医看病不用仪器，讲究望、闻、问、切。望是看病人气色；闻是嗅闻病人气味；问是听取病人的自觉症状；切是按脉。然后，写出脉案、病因、治法，并按所谓"君、臣、佐、使"原则开出药方。

北京人向来将大夫划分为名医、时医两类，名医是医德医术为大众所公认，名声显赫者；时医是医术未必高明，而给政界要人或巨商富贾看好"疑难大症"后而发迹。

清末民初，北京有四大名医，即汪逢春(1884—1949年)；肖龙友(1870—1960年)；施金墨(1881—1961年)；孔伯华(1885—1955)。在医学上各有树建，业绩显赫。1929年，国民党政府下令废弃中医，施金墨与孔伯华等即组成华北中医请愿团，迫使国民党政府收回成命。从而捍卫了祖国几千年遗留积淀而成的医学遗产。

时医首属地安门外大街的王石清，自称擅长小儿科。民初，穷极潦倒。七七事变前，因给二十九军副军长富占魁之妻看好了病，顿时发迹，在后门桥南路西一所磨砖对缝的瓦房里开业。以宋哲元、富占魁为首的二十九军军官们纷纷给他挂匾祝贺，开业当天就挂了几十块之多，其中有“第十一人”之题词，居然与当时的十大名医并排起来。挂匾之日，二十九军军乐团、北平市公安局军乐团，北京民间香会文场十数档，参加了挂匾仪式。成为北城一大盛会。1944年死后，由他的儿子王少清接班，仍在原址应诊。此为北京时医一典型。

国药店

清光绪年以前，北京还没有专卖西

药（当时称“洋药”的店铺。那时人们所谓的药铺，都指卖中草药的国药店而言）。

国药店的门脸最好认，门前的通天招牌上恒书“本堂遵古泡制汤剂饮片诚修应症丸散膏丹”、“自采州广云贵生熟地道药材零整批发”，在字号门匾两旁分别挂上“瑶池瑞草”、“仙圃灵芝”或“调元气”、“养太和”的横匾，并悬挂一串铜片或木片的膏药幌子，即便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也知道这是药铺。

这些药铺都是经营生熟药材的，“生”即是汤剂饮片，“熟”便是丸散膏丹。汤剂饮片当中，凡经人工泡制过的也为“熟”。药铺有带后柜卖人参、鹿茸等贵重药材的，还有专门批发药材的。北京的同仁堂、永仁堂、达仁堂等乐家老药铺和鹤年堂都设有参茸后柜、像千芝堂、一元堂，后柜便为批发。

北京除药铺外，还有药局。此分“参茸局”、“药材局”两种，前者多开设在前门以西，经售吉林野参、高丽参、花旗参、参须和鹿茸。药材局多开设在前门以东，由川、广、云、贵以及各地采购各种药材，批售各药铺。除几家大药铺外埠设有坐庄，自己有专人采购外，

大部都向药局趸购。

国药店所经营的丸散膏丹都是成药，还可根据患者所持的药方进行如法配制。成药在国药公会规定的有成方的成药约一千种上下，凡遵此制售的，可以不呈请化验。

“丸”，通称“丸药”，大体分为蜜丸、水丸两种，蜜丸即将药碾成面子以后，和以蜂蜜揉成丸，服用方便，容易下咽。如黄连上清丸，按例本应为水丸，永仁堂为应付需要，特改为蜜丸和膏子。当年，丸药有“乾隆二百官方子”之说，谓出自清宫太医处。药铺将其珍贵的丸药都标于门外铜牌之上，如参茸卫生丸、参茸赞育丸、河车再造丸、回天再造丸、十全大补丸……凡以丸或以付（每付两丸）为单位的，都要在药丸之外贴金或加“朱衣”，外面再以蜡皮封闭。一般丸药，如六味地黄丸、知柏地黄丸等“饽饽药儿”，以及顾客持方配制的丸药，有大丸，亦有小丸，小丸“如梧桐子大”。蜜丸还有不揉丸，只是切着按分量卖，如同诚堂的麻仁滋脾丸。凡药味与蜜冲突或用蜜则减效的药一律用水丸，这种水打丸形极圆，粒极小，不加衣，如清胃黄连丸、木香槟榔丸等。

散，顾名思义，散全是面子药，有的既可外敷，又可内服。散以两计的较多，也有装瓶的，如六一散、辰砂益元散，可以冲服治中暑也可外用敷痱子。化毒散可以冲服，也可用油调后敷胎毒。瓶装的如乐舜记回生救急散。还有的像六味地黄面也可视为散。

膏，膏可以分贴的膏药和内服、外敷的膏子。膏药以药料面子加油熬成黏质的膏，摊于纸、布、皮上，专治各种皮里诸症。膏子有的系一种药熬成，取其精华，冲水易服，如黄芪膏、秋梨膏。也有许多药成一汤头，熬成膏子，如永仁堂林公补正膏、黄连上清膏等。

丹，丹是干制的丸子，实际上，丹只是一种药用的成名，并无特殊制法。丹也有丸子，也有面子，如防疫丹是面子，百寿丹便是丸子。

此外，还有“酒”、“露”两种，酒如虎骨酒，露如犀羚露、菊花露、竹沥水、雪水等。种类极多，不及备述。

北京的药铺在丸散膏丹等成药方面都有它秘不外传的独特品种，如同仁堂的“虎骨酒”、“女金丹”；溥安堂的“坎离砂”；广德堂的“养血调经膏”；吉庆堂的“独角莲膏”；乐善堂的“京红粉”；

东安堂的“百效膏”；德爱堂的“小儿七珍丹”；雅观斋的“万应保赤散”；万锦堂的“回生救急散”；圣述堂的“中风再造丸”；王回回的“狗皮膏”；一小堂的“开胸顺气丸”等。虽不做广告宣传，而能远销国外，实有其独到之处。

正式的药铺都卖汤剂饮片。生药需要用水煎熬的均泛称汤剂，一是医生所开的药方；二是药铺的成方照本抓药。当年汤剂药味绝大多数采取分为包之，且加上“药味图说”的小票，这种优良传统一直坚持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

大药铺的药味很全，原来药的种类在《神农本草》中只有365种，后越加越多，到了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著成，药已逾千，破席旧帽，败鼓之皮都成了药材。其实药的原料不外草木、金石、介虫、鸟兽、人身几种。近半个世纪以来又出现了所谓“南药”（名称奇异）约五、六十种。可见药铺预备不丰是不行的，一切药材，不论有毒无毒，能卖不能卖都是预备，而普通常卖的只有五、六百种而已。药材因引药入内，尚需经过炮制。关于泡制、切削生药则是后柜工人的工作。

花厂子

此行多出自丰台“花乡”一带，有的开设在隆福寺、护国寺庙的附近。大花厂子雇工很多，称为“花匠”、“花把式”。他们对培养花木有技术，有经验，对于不同花木之宜干、宜湿、喜寒、喜暖颇能体贴入微，且有接花、接树及冬季暖洞中薰活，如唐花、黄瓜、豆角等等都有相当技术。

花厂子在一年四季里，出售不同品种的花木。入春有梅花、水仙、探春；中春有桃李、海棠、丁香；暮春有牡丹、芍药；入夏除榴花外皆草花，花备五色者蜀葵罂粟、凤仙，三色者鸡冠，二色者玉簪，一色者十姐妹、乌斯菊、望江南；秋来，耐秋者有红白蓼，不耐秋者有木槿、金钱，秋不耐霜日者有秋海棠。木樨南种花最少，菊花北种花最多。冬季盆栽的有香橼、佛手、迎春、梅花、腊梅、金橘、石斛等。果树苗有苹果、核桃、海棠、榴、杏、桃、梨等。观赏花木有绒花、万年青、棕榈、桂花、夹竹桃、美人蕉等。这些品种由花厂子卖出，包送、包栽、保活。但其主顾多属朱门大户。其它如；四季海棠、月季、

菊花、江西腊、一串红、蝴蝶花等，才是一般平民爱花者所能选购的。

花厂子门市一般都卖鲜花、盆花、桶花、花篮、花束，卖盆景者不多。经花把式培养的“限时令花”，如盆栽的桂花、菊花、海棠、茶花、梅花、牡丹、芍药等名贵花种，可掌握好，可按时初绽，何时怒放，以便及时卖给大宅门而获大利。此外，还做如下生意：

摆花　花厂子把待开的鲜花送到主顾家摆放，定期前往换新花，使其四季有鲜花观赏。

代养　花主人把自己不易养活的花木托给花厂子代养，待花蕾桂满枝头时，交还花主。

代存　遇有大型花木，如桶花，在自家不好过冬时，可交花厂窖内代存，春暖施肥后送还。

包种　凡由花厂子卖出的花木，如庭院果木树或茔地松柏树，都可以代栽，包活二年。

早年，真正的老花把式，不但善于培植各种鲜花果木，还要具备盆景的设计栽培；能在尺寸之地表现出广阔山川之貌并花木之盛，巧夺天工。还得能给大庭院内堆砌假山，安放各种“山子

石”；体现出构思优美造型别致，曲径通幽，玲珑剔透，精巧瘦秀。观之赏心悦目。

当年，有的花厂子还应一种冥活，即盛大殡仪当中用的“松活”。即以松柏枝绑扎的禽兽、人物，通常为松狮、松亭、松鹤、松鹿、松人，五对为一堂，每堂松活照例为二十八人抬。抬至坟地后，不见得立即焚化，而是摆在坟的两旁陈列起来，状如“石相生”，颇为壮观。不过，扎制松活需要相当技术，一般花匠是不能胜任的。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由于民生凋敝，很少有这种买卖可做，其技术亦基本失传。

估衣铺

古人认为，凡大致估计人体做出来的衣服，不论新旧，均谓之“估衣”，北京有句俗话说“下剪子为估衣”。近人则认为，只要是新裁新制的，即为新衣，只有为人穿过的衣服才算估衣。诚然，估衣多是旧衣，根本没穿过的很少。论其衣服款式，可能隔着朝代，上下时差约有半个世纪以上。以民国期间的估衣而论，既有清朝的官衣袍褂，也有鼎革以来的时装，甚至有所谓“洋估衣”，如

西装套服、西式大氅、鹿皮三紧式夹克等等。品种多而且杂，不一而足。

旧时，穷人在自家衣食上，首先压缩的是穿戴，以破衣烂袄当工作服，买件估衣当出门的“礼服”。此外，还有些人出于吝啬心理，舍不得花钱置新衣；有的出于畸形的审美观点，喜爱前朝故物；有的出于职业上的需要等等。总之，估衣的销路是多方面的。

基于人们以上这种需要，估衣行遂在市面上兴起，而且形成有师有徒的一大行业，在京城流传约有九百余年。近代，还成立了估衣行会，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估衣行会成为京师商务总会的团体会员。据不完全统计，民国二十年（1931 年）前，估衣棚子在京城五大庙会（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土地庙、花市）中约有二十多家，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前后，官方在天桥东三巷建起了卖货席棚，估衣摊子高达五百多户，是民国以来估衣行最兴旺的时期。

估衣铺的货源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来自各大当铺，投标去买当铺中逾期不赎的“死档”。有的还要到各晓市上“抓货”，还有的到外地收购旧衣服。凡

是旧西装、西式大氅均是从上海、天津等南方大城市收购来的。

估衣行虽有估衣铺、估衣摊的分别，但铺子多不在屋内做买卖，而是在门外支棚设摊，将货摊出来，由伙计逐件折腾来折腾去地吆喝着卖。有的也背包串巷地流动卖货，有的则坐在户内搞批发经营，谓之“内局”。

资本雄厚的估衣铺多系山东莱州府的人经营的，买卖较诚实。凡搞批发的，其铺址多开设于正阳门外东珠市口三里河一带。通常都在户内洽谈业务，主要是批发，兼营门市，有时也下乡赶庙。

西草市和天桥市场有十几家专卖布货、粗皮货的，零整批发，货真价实，作风规矩，很受顾客信任。但也有的一些估衣铺、估衣摊惟利是图，投机取巧。以低质劣货的“老虎活”蒙骗顾客。

估衣行的兴衰起落与时局有关，许多估衣商人于时局动乱，估衣跌价时大量收庄，俟时局安定时再以高价抛售。例如：清光绪庚子事变、辛亥革命、张勋复辟，以及后来的日本战败投降等重大历史“接口”时，都有估衣商大搞投机生意因而发迹致富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估衣行逐渐与拍卖行合二而一，

至于剩下的估衣摊商多于1953年合并于隆福寺东四人民商场，融化于服装行业。

挂货屋子

旧京有种隶属于古玩铺的行业，由于它所展销的部分商品多挂于四壁和顶棚之上。故名“挂货铺”。时人称它为“挂货屋子”。其经营的货物不外是从晓市抓来，或从当铺、小押店投标买来，还有坐在门市“收买杂项”而来。其特点是一旧二杂，尽为一个世纪以上的“前朝故物”。如低档珠宝翠玉、旧镶玉石首饰、氆氇地毯、绣片、戏衣、仿古瓷器、雕漆珐琅、象牙虬角、铜活响器、竹木石雕、戏剧把子、武术器械、漆器、佛前供器法物、花梨紫檀螺甸木器，以及少数民族器物。大的挂货铺有如一座历史博物馆，凡现实生活中已被淘汰之物，在这里均可找到，但并不单纯是玩物，而是有些货仍有其实用价值，而且比古玩铺的售价偏低，所以，销货对象也很广泛。一些古玩行的行商也到这里抓俏货，文人墨客到此寻找书画碑帖；乡间剧团及戏剧票友到此挑选戏衣、行头、道具、乐器；民间的经忏口子则此讨换供器、法器……

清末民初是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有大批前清遗老遗少的“抄家货”可进，且不愁有物色“前朝故物”的民国新贵等好主顾。这是挂货铺、古玩铺的黄金时代。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由于时代的进化，进货渠道及销售对象均日益减少。所以，多数挂货铺都自行转业或停业了。

皮袄铺

旧京的皮货行向来分为制物和制衣两类，后者俗称皮袄铺，几乎遍设于内外两城，专卖用来御寒的粗、细皮衣。最早粗细皮货多是合二而一的店铺，因为一件像貂鼠、海龙的皮货能值“龙洋”（光绪元宝银币）千元以上，有厚利可图，而老羊皮之类的糙货数百件才值千元，其利甚微，故须“以细养糙”。当年，平民百姓是穿不起细皮货的，这些上等细货多是卖给那些进京的外省官吏，但他们并不是自己穿用，而是出于求荣希宠，指望晋升的目的，或为了“运动”某一肥缺，给当权者“上供”的。当时，这种风气很盛，古董、玉器、重裘（高档皮货）是送厚礼时不可少的“三大件”。这给皮货商带来了牟利的好机会。但是到了光绪末年，官员行贿为了不显

山不露水，使受贿人更实惠起见，大多改送银两或银票，故此皮货行一蹶不振，倒闭者甚多。

民国以后，皮货行分为细毛皮货行和老羊皮货行，多开设于南城，以前门外为其聚点。其店幌是用碎狗皮拼凑而成的一件马褂，板朝里，毛朝外地挂在店铺的门前，以广招徕。细皮货的种类很多，常见的有狐腿筒子。旧时，讲究用它吊上进口藏青礼服呢的面料，加上水獭领子，即成为一件名贵体面的男大衣。此外，还有狐肷、狐嗉、貂绒。西洋皮又分珍珠毛、大麦穗、小麦穗、紫羔、灰鼠等等，不一而足。此行是半工半商性质，细货在产地加工，春天制成，秋天运来；糙货则从外地进货，由本地皮局子加工。

早年，皮货商每于旧历九月底，均有测看冬令冷暖的定例，以预卜行情。《水曹清暇录》载："卖皮货客，每于九月晦日聚饮，候至宵分交子之时，占验西北风急，则冬令必严寒，皮货希，得善价，交相酬酢，欢呼达旦。"

绱鞋铺

旧京，无论贵族、平民都讲究穿

"家做儿鞋"。做鞋是家庭妇女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但自己却不能绱鞋。通常都将纳好的鞋底和做好的鞋帮，连同鞋的附件（如鞋袢之类）送往绱鞋铺，进行帮与底的组合，使之成为成品。

绱鞋铺是种小手工作坊，是种服务加工行业，从业者极多，又分为两种，一种专为鞋铺绱鞋，多在城外关厢设立作坊。因这里的房租、饭钱都较城里便宜。另一种则设于街巷之中，有个小门面，仅掌柜带徒弟二三人组成，专为住户绱鞋。他们接活后，首先问明主顾绱鞋的要求，是正绱还是反绱。正绱是鞋面朝上缝合；反绱是将鞋面反复在鞋底上缝合，绱好后再将鞋面翻过来，等于用帮将底包上了一小部分。绱后马上以木制的鞋楦塞紧，刷上水，使之平整无折。按主顾的要求，用楦时，有"带冲"与"不带冲"的区别，带冲的鞋头突出于鞋底少许；不带冲的则基本上是底托帮的形式。绱鞋铺接活后，即与顾客言明工价若干，何时交活，一般不超过三五日。

绱鞋铺于公私合营后，均走上集体化的道路，由个的小作坊组成了制鞋厂。个别个体户则坚持至"文化大革命"后

期。随着家庭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工作，不再做鞋，所以绱鞋铺也随之被淘汰。

绒线铺

老北京将小百货行业分得很清楚，大的店铺叫做“百货线店”，小的则谓之“绒线铺”。清光绪年间以前，凡专卖女工零星用品的都称之为“绒线铺”。

该行从业者常说“不怕不卖钱，就怕货不全”，货全才能拢着常客。所以，绒线铺未从开业，先要将货上齐。如妇女绣花和做衣服用的绣花针、大小纲针、顶针、剪子、各色棉线、绒线、绦子边、各种纽扣；妇女梳洗用的猪胰皂球、玫瑰碱、梳子、篦子、桂花梳头油、刨花、红绒绳、胭脂、锭粉、疙瘩针、头网、假发；还有烟袋、荷包、布袜子、手帕等。诚是以全、杂而取胜。不怕利薄，但力争多销。

民国后，凡有些资本的绒线铺都朝着百货线店的方向发展，扩大营业范围，售品不断更新。卖起了搪瓷、细瓷、玻璃器皿、旱伞、雨伞、雨鞋、正泰回力牌球鞋、大中华双钱牌胶鞋和各色力士鞋、儿童玩具、小推车、小桌椅、美孚煤油、僧帽牌洋蜡、日光皂、兰花皂、

刺绣彩线、轴线、洋袜……夏天有凉席、冷布、驱虫水、臭虫药、雄黄香等。有的还代卖纸烟、火柴。并且在门前搭上天棚，展销所有新进的俏货。伙友均坚持百拿不烦，百问不厌的服务态度，是老北京市面上真正的便民小百货商店。

首饰楼

旧京首饰行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打新首饰的铺子，谓之“首饰楼”；二是买卖旧首饰的店铺，谓之“镂儿铺”。首饰楼专打制各式金银铜（包金、镀金）等首饰，清代分为旗妆、汉妆两行，旗妆首饰店专给满、蒙旗人打造首饰，主要是妇女两把头上的饰物。所以，民国剪发后，这行便没了生意，内城各处旗妆首饰店均告歇业。外城的首饰楼多开设于前门外廊房头条、二条和珠宝市一带，如恒聚和、福源号、天宝楼、亿昌号、富聚号、宝善仲记、天增号、聚宝号、三益号等，约二三十家之多。大多数原为汉妆首饰业。除了打妇女戴的项圈、镯、镏、耳环等金银首饰外，还制作和售卖喜庆礼品，如给“弥月”婴儿戴的长命百岁锁及成匣论套的升、斗、钟、印、铃铛、寿星、镯、锁之类的饰物。

还能承做体育奖品，如银炉、银瓶、银杯、银鼎、银质等项。生意虽然不错，但家数却越来越少了。

砖瓦铺

旧京有种砖瓦铺，门前左右皆堆放青砖两垛，门楣上以幌杆悬麻一缕（表示卖麻刀）以为招幌。专卖砖瓦、白灰、青灰、麻刀、缸瓦、渣子等建筑器材。凡属零碎工程，如勾抹房顶、修补墙壁、住户办红白喜事临时搭砌炉灶，以及铺户修理炉灶，皆到此种店铺购买（如果是较大工程自然就上窑定货了）。管装装卸，送货上门。

砖瓦铺多代卖小瓦器。因此，与民间丧葬礼俗还挂上了勾。专卖出殡起杠时孝子摔的丧盆子，谓之“吉祥盆”、“阴阳盆”，有如一个稍有深度的小碟子，中间有一制钱大小的圆孔。买此盆者必再买一块砂板砖，将盆放在砖上，以便将盆摔碎。此外，还代卖丧家“伴宿”（即出殡前一日）之夜，辞灵时装祭食用的“焰食罐子”，亦称“宝瓶”。出殡时，由儿媳妇抱着，谓之“抱罐”。盆、砖、罐在京俗上谓之“倒头三件”，即丧礼上用的三件礼器。正因为有这个业务，所

以砖瓦铺还代售出殡时扬撒的纸钱，但都是用过的回收品，论斤出售，比纸店卖的新纸钱便宜。这便是老北京行业中所特有的现象。

泥瓦匠

旧时，泥瓦匠均是个体劳动者，平时，都在某一茶馆（“攒儿”）等候工程承头人来雇。其中的“高手”、“大手”有技术、有本领的则不必到“攒上”待雇，因为他一年四季也闲不住。例如：清光绪年间“大将张才”为瓦匠中巨擘，东西两陵工程，皆有张才参加。一次，恭忠亲王到东陵监工，当面试验张才手艺，张才当即自愿独砌墙腿一座，不用吊线，口衔烟袋锅，自自然然地砌完，墙腿笔直，灰缝均匀，无可挑剔。亲王见之惊奇不已。像这种瓦匠的活计，自会应接不暇。

给泥瓦匠打下手，如抬土、挑水、筛砂、码砖做些笨力气活的，谓之“小工”、“力工”“壮工”。由于工资太低，没有条件坐茶馆待雇，只能到交道口，或隆福寺街东口一带“人市”上站立，等待承头人的召唤。

泥瓦匠（包括壮工）被承头人派往

工地做活，一般多是“卯子工”，又叫“摆工”。晨起上工，大工（瓦匠）在房上使不完两兜灰，小工无非仅筛一堆土，挑两担水，和一池泥浆，稍微清一清坑（清坑即将拆卸之处清除一下），即至“饭歇儿”，去吃早饭，一顿饭就得一小时上下，回来后接着做活，再过两小时又是“茶歇儿”，夏天还要稍有午睡，茶歇儿叫起后，先观天时，尽盼下雨，以便“挂兑”歇工。因为北京瓦作规定，叫起“挂兑”，本日并无工资，叫起以后“挂兑”则工资照付。所以，瓦匠在叫起以后没有不盼下雨的。叫起以后，做不了一二小时的活，又到吃晚饭的“饭歇儿”，饭后日已平西，便随做活随着收拾工具，一天便算磨蹭过去。包工活有头儿催着还能快一点。所以，老弱瓦工、力工全愿做卯子工。

瓦工、壮力，不养老，不养小，是个没有“后成”的工作。瓦工、壮工活计季节性很强，冬天便常期歇工，生活无着的只得以平日在工地拾得的“三寸头”“两寸头”碎砖磨成支锅碗，挑到街上去售卖，得几个零钱弥补经济上的亏空。

拴笼屉

据说馒头正式出现于宋代。而在此之前很多年，史书上就有利用麦粉自然发酵来蒸制面食的历史。像陆游的《剑南诗稿》卷十五《巢》中就记载道："便觉此身如在蜀，一座笼饼是豌巢。"并自注云："蜀中杂彘肉作巢馒头，佳甚。唐人正谓馒头为笼饼。"可见，至少是在唐代，蒸馒头就已成为中国北方，四川盆地等地区的主食。

蒸馒头离不开笼屉，吃馒头的普遍证明了使用笼屉的普通。但是在民间，关于笼屉的起源都另有一番说法。

据说笼屉是佛教禅宗的创始人达摩发明的。达摩借鉴了远古燧人氏取火熟食的经验，利用一种叫"赤火绳"的钻在"方面铲"（切削竹木的用具）和"翻天印"（切削竹木时垫的木墩）上来穿孔，由此发明了笼屉。事实上，这种借用历史上某一名人的名义来作为发明人，是以往经常使用的手法（如仓颉造字等），并不稀奇。相反，任何一项生产生活工具的产生，都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清代，来自河北武清、安平二县

的农民，以拴笼屉作为手艺，纷纷来到北京，从而形成了北京的“锅伙”。（合伙耍手艺、同吃一锅饭之意）。据说当时仅在天桥地区，就有笼屉锅伙的工匠一百多人。有的，还成为专为皇宫制作笼屉的“御笼匠”。他们既能制做也会修理，往往挑着一副挑子走街串巷揽活儿。挑子的前面放着竹条儿、柳木板儿、藤子皮儿等材料（后头则为一圆笼，内放工具和钱钞）每行数步就吆喝一声：“拴笼屉哟——笼屉哟！”

小器作

小器作是北京特有的行业，是制作小型木器的手工艺作坊。这种手艺大都是由苏杭一带传来。在清康乾时代，这种工艺极为发达。它们专做硬木透雕的室内装饰，家用小物件。但以奢侈品为多。如隔扇、横眉子、茶几、花几、盆架、神龛、匣、盒、书套以及装饰物及金、银、瓷器之托、钟座、瓶座，且能设计新颖式样，照物配座、配架、无不雅致，无形中提高了原物的艺术欣赏价值。

它们所使用的木料都很名贵，如红木、紫檀、花梨、楠木等。所制器件均

精雕细刻，玲珑剔透，然后在制品的本色上略加涂饰，再用蜡打过，使之光润平滑。古香古色，十分高雅。但它们供货的对象多为官厅、官府、官邸、大宅门、大商店和文人雅士。有的文玩店、首饰楼等行业为了配托、配架、配座，也经常与之打道。其从业艺人于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参加了小器作合作社，少数手艺人，转入工艺美术单位和木器行业。

卖蒲帘子的

阴历十月，北京正是进入冬季之始，街头巷尾便有些老乡民叫卖蒲帘子、饭囤儿和猫窝、狗窝，并且代卖稻草。蒲帘子是用蒲棒的叶子编织而成，冬天可以挂在屋门口或窗户上挡风防寒，也可以当成炕上的坐垫。饭囤是用稻草编成，用以暖饭。猫窝、狗窝也是用稻草编成的，大小规格不一，大的形如洗澡盆，小的有如茶盘或蒲包。过去，居民多畜养猫、狗，往往买一狗窝放置屋门口的台阶上，给狗御寒，猫窝则放于厨房临灶的地方，给猫冬季睡眠之用。稻草则可用来垫炕、垫狗窝。这成为旧家庭入冬之前的土设备。

卖蒲帘子的小贩多系京郊外县的老乡民，肩挑一对大荆条筐，边走边吆喝"买一蒲帘子儿咧，猫窝咧狗窝咧"，怯声怯调，声音凄楚，给人以时令感、岁月感。

卖炭的

旧京，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一般居民冬季取暖多用所谓"锅灰木白炉子"，以木炭升火。所以入冬前后，炭业格外兴隆。北京没有专门卖炭的店铺，多是由煤铺代卖。再就是京畿近郊的农民不辞劳苦，于农田地净场光之后，不远数十里到城里卖炭。他们肩担两个大荆条筐，装满木炭，边走边吆喝："约零炭来！"边摇晃木把皮鼓，这是他特用的"响器"，古代称此为"大鼗"，也叫"手摇鼓"。鼓直径约七寸左右，厚一寸半上下，鼓面为羊皮，两侧各挂一个粗线拴的小坠儿，有约二尺多长的木柄从鼓的下侧穿粘牢固，用时手摇鼓把向下摇动，发出"嘣，嘣，嘣拉嘣，嘣嘣，嘣啦嘣"的声音，很有节奏。一般多是下午两点左右出来串胡同售卖，按固路线行走，顾客也较固定。

有的小贩还代卖"疙瘩炭"，供吃涮

肉火锅用，还有代售升火用的劈柴，论斤叫卖，吆喝“约干劈柴！”

他们的货源大多趸自西山一带农民的炭窑。每逢入冷之前，北京西山一带的农民便砍伐山柴烧成木炭，再以低价批发给挑担进城零售的小贩。其两者都挣的一种“辛苦钱”。由此可知旧时老乡民生活的艰辛。

井窝子

旧京，几乎每条街巷都有所谓“井窝子”，供附近居民用水。井窝子设备简陋，只是以砖石砌成一围墙，把井围住。墙内盖上一两间矮屋，作为井主和挑水的伙计居住。至于井台上汲水的工具，亦为原始化的设备，仅辘轳、滑车而已。辘轳是支一三角架，上有横木，一端安装大木桶，插辘轳把，再以大绳拴柳罐，放下汲水，然后一圈圈地摇上来。滑车即滑轮，在井上支以高架，中悬一滑车，两端各系一柳罐，一上一下地取水。此外，还有完全用人力汲水的，如用大绳拴上柳罐或木筲，放下取水，一把把地提上来。

每个井窝子都有其长期自然形成的“水道”（即卖水的范围），一般是承包本

街或附近小巷内住户、铺户的用水。每个井窝子各守各道，互不“侵犯”。

井主称为“掌柜”的，雇用挑水夫若干人，每个水夫各承包本水道范围内的一街一巷或一段。每天有其固定的任务。他们用二把手独轮车（上边左右各安一个大水箱，用来装水），吱扭，吱扭地推着给各家送水，到各家大门口外，打开水箱的木塞，放满两大木筲水，用扁担挑入人家的厨房，倒在水缸里。每担水不过收一文钱（甜水）或半文钱（苦水），包月更少些，每担不过一个制钱。包月的到月头算账，零挑的有时当时收钱，有时记账。他们记账的方法是在大门道的墙上画些鸡爪形的记号，如↓↓⇃⇂，五个一组，到时照记号算账。掌柜的与伙计（水夫）照例是“三七账”掌柜的得七成，伙计得三成。

井窝子掌柜的有参加劳动，有不参加劳动的。伙计（水夫）多是山东人，(人多称之为“三哥”，贬称“水三儿”)。最能吃苦耐劳，平时没有休息日，只“三节”（端午、中秋、春节）休息一天半天的。平常每天两顿小米面窝头咸菜，只有到年节吃顿犒劳，无非是馒头、烙饼炖猪肉、烧酒而已。如遇有住户办红

白喜事，因用水较多，本家必给予厚赏，至不济还可以吃几顿“杂合菜”，也算改善一下生活。

自20世纪40年代以后，北京各家几乎都安上了自来水，用不着再吃井水，所以井水窝子的生意也就日渐衰微了。

裁缝铺

裁缝铺亦曰成衣铺，专做平常人穿的中式衣服，为数很多。最大的成衣铺有几十人，或上百人，专给各绸缎布铺及新货屋子（专卖新成衣的）做手工。小者则一师二徒，专给住户、铺户个人做衣服。这种店铺设备简陋，只一木案，几缕针线而已，要的完全是人工手艺。所以，开设这种店铺，没有两家连环铺保是不能被批准的，主要是防止业主携活（如皮货、绸缎衣料等）潜逃。

这种旧式成衣铺都是以师带徒，新学徒入店先干店里杂活，掌柜的见其勤快灵敏，有培养前途，才让他到前柜向大师哥（先来的学徒）学手艺，从学编纽扣、打架子的简单活儿学起，以后再学缝边、跑直趟等缝纫的基本功。直到三年零一节出师时，才能将男活儿、女活儿、粗活儿、细活儿、皮、棉、夹、

单的手艺学会。

从民国初年到民国三十年代末，北京市民大都习惯穿着便服，男的穿长衫、马褂或短衫长裤，女的则穿大襟衣衫或旗袍。这些衣服都由大街小巷的成衣铺承做。凡能在众多成衣铺的竞争中夺魁，除经营管理有方外，主要还靠做工质优、交件迅速、准时等信誉取胜。

好的成衣铺专为一些大宅门缝制丝绸锦缎、呢绒、皮毛等价高难做之活，这样，更能显出手艺的高低优劣。量裁必须随体，缝制必须牢细，款式必须美观。

成衣铺手艺重在改革创新，例如：民国后，汉族妇女也穿起了旗袍，且不断改进翻新。如将旗袍的直筒形改为小卡腰，后又改为符合女性体型的大卡腰。20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许多成衣铺还加工定做各种制服、学生服、工作服等西式服装，向着“洋裁缝铺”的方向发展。

另有一种裁缝铺，专做僧衣、道装，及神前幔帐、幡门、幡条、经幢筒幡。从业者必须懂得本行专业知识。早年，此行人数很多。民国后，僧、道人数日少，且人民知识日高，往庙中献幡帐者数年不一见。于是，这行人也就日见其少了。

京布庄

早年，中国以木梭所织之布，面宽不过一尺二三，其布既厚且粗，内分许多名目，如“大庄”、“粗布”、“细布”，多为高阳、饶阳特产。又有“大碾”、“寨子”两种，为山东妇女所织，此布时兴时以原色（白）为主，有的以蓝靛淘染，成为“头蓝”、“毛蓝”、“月色”等色。又有用该乡黄土所染的“土黄”、“紫花”等色。后来渐渐购用外来染料，能染红绿细布，后用石灰水木板印之“印花”。此种印花布，多是蓝地白花，并有印成童装所用之布，或枕、被、褥面用布。当时即视此布为极华丽之货。直隶保阳及山东粗布运京后，皆在京西长辛店落栈，当时长辛店的染房最多，在该处投靛缸所染的布，谓之“京染”，当以“石青”、“靓青”为最佳。布运至城内，先到崇文门上税，后到前门外布巷子卸货。其崇文门外大街、花市、东西珠市口，在民国初年尚有京布庄多处，民国二十年（1931年）以前，前门外大栅栏东口尚有“隆庆”、“庆长”两家。七·七事变后，一律改为洋货布店了。

洋布刚刚流入中国时，价格非常低

廉，布线较京布既密且细，而较京布多出一倍。于是人们除了用绸缎绉绢等丝织品的外，无不喜用洋布。洋布中有“粗细洋布”，各种“市布”、“标布”及“印花洋标”等，每年进口逐渐增多，尤其花旗行所出之布行销中国最多，以“老人头”及“大鹿头”两牌最著名。其货色质地、颜色，均盖过土产。在这种形势下，京布庄皆代售洋布，逐渐皆改为洋货布店。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市面几乎没有专卖土布的了。

冷布庄

织冷布者，向以武清的崔黄口镇及宝坻县城为多。北京市内发售冷布的商店号曰“冷布庄”，均不自织。民国后，右安门内第一监狱及市内各织布厂、龙泉孤儿院亦承织冷布。由于冷布用途只限于夏季，非常年必备之品，故市内各厂并不常年生产。冷布庄进货渠道仍靠外县按期制造，运至北京，再行发兑。后来，各庄亦有招工自织者。

冷布庄自各厂将织成之冷布运回北京后，尚需进行加工整理。由于原织之冷布，均稀而软，须以面粉“浆”之，并染成绿、蓝、粉诸色。蓝、粉诸色用

者较少，惟白、绿二色最为人所喜用，早时还流行过一种紫色冷布，系用紫色葱皮煮水所染，名为“品紫”，但因色过深艳，令人见之起炽热之感，不适宜夏日装点厅堂。

北京冷布庄多在前门外打磨厂东口内，每年定织之冷布，一部分发于本市各纸店、绒线铺销售，一部分则批发给京郊各地。抗战后，冷布业极为冷落，因宝坻等处织户均自购线料，织成自行运销附近各地，并运来北京在崇文门外花市一带寄居，向纸店、绒线铺等直接兜售。

各纸店、绒线铺，每届入夏即将冷布幌子悬出。其幌子系以丈余长冷布，上端连于木制荷花顶上，下端连于木制莲花座上，冷布上贴以红斗方（即对角而用的大字块），写“本号自运宽窄各号粗细冷布照行发售一等”字样，悬于店前，一挂或两挂不等，随其门面之宽窄而定。

相面的

老北京有种生意人，以给人“看相”为职业，有的竟然自称某某“大相士”，公然在大饭店开个房间“设砚”，广事招徕。

但绝大多数相面的则在山坛庙迹或天桥、鼓楼市场上，就地摆个小摊。有的打扮得非僧非道，以便引人注目。他们往往根据经验，从过往行人当中叫住一个，说："尊公，请您留步，我有话送您几句。"如对方稍一驻足，他马上说"尊公，您脸色虽旺，可心中动止不安哪！"自然，人在生活中岂能事事称心如愿？何况人的思维活动从来不会静止，所以很可能被他"点住"，甚至主动"问津"。这时，他会用尽江湖本领，凭着三寸不烂之舌，黑说一气，什么"欲知流年运行，男左女右各分清。天轮一二初年运，三四周流至天城。大哥，您贵甲乙（年龄）呀？"假如对方说是二十八岁，他马上说"哎呀，二十六走丘陵，二十七走坟冢，二十八岁正走印堂。相书说得好哇，'八岁、十八、二十八，上至山根下至发，有无生气两头消，三十印堂休带煞。'要按您这天中、天庭、司空、中正、印堂、山根、年上、寿上、准头、人中、水星、承浆、地格，全都不错，惟您的这额无主骨，眼无神，鼻无梁柱，嘴无唇，应该干东东不着，干西西不着，幸而您一生心直口快，不奸不坏，吃得亏，让得人，别看现在受点

磕碰儿，将来老运一定亨通。”行人既被“点住”，不是求财就是谋事，不是看“月令”就是断终身（失物、寻人、问病的从来不相面），最后少不了要向他“馈杵”（送钱）。《都门新竹枝词》有诗云：

全凭口齿作经营，摸骨多时妄品评。

下笔立成螃蟹体，非僧非道遍都城。

盲人算命

旧时，盲人的生路只有两条，一是算命，二是唱曲。据说，二者都以“三皇”、师旷为祖师，盖取三皇伏羲画八卦，为算命的起源，师旷是瞽目人的乐师，为唱曲的起源。瞽目人根据自己所学的特长选择其一，或算命，或唱曲，当然，也有二者精通俱兼的。

老北京的算命盲人都是走街串巷，右手持“马竿”戳路而行，左手持一种“响器”，以为号召，一是打小锣的；二是敲大鼓的；三是吹横笛的，但不成曲，只吹一句，其声甚惨，被人称为“丧家之音”。至于打板的乃是外省来京算卦的，为数甚少。

盲人算命卜卦往往于夜晚巡游“出马”。若有心事疑虑而不能入睡的，就将他们叫到家里，算上一卦，以卜吉凶。

盲人算命只有“六爻卦”、“推八字”两种。六爻卦比较容易，推八字（八字指生人年、月、日、时各占天干、地支的字）需要学“流年赶”，须背熟一百年的日历书，一百年内月建大小，二十四节气日子，交节时刻等，都须知道。不过盲人也有自身的巧妙方法，用七字句的口诀编成固定套子，推算起来极为迅速准确，往往为有目之人所不及。有人说，盲人“心静头脑自然灵”比有目人聪明。其实就是被生活所逼，舍此无路可走。所以肯下真功夫。

盲人算命是历史传承下来的特殊行业，它的形态与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与人们的迷信心理有关。所以，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学知识的普及，人们思想亦日益开化，这一行业终被淘汰。

阴阳生

旧京各城头均有阴阳术士开业，专给死人开具“殃榜”，他们自成一行，各有堂号。如北城土儿胡同一善堂王、西城翠花横街伯寿堂俞、羊房胡同桂林堂朱、石碑胡同修德堂白等等。他们将自家的堂号，印在一张三寸长、两寸宽的黄纸条上，作为标记，有来请者，即将

此标记令其带回，按死人的性别分男左女右贴在丧居门前，以资辨认，免生误会。

清代以至民初，官方鉴于民间对阴阳术士的崇信，丧葬必请其禳解，具有亲自验视死者的条件，对其营业便于特许。但阴阳生必须对官府及亡人本身负责，具实鉴定死因。如系正常死亡，可以给丧家开具殃榜，并将数目定期上报。如系自杀、他杀而死的，应立即报官，请“仵作”（法医、验尸官）验尸、鉴定，始可抬埋。这样，不免要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因此，殃榜带有法律见证的性质，是一纸正常死亡鉴定书。清代，殃榜可直接当做出殡执照；民国以后，北洋政府执政期间，一律凭殃榜到卫生局换取出殡执照。

殃榜，亦作“殃书”，乃是根据阴阳家《三元总录》一书里的《茔元课定》部分推测勘定的。丧家拿它作为全部丧事、丧礼时刻、方位、禁忌等诸方面的指针。殃榜首推亡人“原命”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受生；推亡人“大限，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寿终，享年多少岁；次推亡人应于某日某时“出殃”，“殃”高多少丈，多少尺？“殃”化为什么颜色的气，

向哪个方向去。再推亡人入殓时刻，入殓时忌讳的四个属相，（但亲丁不忌）。以及“破土”（给亡人打坑）、发引（出殡）下葬的日期、时辰等。最后还要推算是否会犯“重丧”（百日内再死人）；是否是犯“火期”（指遗体自行起火）。丧家出殡后，要为丧家主持“净宅”仪式。这仅是阴阳先生奇术之一斑，其种种玄妙之谈，不一而足。

七·七事变前，当局规定，不再以殃榜作为请领出殡执照的依据。尽管阴阳先生照常营业，只不过是应酬民间风俗习惯上的事。民间有丧事，完全可以不请阴阳先生，只须执医生处方，直接到卫生局申报死亡就成了。因此，阴阳生的生意一落千丈。

卖野药的

旧京的街头巷尾、集市、庙会上，都有卖野药的（一般指御制官方之外的成药），形式不一，但性质相同，总名均被时人称为“老合”（即生意人）。

最早，常见的是走街串巷卖药的，他们手摇串铃，身负药箱，或背布囊，吆唤什么“食积、奶积、大肚子痞积；腰疼、腿疼、偏正头疼……”有的还要

扮成"兵勇"模样，以引人注目。

其次，或坐商，或出摊，专靠巧弄唇舌，连批带讲，先谈病源病理，后讲药性功能，尤其是大谈用其所卖之药治愈的病例，神乎其神，最后还要吟咏一首诗作结。例如，卖补药的则咏"先天不足亏后天，灵龟衰弱最难全。遗精早泄阳痿弱，失眠健忘腰腿酸。肾病之人百病侵，患者痛苦不堪言。欲求终身健康乐，唯服养脑固精丸。助您诸君还少貌，接补残躯越少年。"行话谓之"卖钢"。

另有练把式、舞刀弄枪者，寒冬亦赤背"上阵"，用其强健的身体和精湛的武艺做示意宣传。有卖刀伤药的甚至以刀刺腿，出血见红，然后敷之以药，用扇子一扇，其血立止，以便证实货真无虚。行话谓之"挑光子儿"的。一旦将观众聚足，便开始卖药。除刀伤药、强身大力丸，还有什么"百步止嗽"、"春方打胎"、"长阳种子"……他们早把人们的心理摸透，由于人们大都相信"偏方"，故此都标榜所谓"祖传秘书"。说什么"今天算您来着啦，俗云'千方容易得，一效最难求'嘛！在下还外带奉告您，今天所带药品无多，凡要买的，

请准备好零钱，以先伸手者为准。买着的算咱有缘有份，您有幸；没买着的您也别后悔，扫兴，好在来日方长”……极力鼓噪唇舌，以便造成争相抢购的局面。

还有另一种形式的是搭个棚子出摊，用展示药力效果的方法，进行宣传。这一般多是卖虫子药的。他们将各种不同的人体寄生虫（民间通称为“混屎虫”）分别用酒精泡在玻璃瓶子里，进行密封，做成实物标本摆出来，让人们观看，示意他卖的驱虫药确实具有一定效力。并扬言，若有吃了他的药，打下了虫子，将实物拿来示众，可减免药费。这正迎合了当时一般群众的心理，所以其生意兴隆自不在话下了。

打鼓儿的

旧时，北京有种走街串巷收买旧货的，手执小圆鼓儿，其直径不足二寸，以小软竹棍敲打，作为信号，老北京人谓之“打鼓儿的”。

打鼓儿的分为“打硬鼓儿”的和“打软鼓儿”的两种。

打硬鼓的有较多的本钱，且有辨别、鉴定旧货的能力。专门收买珍珠宝石、

金银翡翠等首饰，所以只夹一个布包，边打小鼓儿边吆喝“潮银子来首饰来卖”！有的挑两副大筐，收买些硬木家具和旧书字画，甚至一些瓷器、古铜等文玩。他们往往自己开一个小旧货铺，出售所收买来的旧货。有的自己没有店铺，但与各个古玩铺、挂货屋子都有来往。他们眼光锐敏，不但识货，而且熟悉行情，靠着伶俐的口齿，占很多便宜，总是把要买的东西说得一文不值，等到买来再卖时，就说成了无价之宝，老北京人谓此为“买死人，卖死人”；说他们敲的小鼓儿是“丧门鼓”、“缺德鼓”，谁要总跟他们打交道，谁就快败家了。他们有时故意知情买赃。过去一些大宅门的奴仆，盗出值钱之物，如宋元字画、秦汉器皿、珠宝玉器等，无不廉价卖给他们；还有些世家破落，急于用钱，便将家传块金砾珠、旧书文玩拿来变卖。他们往往将真说假，将高压低，蒙骗货主，以薄值而得至宝。京谚有云：“怕甚苦，且打鼓；怕甚饿，日检货。”凡干这一行的，每年都有暴富者。

另一种是打软鼓儿的，多是挑一副大筐，前晾后覆，收买一些旧衣物，有可疑之物便藏入后筐，黑早到南北晓市

销货。还有种本钱小，识货能力差的打鼓儿的，只能到贫家收买些碎铜烂铁、旧报纸、洋瓶子、破鞋烂袜子，晚来挑到“沟货”（沟里的废品）屋子，换几个窝窝头钱而已。

古玩铺

古玩业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业，它的货品多属历史文物，举凡字画、碑帖、古瓷、古陶、古玉、古铜器、旧时文房用具、礼器、兵器、乐器、祭器，无所不包，一切有艺术价值、文物价值的旧器物都是古玩铺经营的对象。但一般店铺在经营品种上各有侧重。例如：旧时琉璃厂的鉴古斋、大观斋、韫玉斋、雅文斋等多家古玩铺都以瓷器为主；赏古斋、茹古斋、论古斋等均以古字画为主；庆云堂等以碑帖及文房用具为主；通古斋以古铜、旧玉为主；古光阁以小金石为主；致宝斋则以杂项为主。

古玩可供考古、鉴赏之用，因价钱昂贵，普通平民不敢问津，爱好者都是有一定文化层次的人，甚至是达官显贵文人。文人学者买古玩是为了研究艺术，考据历史，而官场人则是附庸风雅，摆设几案，以夸豪富，也有以此送礼作为

进身之路的。因此，古玩业的经营方向、经营作风、立顾关系都不同一般。古玩商须讲信誉，对大户尤其如此，对一般顾客亦不轻意行骗。否则拉不下主顾，没有“回头客”，势必不能立足。但是，古玩毕竟是一个可以鱼目混珠的行业，个别古玩商不讲商业道德，以假作真，以次充好的情况也是有的。琉璃厂还有专做假字画，仿名瓷的人。沙土园南边的一座旧庙内，有两位老夫妇，江西人，自设烧瓷小窑。一些古玩铺就拿出一些珍品瓷器，请他们仿烧，价钱从优。烧好后还要“做旧”，古玩商卖时先卖假的。这些赝品很多卖给了洋人。

古玩这个行业专业性很强，灵活性又大，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花多少钱买来，应加价几成卖出去，这是容易掌握的。但例外的情况，活的情况极多。所以古玩商只有古代知识丰富，头脑灵活，手眼精到，利口能言的人才能胜任。如果能对各类古董进行鉴定那就更为理想。不过这种人才是少数。但在古玩行从业多年的人，基本上是位“文物专家”。

鸡毛店

这是一件不提供被褥，仅以鸡毛裹

身的最低级旅店。这类小店大多房屋低矮潮湿，面积窄小，店内仅有一溜土炕。夏秋时节，炕上铺有一层苇席，冬春之日则再加上一层厚厚的鸡毛。那些穷苦无棉衣可穿，只好用戏院墙上的“海报”裹身的旅客，实在忍不住时就不得不采用这种最原始、最低级的取暖方式来熬过严冬。这些旅客大多是进城做苦工、耍手艺或做小买卖的乡下人，也有一些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这些人由于手头拮据，只好在鸡毛店中暂求一栖身之地。

鸡毛店的卫生条件极为低劣，跳蚤、虱子、臭虫成群，到了夏天更是蚊蝇成灾。墙上，碾死的臭虫带出红得发紫的道道血迹。屋里由于长年不打扫，加上旅客缺乏洗盥设备，因此常常散发出一股股的腥臭味，令人望而生畏。

鸡毛店的炕上往往集中着七八个至十几个人，拥挤不堪，翻身都困难。到了夏季，闷热汗臭更令人难受。

清代有人在一首《京师乐府词》中描写鸡毛店说：

冰天雪地风如虎，裸而泣者无栖所。黄昏万语乞三钱，鸡毛房中买一眠。牛宫豕栅略相似，禾秆黍秸谁与致？鸡毛作茵厚铺地，还用鸡毛织成

被。纵横枕藉鼾齁满，秽气熏蒸人气暖。安神同梦比闺房，挟纩帷毡过燠饭。腹背生羽不可翱，向风脱落肌粟高。天明出街寒虫号，自恨不如鸡有毛。吁嗟乎！今夜之钱乞不得，明日当来布恩德，柳木棺中长寝息。

据说当年住鸡毛店的人夜里都不敢脱鞋，因为脱下来，不定什么时候就被同宿的人抄走了。

花炮作

旧时，花炮作是个特殊行业，由于危险性很大，稍有不慎即酿成爆炸事故，继而引起火灾，殃及四邻。故当局有令，花炮作一律设于城外。花炮商为取“安全”二字的吉利，几乎都设在左安门、右安门一带。

最著名的花炮作当属清代的“吉庆堂”史家，曾承应内廷花炮，慈禧太后封它为“官花炮作”，并准许由硝磺库拨用硝磺，每当官运硝磺时，车上高插大黄旗，上书“恩准官花炮作吉庆堂史”。由史惠林掌作。史家承应内廷花炮时，以做“烟火城”大型花盒惊动了慈禧亲临现场观看制作，并赏史惠林六品顶戴内廷供奉。“烟火城”似一小型城池，有

城楼四门，雉堞刁斗旗杆及桥梁等物，城楼上并有守城兵丁。点着火线后，城墙上“秀灯子”一齐大放光明，烟花灯火一齐发作，等到城楼灯一亮，桥梁立即下落，现出桥下莲花，宛如孤城夜火。实是将花、炮、花盒三种做法合一而成。又曾制作一座“八角美人亭”，火线燃着，亭角珠灯齐明，亭中美人动作宛如真人，慈禧大悦，遂命太监剪下美人，史惠林大惊失色，以为必将获罪，后来奉到懿旨，方知又获御赏了。从此，史公更加刻意钻研，制出一个九层大花盒，共装成一出吉祥戏，每层一个场面，盒子连续落下，场面连续演出，太后十分欢喜，赏赐很多。据说，史家每领内廷官款，每个花盒挣项足够两年用度。最为荣幸的是，朝鲜国王向史家定制了大批花炮、烟火，由史永安率领工匠押运赴朝，监视装制、燃放，获得殊荣。

民国后，史家又承应总统府年节所放的花炮、烟火，得到袁世凯、黎元洪的多次嘉奖。但庆吉堂不幸，两次失慎，发生爆炸事故，炸伤工匠多人，以至后来一蹶不振。

旧时，北京的花炮来源，除本京做的伏地货外，还有外来货，如茶叶铺历

年春节从安徽产茶区顺手捎带运来花炮，谓之“地道货”。但北京的花炮供应还是本京伏地产品为多。除上述吉庆堂史家外，还有灵芝堂白家，以造大太平花、“炮打襄阳城”、铁冲子、大旗火为主，亦因不慎失火爆炸而关闭。业主白芝轩宣告破产，改行后在西庙做了“豆汁大爷”的买卖。还有行德堂赵家，以做花盆“松鼠偷葡萄”出名。但只是昙花一现，开业不足半年即发生爆炸事故而破产。故有人说“花炮作是个‘顶雷’的行业”。不要说花炮作，就是花炮摊也是危险的买卖。据说，有一年，花炮市上，有一摊贩不慎，引起爆炸起火，将整个市场上的花炮摊都连了宗，最后，各摊主将肇事人诉诸法院，让他承担了刑事责任。所以，一般人都视此为畏途。

当当车

1929 年 12 月，北京街头开始出现有轨电车。由于该车行驶时司机频频踩铃，发出“当当”响声，故此，百姓称其为“当当车”。

当当车的出现，标志着官办市内交通在北京的兴起。起初，电车公司名为中法合办，实为被法帝国主义全面控制。

不仅机车、托车、电线、铁轨等设备要从法国进口，而且票价昂贵，远非坐人力车可比。

以后，电车公司迫于社会压力，不得不断降低票价，由此才带来当当车的发展。到1938年，北京（当时已改为北平）共有当当车线路七条，其中三条以天桥为起点，一条由天桥至西直门，一条由天桥至北新桥，还有一条由天桥至永定门。

由于当当车是新生事物，管理一时跟不上，所以电车上下秩序较乱。电车一停，上车人与下车人挤成了一团儿。上车后不打票者与日俱增。同时，往往车尾、窗外还有很多“挂票”，极不安全。为了维持秩序，电车公司求救于军、警、宪三大武力，荷枪实弹联合押车，并在沿线戒备。一时间，乘车者如临大敌，惶惶不已。

与此同时，当当车还成了一大批扒手作案的理想场所。他们分工合作，或在电车上行窃，或在沿路车站接应同伙。从此，惯偷在公共电汽车上一直不绝。

钱摊儿

这是一种专门以兑换银元来弁利的行当。他们往往没有字号和铺面房，所

拥有的货币资金也很少，仅仅以兑换银元业务为主。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仿照我国辅币制度，在天津设立了铜元局，铸造铜元。以后，又颁布了《币制则例》，规定银元为本位币，铜元为佐制钱。民国元年（1911年）开始铸造孙中山半身侧面纪念币，作为开国纪念。三年后，又铸造了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俗称“袁大头”）。这一次所铸数量远远大于开国纪念币。

由于这两种银元与铜元共同流通市面，所以二者间需要兑换。由此产生了钱摊儿业。此业主要采用同地不同头寸，或者两地间汇款上的比价——也就是银元与铜元互相兑换时的差额等手法来赚取利润。其银钱业的用语为“贴水”，或“减水”。比如，法定的银币一元应兑换铜元一百枚，而钱摊儿只付九十七枚，余者即为“贴水”。反过来说，顾客在钱摊每兑换一元银币，就要支付铜元一百零三枚。

钱摊一般说在交通繁华或店铺林立的街头，利用顾客急于兑换零钱的机会开展业务。

他们往往只设一桌一凳或两凳，桌

帷上蓝底白字绣着“兑换银元”的字样。来兑换者除了顾客以外，还有摊贩和卖艺的人，他们一天辛苦赚来的钱，也需把铜元换成银元。所以，钱摊儿的生意一般不错，好的时候一天能赚三五块银元呢。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实行法币，也就是以中央、中国和交通三大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币，利用法币来收兑银元和民间的藏银。同时宣布，禁止银元流通。因此，街上的钱摊儿开始消失，另谋生意。

当 铺

旧时，北京有一种用实物作抵押向外借钱的行业叫“当铺”。老北京人谈，最先开当铺的是某朝代姓王的囚徒，经刑部判处永远监禁，年久，熬成“牢头”，可以管辖许多新收的犯人，王某遂在狱中勒索银钱，买卖食品、百货，甚至让众犯赌博，输钱者可以衣物向他抵押折钱。日久，王某积资颇多。后来，遇赦出狱，即开设“小押当”，门栏与栏柜皆仿监狱形式。门前大书“指物借钱，无论何物均可抵押，物值十而押五，坐扣利息，几个月为期，限满不赎，即变

卖折本"。后来逐渐扩大，成为一种营业。另外，还有的说，起初是由寺庙僧人开设的，后来才由商人接办。其实这些只是老人传说而已。实际上，当铺门前有木栏，纯属自卫，并非如传统所说的，当初当铺是由牢狱犯人开设的。

前清光绪年间，京师当铺不过二十家左右（民国后，则发展到四五百家），因须有官发的"当贴"（营业执照），每年缴纳"当税"若干，故此项营业又类似半官方营业，铺中伙计均是神气十足，竟有仗官势肆意剥削欺压平民者，以至与一般平民结下仇怨。当时有一则谜语说"远瞧一座城，近瞧是木笼。里头装着嘎杂子王八蛋，还有骗爷爷的那点儿铜。"（谜底是"当铺"）用来谩骂抨击当铺。甚至每遇事变发生（如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1912年正月十二兵变）即有流氓纠集平民伙抢当铺。

当铺内部组织与其它行业迥然不同，其经理不称铺长、掌柜，而称为"当家的"，与庙宇中的和尚住持同一称呼。故有人说，当铺当初是僧人开的，大抵与此有关。在当家的以下称"头柜"、"二柜"，又有称为"包袱褡"（满语，即总务头目）的，更有称"管库"的，其主

脑人则称“朝奉”。

铺内收当规则一直以银两为本位，为的是“拐零抹底”，原物能当一元的，仅写五钱、六钱，以至六钱五，其能写八钱的，亦不写元。又如：当时每银一两合铜元五百枚，赎时则按五百二十枚计算。押当者因急于用款，无法计较，只可听其任意折合。更有一种不讲理的规定，合铜元时，合入为九八，回赎时则收满钱，每月利息三分，朝当夕赎，亦须扣息一月，至月过五日，则加利一月。二十四个月为满，至时不赎，即被当铺变卖，其有包袱者，包袱即为伙友所有。

为防止纠纷，当铺乃采取一些措施，首先当票用的是东昌纸，以木版蓝色印刷，上面填写一种专门草字，局外人难以辨认。据说，凡初入铺的学徒，必先练习此种怪字。又故意降低原物成色，如新衣必写“油旧破孔”或“油旧破补”；皮货必写“光板无毛”、“缺襟短袖”；呢绒衣服必写“呢布大袄”；无论金银手表，必写“铜马表”；玉器必写“假石”，硬木花梨、紫檀家具，必写“柴木”。其所写之字，皆仅写一半；如“衫”为“乡”；“袄”为“夭”；棉为

"帛"，皮袍为"毛天"。搞得非常神秘。

在业务进行中，为使押当人听不懂他们的话，故皆用行话，谓之"徽语"，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这也是点当行的一大特点。

鼻烟铺

北京清代鼻烟铺很多，民国以来，除茶叶铺代卖外，卖精细货的只前门外大栅栏天惠斋一家，据说，它开业于清道光年间，于朝野上下，颇有盛名。至于大路货的也只剩新街口一家。天惠斋熏烟极新鲜，每天上新货，绝不干燥，香而不呛。专做梨园行的买卖，当时诸大名伶，除女演员外，都有闻鼻烟的嗜好。如著名演员谭鑫培、杨月楼、杨小楼、金少山、侯喜瑞、余叔岩、马连良、李万春、李洪春、丁永利等都是天惠斋的老主顾。特别是李洪春和丁永利更是天惠斋的常客，甚至在那里为学生说戏，为同行说合事情。清末，谭鑫培常到天惠斋买鼻烟，所以许多戏迷们都跑到天惠斋，以买鼻烟为名，等着瞧这位伶界大王的真面目。

当年，鼻烟分三种，一为"洋烟"；二为"中国鼻烟"；三为"闻药"。洋烟，

据赵之谦的笔记中说“明万历时，意大利人利马窦来华，以此向皇帝进贡，自此传入中国”。洋烟以味道分为“膻头”、“酸头”、“糊头”、“豆头”、“甜头”五种，价格非常昂贵。这种洋烟早就不再来华了。所以早年一些陈货已成一种珍贵的收藏品。当然，清末鼻烟铺已不售洋烟。中国鼻烟是以烟梗制成，为“烟坯子”，经过茉莉花、桂花等熏成，谓之“熏花鼻烟”，鼻烟铺卖的都是这种土造的中国鼻烟。至于闻药，是供应所谓“劝戒烟酒理善公会在理人闻用的，在理的有不吸烟、不饮酒的戒律，但为了寻求一些神经上的刺激只好闻点鼻烟，但又忌讳一个“烟”字，所以管某种鼻烟叫“闻药”。这种闻药是用各种花叶碾成，有荷叶闻药、薄荷闻药等多种，故鼻烟铺亦有售卖闻药之说。

鼻烟铺这种行业，随着人们嗜好的转移，早于半个世纪以前就销声敛迹了。

拉房纤的

过去，北京城里的房屋买卖、租赁是一项经常性的业务，有些人专门从中说合交易，以抽取佣金为生，谓之“拉房纤的”。这些人多属于城市无产者和自

由职业者，他们与社会上有着广泛的联系，能对大“吃瓦片的”（房产主）、老住户、商号，以及新的暴发户有直接或间接的了解。对某宅门有几所房，坐落何处，甚至某户家庭成员组成情况，有无家务纠纷，近来日子好坏，目前是否准备置产或出卖房屋，都能通过街坊、邻居、亲友各种渠道得到一些传闻，成为拉纤的“靠底人”。

拉房纤的每天早晨均在纤头家或大茶馆聚会，一面喝茶，一面互通信息。有时拉纤人为了得些佣金，主动劝有房之人，遇事（如办红白事）筹款的家主卖房，动员暴发户出资置产。凡欲买卖房产的都直接或间接找纤手代为物色“对象”。买房的先要说明需要房屋坐落地点、朝向、间数，如大四合、小四合、三合房等；卖房的除要说明自己房产的地点、朝向、间数，还要声明，确系祖产，内无纠葛，老契、红契（所有权状）蓝图证件俱全，并说明价钱以及承担佣金与否等条件。

拉纤人根据所掌握的信息之后，便合伙分头给买卖双方进行介绍、撮合，如双方有意，便约定时间同买方看房。经过买方“递价”，卖方通过纤手让价，最终成交时，即由“靠底”纤手代卖方

收取定钱（房价的百分之十）。然后由买方（新业主）择定日期、地点（一般都在大饭庄）立字、过款。

买卖房产成交后，新、旧业主给拉纤的（中保来人儿）佣金，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即“成三破二”即买房的新业主拿出房价的3%；卖房的旧业主拿出房价的2%。这样，拉纤的（中保人）就可以拿到房价的5%。但这5%佣金的分配还要分出大小份儿来，执笔写卖字、“倒字儿”的和出力较大的拿大份，次者拿小份。有时经新旧业主要求还要给自己的仆人分一份，谓之“门里一份，门外一份”。

立约之日，例由大纤手执笔，先替旧业主给新业主写一张“白字儿”（卖字儿），连同红契（所有权状）和蓝图一并交给新业主验收。随后，再替新业主写一张“倒字儿”给旧业主，承认交接手续已清，保证按期付足余款等项。新业主向旧业主付款后，这些拉纤的便以中保人的身份在“白字儿”和“倒字儿”上盖章画押。至此才完成了“使命”。新旧业主为了感谢他们起见，便当场把房价5%的佣金给他们分了，最后，还要摆上酒席，聚餐一顿。

喜轿铺

旧京，办喜事用的轿子、仪仗、响器，以及其它一切礼仪用品（包括通信过礼时用的鹅笼、酒海、什盒；抬嫁妆用的栏杆桌：迎娶礼仪上用的红毡、宝瓶、马鞍、弓箭、金银水壶、盖头、拜匣等等），除了皇帝大婚，由皇宫内院的“銮仪卫”自办自备外，民间，乃至王府、官宦之家都须向喜轿铺去租赁，俗谓之“讲轿子”、“讲执事”、“讲响器”，并由铺方代雇轿夫、执事夫、吹鼓手。清末民初，北京喜轿租赁业还相当兴隆。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有金匾字号的喜轿铺约有 120 余家。但开设的比较分散，基本上各有各的营业范围，所以竞争并不太激烈。当时，内城不但有王府豪门，还有众多的绅商富户，经济条件较好。所以，内城的喜轿铺较多，生意也较城外红火。著名的喜轿铺有：

一、地安门外大街有兴泰号喜轿铺，设备完善。掌柜交际较宽，专应满、蒙八旗王公的迎婚大娶。民国十一年（1922 年）十二月，退位的清帝溥仪大婚，因宫内銮舆卫的仪仗、响器以及其他礼仪用品不敷应用，遂找兴泰号喜轿

铺代为承办。因此，名声大振。

二、交道口蓬莱号喜轿铺（经理沈伯全为北京市婚丧用品同业公会首任副会长）和西长安街的道德生喜轿铺均系清末开业，专应王府宅门的迎婚大娶。民国以后，只有这两家轿子铺能应“满天星”的轿子。同时，两家都兼营出赁办红白喜事用的家伙座。其中，蓬莱号为广开财源，还兼营婚丧喜庆的席棚业。

三、北京喜轿铺中有三个“天顺号”即东城八面槽；朝阳门内北小街和地安门外大街各有一天顺号喜轿铺。其中，地安门外天顺号专应王府门头豪华型的传统婚礼。

此外，比较著名的还有北新桥的新盛号喜轿铺；朝阳门大街的福和号喜轿铺；东四牌楼的天合号喜轿铺等。皆为资金雄厚，设备较全的大铺。

二流的如阜成门内宫门口葡萄园德成号喜轿铺，能应满、汉两门的婚礼。软片、执事成色新，人伕整齐。在西城一带的居民当中有较大的声望。又如：崇文门外三转桥的合兴号喜轿铺，专应汉门轿子、仪仗。民国九年（1920 年）以前是南城外生意较好的著名店铺。自老经理去世后，由于后人经营不善，以

至业务逐年衰落，竟被后起之秀的“驾衣卢”所开设的阜顺号喜轿铺（崇文门外南河槽）所取代。

喜轿铺业务最大的特点就是生意比较集中。过去，民间办喜事为取吉利，都必得选择所谓“黄道吉日”，而一年里“黄道吉日”中“宜嫁娶”的好日子是有限的。所以，平时并没有生意可做，可是一旦遇有“黄道吉日”，一上买卖就是好几档子，甚至十几档子，都要求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用轿、用执事，简直应接不暇。如果柜上设备和人手不够，眼看许多有钱可挣的大买卖只好忍痛放弃了。俗云“吹鼓手，命里穷，好日子，就怕重”（“重”读“崇”）。所以，喜轿铺就把出赁喜轿、执事分成上、下午两伙，用上午的这伙价钱高，用下午的这伙比较便宜。但新人上下轿有所谓“吉时”的限制，讲究的富户是绝对不用二伙轿子的，只有那些穷户才能勉强将就。总之，喜轿铺必须有较多、较好的设备。大的喜轿铺有财东撑腰，肯下大本钱，不怕压资金，有的是宽敞的后柜栈房，不怕设备多占地方。同时，手下有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交际较宽的头目人，与各红白口子都有交往，用人时一

呼百应，即使人手不足，也能通过某种关系到其它口子上去找，不致误事。这样，才能敢于应“大活”、“全活”。

早年，喜轿铺除了字号铺以外，还有个人私下承包出赁喜轿、执事，代雇轿伕、鼓手的。因为没有金匾字号，时人称之为“飞来号”。价钱比字号铺便宜。但它们不太注意信誉。应出去的活多有弊病。一旦人手不够，使找些生手外行人去滥竽充数。例如：八面大鼓里边顶多有四五个人是真正的吹鼓手，其它三四个人均是只拿不到半份钱的混子。时人谓之“牛”，仅拿着乐器比划，只要从外表上看，口形、姿势与真的一样就行了。打执事的人手不够时，则以一人扛两块红牌，扛着“肃静”，外带“回避”牌。而且衣服鞋帽不整，走起来乱无秩序。因此，大户人家办喜事绝对不用“飞来号”。民国二十年（1931 年）以后，由于受新潮影响，举行文明结婚婚礼的日渐增多。字号铺的生意尚且日渐衰落，“飞来号”自然就被淘汰了。

火壶茶会

火壶茶会是专门供应办红白喜事人家的开水、茶具和盥漱用的行业。

早年，烧开水还不讲究使用锅炉，而是用一个紫铜或红铜的大茶汤壶，它与庙会上卖茶汤、油茶使用的那种长嘴大搬壶是同一品种，这便是所谓的“火壶”。它成为“茶会”的标志。

早年，民间的火壶茶会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但不都是营业性质的。第一种是民间善会为了向“朝顶”（如丫髻山、妙峰山、中顶、南顶）进香、献艺酬神的会档儿（如开路、五虎棍、中幡、跨鼓、高跷秧歌等）成员和广大香客施粥舍茶，谓之“助善”。第二种是中华劝戒烟酒理善公会的基层组织在理公所举办的。他们为了劝戒烟酒，让自己的信徒使用没有沾过荤酒的“净壶净碗”饮水，所以在红白棚里甘愿义务供应开水、茶具。第三种是闾巷亲朋共同集资举办的，属于公益事业，凡加盟人的家里遇有红白喜事，都可以免费使用。以上三种茶会都立有严格的会规和礼节，办事的人家如果使用必须下帖邀请。第四种则是营业性的火壶茶会。

旧京，经营此业的一般不设门脸（不是座商形式），而是蹲在家里等主候客，仅于门口写上“×记火壶茶会，定期不误，风雨无阻”字样，有的也给自

家起个堂号，有的连堂号都不用，这是为了避免缴纳苛捐杂税。他们的营业主要靠亲朋及同行人介绍。如有用户，不必循“善会”之例下帖邀请，只要肯出钱付足价款，一呼即应。

他们应了活后，根据用户办事的规模大小，照例用一对或两对黑漆金纹的“笼子”（“笼”字读第三声），装上全部家伙，给用户挑了去，谓之“上会”。再根据办事人家住房格局和具体环境以及本家提调的意见，进行摆设火壶与茶具的“摊子”。有设于门道的，有设于影壁之前的，有设于垂花门左右的……总之，是设于棚外，但院内院外（门口）不拘。

火壶茶会的摊子规模不一，大的是以数十张八仙桌拼成一个大长案，小的则以五张、七张、九张八仙桌拼成一个大长案。案前挂着不同颜色图案的缎绣桌围子，上书堂号，如“某某堂敬献清茶盛会”。并插着绣有堂号的三角形镶着“火焰”边儿的会旗，以为标志。长案正面有供神像，有不供神像的，不论有无神像都要摆上画着折枝花卉的八扇屏。案子两旁有大型茶叶罐，有锡壶、铜壶各十二把，有成堂配套的磁质茶壶、茶碗，谓之“净壶净碗”。茶具上的图案一

律为花卉、山水，不得有人物、鸟兽。避免与案上的神佛并列，受人参拜。另外，桌上绝对不许摆放烟具、酒具。长案的最前排立有长方形玻璃罩的“门灯”一对，上书堂号。

长案右侧设大型紫铜茶汤壶一把，如是大型茶会，则于左右两侧各设一把，当做锅炉，用来烧开水。茶汤壶总是炭火通红，随时保证有沸水可用。

长案左侧设特制的大型脸盆架一至两个，搭新毛巾若干条，并设一尺五寸至二尺直径的铜洗脸盆一个至两个，以供来宾们盥洗之用。

营业性的火壶茶会相对地比“善会”性质的茶会礼节、规矩少，听使唤，也比较殷勤，早出晚收，服务主动热情。所以，有的家主办红白事时愿意雇这些营业性的茶会，虽然花一点钱，但用不着搭人情。免至将来要相应地还礼。

20世纪40年代以来，各种“善会”性质的火壶茶会都因经济来源枯竭而办不下去了，只剩下民间少数的营业性火壶茶会在苟延残喘，成为一种似有似无的行业。50年代以后，由于民间红白喜事的从简，火壶茶会也自然归于淘汰。

棺材铺（桅厂）

旧时，北京较大的棺材铺，谓之“桅厂”。因明、清两代，京师给养都靠大运河运输，造船桅的木材主要是杉木。而北京民间特别流行用杉木做棺材，所以不少棺材铺挂着桅厂的牌子，暗中却以造棺材为主。民国后，漕运停止了，水上的交通工具也日渐进化，船桅的生意少了，但以造棺材为主的木厂、棺材铺仍沿用桅厂这一招牌。按《北京经济史料·北京木材商况调查》的说法，由于“棺材”二字为一般人所忌讳；需要换个称呼，以免影响业务的开展。总之，桅厂是制作、售卖棺材的木厂之代称。

旧京，桅厂有山西人投资经营的，谓之“山西帮”，还有北京人投资经营的，谓之“北京帮”内城与外城的棺材铺在经营范围和服务对象上不尽一样，内城的棺材铺带杠房，有的还代售寿衣，甚至带响器铺，代雇民乐鼓手，兼营冥器纸活，成为殡葬服务一条龙的综合性店铺。内城的棺材铺能承办满、蒙、汉三军二十四旗旗民的丧事，外城的棺材铺主要承办汉民的丧事。

大桅厂是自运木料，一般的小厂也

是柜上买材料。如果买来的是整料，先雇工人以拉大锯的办法破成板片，再雇一批手艺人去攒活。柜上称这些工匠为“了作儿的”，意思是做活的。工匠吃柜上的饭，拿的是计件工资，称为“料件子”，即以活件的大小来计算报酬。为了不让工匠糟踏原材料，柜上要求工匠，剖解木材，须先在木材上弹加墨线，再按木线处进行剖锯。以巧用、节约木材。这样，柜上在计价工资外多加一笔所谓“拉线钱”作为奖励。

做棺材的工匠，老北京人称之为“斜木行”，因为棺材是前头大，后头小，前头高，后头矮，其形体不是平行、垂直的，所以工匠做活放线是斜的。与之相反的是给活人盖房上梁的木匠，谓之“中线行”。老北京人谓此为“一阴一阳”。

当年，棺材铺门前都标榜“内看轻重寿材”，所谓“轻重寿材”并非指其分量，主要是指木料与工艺低档、高档而言。高低两者价格相差很悬殊，其价格以七七事变前的银元计算，从十数元钱、几百元钱到数千元不等。

寿材从样式来讲有满、蒙、汉旗民与汉民之分；从质量上来讲有木料类别、

尺码规格与工艺粗细之分。常见的寿材有如下几种：

一、汉材：通称“蛮子材”。大盖做成月牙形，两帮做成弧形，平底，两头各用一撑子（立板）支起。其厚度有不同规格。例如：盖五寸，帮四寸，底三寸，谓之“三四五”的材简称“三儿五”的材。如果盖六寸，帮五寸，底四寸，谓之“四五六”的材。比“三儿五”稍大，又不足“四五六”的材，谓之“三儿五放样”，大于“四五六”的，称为“四五六放样”。以上是汉材的通用规格。

汉材用料堪称三六九等，最上品的有阴沉木的，此系稀有的介乎木化石与木头之间的材料，按旧制，只有封建帝王才能使用。其次是金丝楠的材，还有仅次于金丝楠的香杉材，都是供王公大臣及一品大员使用的。再次为柏木材、杉木材、松木材。此外，还有用大叶杨、小叶杨、椴木、旱柳、河柳等木材做成的，成本与售价都比较低，是卖给一般平民、贫民阶层治丧用的。

二、旗材：亦称“满材”、“大葫芦材”、“荷包材”。棺的两帮上部成为坡形，下边垂直到底，整个棺身为一大六棱形。其盖隆起，两边斜坡。大盖前端

安一个与棺盖薄厚相等的木质大葫芦，以合叶相连，可以往回折叠。

满材与汉材规格不同。满材前头厚，后头薄，通常是前头三寸，后头即为二寸五。但帮、底、盖的尺寸都一样，一般前边为三寸、五寸，故只称“三寸材”、“五寸材”。其木料多是金丝楠、紫杉、黄柏等高档木料，最次也是杉木的。王爷用的大葫芦材使用的是“官制子”，尺码为八尺一寸长，五尺四寸高，四尺五寸宽，木板厚度为五寸五。不过，一般桅厂没有这种成品可卖，都是等待王府来订制。

三、南材：此系南样材，与一般汉材形式基本相同，但其底盘凸起，与盖的形状一致；底撑子（立板）退进去约七八寸。为便于抬运故比普通汉材板薄，体积小。一般尺码为长度七尺，盖宽一尺八寸，其厚度为盖四寸，帮三寸五，底三寸。不过，南材尺码不一，有大有小，用主可以订制。南材虽然板薄，但都是高档木料做成的，如香杉、金丝楠之类，最次也是柏木的，且多为“四独板”整料做成。这种棺材均是卖给客居北京的南方人，准备扶柩回籍安葬的。

四、套材：此即所谓“椁”，无固定

尺码原则上需要将“梓材”（装殓着死者遗体的叫做“梓材”）套进去。因此，体积、容量都相当大，同时，内无“子带”。一般多为柏木、杉木。通常多用于移坟起灵上，因原来的棺木已腐朽，必须用椁来套装。但也有新丧用“椁”的，但都出在比较讲究的富有人家。

五、椁匣子：凡成人用的木椁匣子，行话谓之“斗子”。此是以劣质薄板钉成的匣子，是棺木中的等外品。大多为杨柳木、柴木做成的。其盖、帮、底均为三分薄板。旧时，卖给公家用以装殓乞丐、“闲等儿”、贫民收容所里孤寡贫民。再稍好些的则是用四块七分厚的木板钉成的所谓“成材”。平形的棺盖上钉一立条，谓之“顺脸儿”，涂上土红色，是卖给赤贫丧家的。因为工糙料次，不结实，经不住野狗去扒，故俗称“狗碰头”。

旧时，世风提倡孝道，崇尚礼仪，无论贫富均竭尽所能给老人置办棺木。所以，棺材铺的营业当然应此世风而兴。据1940年《新民报》的不完全统计，当时北京市内经营“林业产品”的总数也不过有263家，而做棺材的槐厂占86家。

20世纪50年代初，出售槐材的厂商尚有80多家，从业人员约两千余人。1956

年，北京的棺材铺联合成立了北京寿材厂，总部设在东四马市大街，并在各城区设立中心店，卖些水泥板的棺材（要求进行深葬）。此后，逐渐实行火葬，棺椁殓物已无存在价值。1964 年，北京市民政局成立了殡葬服务公司，对殡葬行业实行统一管理，北京寿材厂也随之撤销。

寿衣庄

死人穿的衣服鞋帽，谓之“寿衣”，俗称“装裹”。寿衣庄就是死人的服装商店兼首饰楼。

封建时代，人活在世上穿衣戴帽，如何装饰打扮，都必须根据自身的政治地位、官品、爵衔而决定，不得逾制乱穿乱戴。死后亦依然如此。此系国家典制。但清朝统治者为缓和民族矛盾，在制定服制时，采纳了明朝遗臣金之俊的“十从十不从”的建议，其中有“生从死不从”的说法，故在服饰上，汉人死后入殓时用的寿衣，仍可维持明装。于是清代装殓亡人用的寿衣就有清装、明装之分。民国期间，仍沿袭其旧。维新之家亦不过以通用的蓝长袍、青马褂、六合“瓜皮”小帽作为寿衣。

不论清装、明装、民族、僧装、道

装，只要是属于寿衣的即与活人穿的衣服有所不同，其中有许多禁忌。首先是用料方面，不得用缎子，因“缎子”与“断子”谐音，俗云“人留后辈草留根”，不能断子绝孙。因此，装老的衣料一般都用春绸、湖绉，不用夏季衣料。无论内衣、外衣，一律不用纽扣，因为“钮子”与“扭子”谐音，人亡留后，应留孝子，不能留下“扭子”。所以，只钉“飘带”，取“带子”——后继有人之意。寿衣件数必须是单数，为是避免“重丧”(即百日之内再死人)。寿靴、寿鞋都必须是布底，忌用皮底，更忌给亡人穿皮衣、皮鞋，怕是亡人下世脱生为身上有皮毛，脚上有蹄的畜类。

正是因为寿衣有着以上特点，在很多方面区别于活人穿的衣服（包括首饰），基于人们的这种特殊需要，所以市面上才出现了专门出售寿衣的商店，据1920年出版的《实用北京指南》载，当时的寿衣铺有33家。1926年出版的《增订实用北京指南》统计又增加9家，共42家。

早年，前门外东珠市口迤南东半壁街、西半壁街是寿衣庄的聚集之处。这里几乎半数以上的店铺都从事寿衣行，

其门前都摆上一只立体木质的大朝靴当招幌，玻璃窗上彩绘着免去花翎的“秋帽”、元宝形的莲花头枕、脚枕，用以标明所出售的商品。这里的店铺是内行人所开，自己进料，请手艺人加工制作，在经营方式上也比较规矩。

另一种是散落在市面上其他街巷的寿衣商贩，其中有偷捐逃税的地下买卖。待余生在《燕市积弊》寿衣铺一节里说："这行买卖大半出于外行人所干（半壁街才是内行哪），不是江湖之辈，就是市侩之徒，没事弄俩钱儿，或在家或设铺儿，净冤外路到儿。弄点子破绸片子，烂衣裳里子，用酱（糨）子一糊，就卖大包的银子，其实他一无手艺，二不会做，就仗着跟半壁街去穿换……”他们在经营上多以蒙骗为手段。例如：穷人家突然死了个人，没钱买寿衣，只好托熟人去赊。这时，业主貌似慷慨，以“急人之所急”的姿态出现，先不讲价钱，就让来人将寿衣拿走，因为死人穿了去是无法再脱下来的，当然没有退货的后顾之忧，及至死人出殡入土后，孝子还账时，他们便板起面孔要个大价钱，而且不准还价，结果把介绍人也夹在中间，落个对不起孝子，有苦说不出，孝子也

只好认头还钱。他们的这种恶劣的经营方式显然是杀鸡取卵。

代卖寿衣的还有棺材铺、杠房。他们与半壁街上内行寿衣庄都是服务于大宅门、王府门头等社会上层人士，所以都比较注意名誉，讲信用，不敢弄虚作假，售卖伪劣商品，更不敢玩弄欺诈手段。否则，就要倒闭。

给亡人穿特定的寿衣、盖特定的衾单、经被，直到今天还有这种习俗，而且出现了“西装寿衣”、“时装寿衣”。由于需要火葬的关系，一些金属性的首饰自然也就全免了。

冥衣铺

封建社会中，上至皇室、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除少数回民外，汉满两族人民普遍崇佛信道，认为人死以后，到了“阴间”也像在“阳世”一样，需要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生活资料，也需要奴仆、差役来伺候。为使其升天，必须由金童玉女来执幡接引，于是就用秫秸、彩纸给亡人扎糊些建筑物、家具陈设、交通工具以及仆役人等。说是经过僧、道念咒“加持”后焚化，死者即可得去，在“冥中享用”。这样，专门以

扎糊纸活冥器为业的冥衣铺便应运而生。同时也养活了相当一批以裱糊为业的手艺人。

旧京的冥衣铺，通常都开设在繁华的大街面上，店铺占的面积较大，一般多是两三间门脸，前边有走廊。有个别带后院的，可以做活。但大多数都在前柜支上大木案子，就地做活，店铺即车间。这种店铺除有极少数半成品和原料外，基本上没有现成的成品可卖，而是由雇主预约订做。

冥衣铺有它独特的幌子。在门前走廊下，照例是摆一匹彩纸加固的大马，或以彩纸加固的小毛驴儿吊在幌杆上，有的则是以彩纸糊成一对或一个轿车的轱辘吊在幌杆上，能应细活的店铺则是在廊下吊上一对开路神的头像。同时，门前两旁窗户上，倾悬长方形的木招牌两块至四块，上边小格内写着“金山银山”、“金童玉女”、“绸缎尺头”、“文房四宝”、“古玩陈设”、“四季花盆”，下边大格内写着“寿生楼库”、“车船轿马”、“裱糊顶棚”、“油漆彩画”标出自己的业务范围和经营项目。

旧时，人们都说冥衣铺是服务于“神”、“鬼”人（或说是天、地、人）三

界的买卖生意。其实它主要是一种服务于人间丧礼的行当，相应地兼营与裱糊有关的业务。清同治《都门纪略》载：北京冥衣铺“凡丧事所用之车、船、轿、马、冠袍、带履，又楼库、童人儿等物无不精妙，与真的无二，非它处可比。”其产品实际上等于一种精糙不等的裱糊手工艺品，由于只用于祭神、奠亡，焚而烧之，故被人们简称为“烧活”。其业范围，大体可分五个方面：

一、官、民祭祀神佛用的纸活。封建社会里，寺庙以及民间为祈福迎祥、消灾解厄，经常举行各种不同形式的法会道场，需要制作一些神龛宝盖、童人和执事（仪仗）。例如：每年六月十三日“分龙兵”之期，要扎糊龙王驾；六月二十三日为“水草马明王”诞辰，要扎糊水草马明王驾；六月二十四日为关圣帝君诞辰，要扎糊黄龛、七星皂纛、马匹、马僮、黄幡宝盖等仪仗。又如：闹天花时，要给掌管幼儿命运的九位娘娘扎糊九顶八抬大轿，泛称“九顶娘娘轿”。

二、佛教寺院法事活动用的纸活。历年阴历七月十五日，各大寺庙及某些团体为超度“十方法界无祀孤魂”皆举办盂兰盆会或中元法会；七月三十日

（小建则用二十九日）为大愿地藏王菩萨诞辰，佛经上说他有“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大愿，故佛教寺院皆祈建超度亡魂的道场，谓之“地藏会”。以上两法会圆满时必祭送纸扎法船。

法船为巨码冥器，是分截糊成的，其尺码大小不等，有长至数丈者。

又如：佛教寺院举行“水陆法会”送圣用的纸活，开路神、四值功曹的坐骑、巨码法船，以及楼库五堂。

三、给老人办寿用的纸活。如给老人“在阴间预修冥府”和财库、聚宝盆、摇钱树、金山、银山，以及福、禄、寿三星立体纸像等。

四、丧礼中祭奠亡人用的纸活。如灵前的金童玉女，四季花盆、尺头桌子，接三用的车马、杠箱，送库用的一楼二库、阴宅；出殡用的开路神、打道鬼、香幡、香亭、喷钱兽，以及孝子用的引魂幡、灵牌、孝杖等。

葬后，“五七”烧的伞盖，六十天烧的法船、金桥银桥等

五、直接服务于活人的“白活”。旧时，北京的瓦房通常都是起脊的，从两墙砌起了山尖。从室内看，四架大柁之上，皆是逐步收缩的山尖，露着席箔。

若要美观、保暖、需平柁糊上纸顶棚，上至宅门府第，下至百姓民宅，只要是住房，即毫无例外。尤其家里办喜事，满礼历来要求男方把屋子（顶棚和墙壁）糊好。此外，还应糊窗户、糊隔扇、粉刷楼房，以及古典建筑上与民房住宅上的油漆彩画。

冥衣铺因时而兴，亦因时而灭。解放后，冥衣铺还有些零活可做，但已不多了。20 世纪 50 年代末，冥衣铺的倒闭已成定局。他们拿着很大捐税，因而挣不了多少钱，甚至连柜上的挑费都不够，自然就得另想出路。有的改成花圈铺，有的兼营文具纸张，有的干脆关张大吉。到了 60 年代初，整个行业即被淘汰，其从业人员有的转业成建筑工地上的油漆匠或泥水匠，有的加入了纸花、绢花行业。至于其裱糊手艺皆多不传。

杠　夫

过去，长期受雇于杠房，以给丧家抬灵、起灵、下葬为职业的，谓之“杠夫”。抬灵需要技术，但杠夫却无师徒之说。作为人多的大杠，杠夫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工种：

一、打尺杠夫。指打“响尺”指挥

杠夫的头目。

二、出堂杠夫。指从丧居院内往出抬灵时“圈活绳”的，抬棺出过道门时驮棺“跟趟”的，和上下台阶时“下肩”捧材的杠夫。

三、下葬杠夫。指往坑内系棺，下坑用脚“登实”（使灵柩的后尾与坑帮离开）的杠夫。

四、做活杠夫。下葬后往坑内掩土的杠夫。

五、抬灵杠夫。指以上四类以外的，只管抬灵而走的杠夫。

除了打尺的杠夫（头目人），经常在其所吃的杠房柜上等活外，其余四类杠夫，每天均上“杠口子”茶馆里等活。听候头目人的召唤和分派。

此外，还有一班待雇的杠夫，每天到杠房门口坐等派活，谓之“小口子”。他们的头目叫做“门蹲子”。凡是不挑字号，不打“拨旗”（因“拨旗”上有杠房字号）的活，如转空（抬空材）、送灵床、立幡架子、摆太平杠等，都归这个“小口子”上的人去干。如果有用八个人以下的小杠，或柜上临时应了“暴攒儿”的活，需要马上抬的（不论多少人的大小杠）都归这个“小口子”的人来抬。

杠夫与杠房的关系，既是长期的，又是临时结合的。只有杠房应了活，派到杠夫名下，才有活干，才有工钱。杠夫的工钱是根据杠的规模大小而定的。七七事变前，抬八个人杠的，每人挣十二吊钱；抬十六个人杠的，每人挣十六吊钱至十八吊钱；抬二十四杠的，每人挣二十二吊至二十四吊钱；抬四十八人杠的，每人挣四十吊钱；若抬六十四人大杠则每人挣四十吊至五十吊钱。

杠夫除上述工钱外，照例还有两种零钱，都带有奖赏的性质。一是本家给的所谓“加钱儿”。另一种则是杠头由柜上将整个杠钱算下来，除了每人应得的工钱（照例是十六人杠，算二十二份工钱，给柜上的伙计和跟杠打拨旗的杂务。大杠更要分得份多）以外，余下的与本家给的“加钱儿”合在一起，分出大小份，谓之“零钱”，有十吊、八吊、六吊、四吊、两吊不等。放在柜房地下，杠头在旁边一蹲，等杠夫自己来拿。

杠夫从工地（坟地或庙宇）回来，未曾拿零钱得先报出今天自己做活的名目来，说明自己拿的什么钱。例如“趟儿钱”（即出堂时门窄钻到灵柩下驮着走）、“套钱”（出堂背套）、“搂棺材钱”

(中间加一把套)，又如出堂“扛栏杆钱”、“看托子钱”等，名目繁多。其中，最有趣的是，头目常常布置一个比较善于戏谑的杠夫，在途中说一两句笑话，活跃一下空气，以解除杠夫们的疲劳，这个角色谓之“杠丑儿”，回来也拿一份零钱，谓之“骂钱”。但有的小杠房或大杠房抬小杠时，并不分得这样仔细，只是按“摇头”(抬前边的杠夫)、“摆尾”(抬后边的杠夫)、“挟胳膊”(抬中间的杠夫)，即按杠夫所抬的位置分出大小份就行了。

杠夫是典型的城市贫民，其家庭亦系“赤贫”者流。他们以出卖劳动力为主，大部分人吃红、白两口，不但应丧事抬杠的活，也应办喜事抬轿子的活。有的上午去抬死人，下午还要赁辆洋东去拉活人。否则就不能维持生活。杠业从来不养小不养老，杠夫年岁大了，体力不顶劲时，人缘好的或与杠房有点瓜葛的，还能受到打尺头目照应，勉强被召去扛扛“交木”，干点零活，一般的也就被淘汰了。

杠　房

杠房是为殡葬仪式服务的行为，以

出赁杠、罩、执事（仪仗），代雇杠夫、执事夫，代应“响器”（即鼓手）为主。内城有的杠房与寿材铺合二而一，同时代卖寿衣，南城则多数杠房与寿衣铺、寿材铺三者分开。

旧京杠房的经营者，大体上可分为两帮。一是山西人经营的山西帮；二是北京人经营的北京帮。最初，清代的京师主要是山西人经营的杠房，他们克勤克俭，经营有方，是杠业的创业者和奠基者。当时京师没有真正的所谓京杠房，凡是能应满、蒙、汉三军二十四旗丧事的全是山西帮的杠房。只是后来从山西人开的杠房里分化出一部分当过头目和了事的北京人，出来自己单挑字号开业，才出现了京帮杠房。

从晚清至民国期间，北京市内城能承办满、汉两大民族大葬礼的杠房主要有：

一、永利杠房　开设在东城灯市口大街。属于京帮。专门伺候清宫皇室和各大王府的丧典，备有皇杠、皇罩、銮驾仪仗和办大丧典的各种设备。清末，它曾辅助銮仪卫承办过帝、后的奉安大典。光绪二十九年（1903）曾承办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保荣禄的葬礼。民国五

年（1916）六月，曾承办北洋军阀袁世凯的葬礼。

二、合兴杠房　开设在地安门外东黄城根。属于山西帮。系清宫木库陈家的买卖。柜上被请出来的经理和鼎臣，在同业当中名气很大，是七七事变后组织起来的北京婚丧用品同业公会第二任会长。该柜专应各大王府、宅门及绅商富户的大丧事。曾承办蒙古阿拉善王府（罗王府）罗王福晋大丧。又曾承办军阀石友三母亲大丧。曾与地安门外西黄城根信成杠房联合为军阀张作霖拴了一付“红万字杠”，但没来得及使用，就因发生“九·一八”事变而罢论。七七事变后，曾以清制“八分公”典制，抬过溥心畬的太夫人（溥儒的母亲）。

三、永盛杠房　开设在东西猪市大街。为京帮。颇具规模。1938年，曾承办那王府那王爷（外蒙王那彦图）的大丧礼。1940年，曾承办北洋军阀吴佩孚的特大丧礼。

四、日升杠房　原在西长安街开业，后迁至西四兵马司胡同东口外缸瓦市大街。系山西帮。经理孟羲之，曾承办孙中山先生的葬礼，为此新绣了一套带有国民党党徽“青天白日”图案的罩片和

驾衣，并新置了白杠蓝绳（传统葬礼皆为红杠、红绳）等设备，从香山碧云寺抬往东车站，部分杠夫跟随去了南京参加“总理奉安大典”仪式（即在中山陵安葬）。从此名声大振。

五、信成杠房　开设在地安门外西黄城根。属于京帮。经理狄琴荪，是七七事变后组织起来的北京婚丧用品同业公会的第一任会长。1927年开业，是后起的大杠房，能适应民国鼎革后的新形势，吃满、汉两门，专门承办大丧事。1933年，曾承办李大钊从浙寺起灵至西山万安公墓安葬事宜。1942年，曾承办伪满帝宫谭玉龄的葬礼。还曾承办前清末科状元刘春霖等人的特大葬礼。

六、同顺杠房　开业在宣武门内大街，属京帮，颇具规模。1936年，曾承办北洋执政府段祺瑞的大丧。1940年，曾以金龙罩六十四人大杠抬过北京道德学社“师尊”(社之首脑)。

七、义茂杠房　开设在北新桥东大街。属于京帮。专应满、蒙旗人的大殡。1932年，曾承办被冯异祥的国民军从紫禁城轰出来的两位太妃——瑾妃（珍妃之姐)、瑜妃（同治帝之妃）入陵的奉安大典。

此外还有西单北甘石桥永吉杠房；朝阳门南小街同顺杠房（“东同顺”）；西四羊市大街庆升杠房等。至于南城，有大家伙，设备较为完善，能应绅商富户大葬礼的杠房约有四家：正阳门外西柳树井恒升杠房；崇文门外火神庙广兴杠房，曾应京剧名伶王长林、杨小楼、叶春善等大葬礼；崇文门外石板房天成杠房，曾应名妓赛金花的葬礼；宣武门外天源杠房等。

出赁家伙座儿铺

旧时，有种婚丧用品出赁行业，叫做“家伙座铺”，专门向办红白喜事的人家出赁招待来宾坐席的桌椅板凳、茶具、餐具，以及礼堂（灵堂）上所需要的供器、祭器。不过，真正独立开设的家伙座儿铺并不多。有的为增加收入开辟经营项目，兼代“响器铺”（鼓铺）如出赁丧祭典礼上所特用的“大鼓锣架”、“梆点二报”，代雇官鼓大乐、清音等吹鼓手（民乐）。如鼓楼西郭记永兴号等。

家伙座儿铺是种纯服务性行业，以自家的庞杂设备服务于民间的婚丧礼俗。它不需要多少工人（伙计），从业人员也不需要什么特殊技术。开业者只需下些

本钱，置备一些办红白喜事用的桌椅板凳等木器家具和桌围、椅套，再带上十几套至几十套茶具就行了。

木器家具谓之“硬件”（以区别于桌围、椅套等绣片软件），招待来宾喝茶、用餐的坐席泛称“官座儿”。早年，一个官座儿是八仙桌一张，二人凳两条，杌凳两个，或不用凳子，而用椅子六把。官座儿在未开饭前是茶座，开饭时即成为饭座儿。民国后，兴出了大圆桌面儿，开饭时将大圆桌面加在官座儿上，即由六人座儿变成九人座儿或十人座了。

清代，满族人家办红白喜事还有使用“炕座儿”的，是在堂屋炕上放的坐席，一张八仙桌大小跟地八仙一样，只是桌腿短一半。一般不再用椅凳，只是靠枕、铺坐卧。此是办事人家招待近亲、新亲席用的座位。

当年的家伙座儿，讲究用金漆的。办红事所用的桌围、椅帔、凳套都是红色的，上面是平金绣花的，以渲染喜庆气氛；办白事就用青色、蓝色绣花带银线的，以保持棚内哀婉肃穆的气氛。材料有缎子的、哔叽的、洋呢的，夏天用葛布套的。种类繁多，不一而足。

此外，厨灶上也需用一些条桌形式

的木器，谓之“油桌”，以摆放菜馔的成品、半成品之用（厨行将菜肴做好后，由打下手的油行将菜端放于接手桌上，再由茶行往亲友们的坐席上端）。

家伙座儿铺兼营响器铺（鼓铺、主要是丧事用的响器），可能出赁些给老人办寿时寿堂上用的供器。通常给老年男子办寿，用圆形蜡扦一对，梅花鹿驮着的花筒一对，特制香炉（炉盖上卧一梅花鹿，嘴里叼一灵芝，谓之“万年草”）一樽。给老年女子办寿则用仙鹤灯式的蜡扦一对，即一对对称的仙鹤叼一莲花，花蕊中出一签子，用以插寿烛，仙鹤驮着的花筒一对，特制香炉（炉盖上立一单腿独立的仙鹤叼一灵芝）一樽。有的家伙座铺与杠房一样出赁灵前供器、祭器，如香炉、蜡扦、花筒、高脚供碗（五件为一堂）、长明灯（闷灯），满礼用之奠酒池、执壶、奠爵，汉礼用之檀香炉、香碟、香碗等等。这些供器、祭器有铜、锡、铜胎景泰蓝，甚至仿青花、粉彩等古瓷的，质地粗细不一，可供用户选用。只不过租赁费不一罢了。

出赁孝衣

早年，在丧礼上孝属须按与亡人的

血缘关系穿孝，通常都是自家缝制孝衣。但前往丧家吊唁的近亲也要穿孝，这种孝衣均属“灵出孝满”，不需购置。所以，就由丧家或本人出资去租赁，穿用后再为归还。租赁孝衣须有押金，如果有熟人介绍担保，则不必放押金，事后只按日付租赁费即可。但不得拆改，将长去短，将肥改瘦，油污损坏，否则，照价赔偿。

过去，该业经营者多为民间杂居的个体户，他们根据民间丧礼上的需要，置备下多种不同形式的孝衣，如粗白布不缉边缘的重孝孝袍，粗白布缉边孝袍，漂白市布的轻孝孝袍。还有妇女，小孩穿的孝衣大小号不等，各若干件，任凭租赁者选择。此外，他们还租赁棉被、棉褥。因为办丧事的人家往往需要留下一些近亲守灵，夜晚棉被不敷应用，也可以租赁几条被褥应急。按日计价。旧京凡经营此业的都在门前挂上一块木牌，上书“出赁孝衣，三新棉被”。但仍以朋友、邻居介绍者为主。

绣货庄

清代，刺绣是民间妇女的家庭副业，而后发展成为绣花作坊。多设于永定门

外大，小红门和朝阳门外吉市口一带。专有“头人”主管“放活”、“收活”。绣品称为“京绣”。除小件荷包（即随身携带的绣花小囊，用以装零散财物）外，还有绣花衣裙、枕头顶、床幛等大件绣活。

北京原有官办的绣花作坊，设在前门外南草市一带，产品也称“宫绣”，多供皇室王府贵胄们服用。产品特点是绣工精细，走针层次整齐，串针方向顺利，配色协调，富丽大方，只求精工细做，不怕费工费时。相传皇帝龙袍上的图纹，均有定制，如肩担日、月，前星后山，还有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音甫弗）总称十二章。皇后则是牡丹、百蝶、仙鹤的花纹祺衬衣。臣宰以鸟兽图案表文武及品级。贵妇绣裙以鱼、龙、百鸟朝凤为主，挽袖以山水人物，龙凤花卉点缀其间。

民用的绣花作坊分工很细，有专门刺绣婚丧用品的绣片，如抬灵柩用的官罩，讲究按清制朝衣刺绣的“朝衣罩片”、金龙罩片、五狮同居罩片、狮子滚绣球罩片、二龙戏珠罩片、牡丹花卉、四季花罩片。不论绣何种图案，罩片下边都绣上一尺二的“海水江牙”，五彩万

福流云的浮地，“万”字不到头的金边筒。还有覆盖在灵柩上的“过棺”绣片，上绣团龙、团凤、各种团花，并以金线车轱辘钱串地儿。又如：汉人娶亲用的花轿轿围子，都是彩缎绣花的图案，花色极多，有凤凰垂牡丹、百子图、五狮同居、九狮同居、游龙戏凤、龙凤呈祥、鸾凤和鸣、百鸟朝凤、麒麟送子等。凡是喜轿用何种图案，其仪仗，如座伞就用何种图案，讲究成堂配套。但这种活计线坯大，而绣工略糙，只要远看醒目即妥。还有的绣花作专应庙观内神佛前的幡门幡条、经幢简幡及僧道所披的“福田衣”（袈裟）氅衣等刺绣活。总之，种类繁多，各有所长。

清代，妇女讲究穿绣花衣服，旗人尤甚，绣工讲究精细。自晚清稍染西洋风气，衣尚朴素，绣花作的生意去了大半，只有绣官罩、轿片、伞围子等糙活，生意一落千丈。后由于外国人有收买旧绣片的，且出高价，绣货作才又有所抬头。

绣货对外贸易　实出于偶然。缘估衣行商人收进来绣衣、绣片等旧货，有人携往国外试销，不意竟得善价，一经传开，群起经营。先有人在西湖营开设字号，专营旧绣物，业务相当发达。民

国十年前，相继有二十余户开业。如德源兴、振德兴、德信成、同顺利、广发永，以及后来开业的鸿兴德等，统名“顾绣庄”。无门市，设内局，具有与三里河一带估衣铺内局营业的传统形式。

民国后，绣货由古旧品，扩展到各地名绣。如以绣喜庆挂屏、花卉人物著名的“湘绣”，以绣女礼服、桌围、椅披、幔幛等著名的“苏绣”和“广绣”、“缂丝”、“京绣”等。

出赁幛料铺

幛子是旧京人们送给办红白喜事人家的礼物。幢料大致分贺幛、祭幛两类，贺幛用大红为主，绸缎、丝葛、棉布均可，用于娶聘、祝寿、小儿满月、商店新张或重张开幕等。祭幛以青（黑）、蓝、灰三色为主，多为棉布布料，用于丧礼各个环节，如接三、伴宿。一般幢料尺码为八尺至一丈二不等。人们将题辞写在幛光（斜角使用的大字块）上送给办事人家，以为丰盛的厚礼。

办事的人家如果得的幛子多，挂满棚壁，则显示了自家交际广，人缘好，而且能烘托喜庆或哀悼的气氛，壮大庆吊场面。所以，有的办事人家自己假出

近亲的名义虚设几块、十几块，乃至数十块来点缀场面，尤其商店新张开幕或重张开幕，更兴搞这一套，门前挂上“红”。等于向外界宣传，以广招徕。凡是自家虚设幛子的，一律不向商店购买，而是花少量的钱去幛料铺去租赁。

因此，北京市面上遂有出赁幛料的店铺应运而生，他们置备多种幛料，供事主赁用。他们懂得婚丧礼俗，预备的幛料多而且杂。虽然以大红、青（黑）、蓝、灰为主。但还备有给亡人办周年用的紫色幛料、花红幛料，给祭吊夭亡的少女用的浅粉幛料，还有给新式“文明结婚”用的白缎幛料（用此幛料的多绷上金边红字的贺词）。

凡赁用幛料者，以所赁幛料的等值作为押金，用毕归还时，无污损等情，押金原数退还。否则即有折扣。至于租赁费则按所用幛料的质量、品种、块数、使用日期计算。

出赁幛料铺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行业，离开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即不能立足。所以随着市风的改变，民间红白喜事的从简，这种生意即随之消失。

棚　铺

作为旧京“红白口”行业之一的棚行，起始于明代修建北京城之际。当时拆去元代的旧城，修建北京新城，遍地都是建筑工地。为了给工棚、仓库、场地等临时性建筑防雨避风，都需搭建临时性的围墙或棚帐。于是，棚业应运而生。

历史上，用芦席搭棚的传统很悠久。清朝入关后，兵营、阅兵场，甚至衙署等多为临时性帐棚，不过不是芦席，而是布的，称布棚业，与席棚业并行。以后，二者合一，棚铺成了这一行业的通称。清末民初，北京市内约有大小棚铺两百余家。著名的有，西单牌楼报子街69号的刘记德利兴棚铺、西长安街大六部口的陈记六合棚铺，以及东单北大街的元顺棚铺、北城地安门外的帽儿胡同郑记永泰棚铺等等。

这些棚铺往往是清末以后的驰名大家，专属清宫、王公贵胄家的红白喜事用棚、象六合棚铺，由于有人在宫里当差，居然承应过五次皇室的大买卖。像慈禧太后的两次“万寿庆典”寿棚、光绪大婚的喜庆用棚，以及慈禧、光绪的

"奉安大典"用的灵棚、祭棚。

郑家永泰棚铺独家经营搭"木殿"（一种豪华的丧棚）的大活儿。据说那桐死时就是请他家以特制的木质构件，临时搭出一座起脊的"大殿"，上面还有各种装饰性小兽，像真的建筑一样。旧时什刹海每逢开办荷花市场，沿河的某座席棚，大多由他家承办。

此外，北京普通人家办红白喜事之际，也要根据自家条件，搭个不同形式的席棚或布棚，以便摆设茶座、饭座，招待前来出份子的亲朋好友。

事先，事主要先同棚铺去"讲棚"，然后由棚铺派来工头，到事主家勘查环境，征求事主意见。然后由棚铺柜房定价，并预收定金。为郑重起见，事主与棚铺还要提出工程清单，写清有关情况，价钱，形似合同。棚的价格往往根据规格，级别，使用材料等情况而有很大不同，用棚的事主可自行选择。

京彩局

京彩局就是扎制各种生活用品的模型，用于盛典和红白喜事装饰的手工作坊，它往往与棚业相辅相成。清末民初，朝野上下，无事不彩，无处不彩。其花

素彩活用途极广。比如，皇帝登基受贺、大婚；皇帝、皇后大寿、大丧，以及皇帝迎接外使，接受进贡等。在民间，凡红白喜事都要涉及，以为庆典或丧礼点缀、烘托场面。其规模依经济条件而定。彩子因此也分为软彩、硬彩两类。

软彩只用两三件不同颜色的彩绸结成绣球，挂于门楣，一般多用于二门、棚门、屋门。硬彩是指用竹竿为骨架，扎成的彩牌楼、彩亭等。

旧京棚铺与京彩局为上下工序关系，实际上是一行。棚匠先以杉篙支架，然后彩子匠才能以杉槁架为依靠支搭彩牌楼。彩饰更是一样，棚匠先搭好棚（无论喜棚、寿棚、丧棚）之后，彩子匠再进行装饰。总之，没有棚业作基础，彩子业就无处施展技艺；而棚活若没有彩子业的装饰，也就缺少了活力和气氛。

民国元年（1912 年）双十节，于前门外大街桥头搭起一座五门式大型花牌楼，式样别致，色彩艳丽。它以玻璃鱼缸为柱脚底座，每根立柱均用红、黄、蓝、白、黑五色彩绸包裹。柱顶卧一黄绿色小狮子，顶下横楣上嵌有匾额。横楣下装有木板托儿，上面立着五个立体的模型人：汉人抱麦穗、满人骑马、蒙

人牵牛、回人牵羊、藏人捧哈达，象征着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民国十四年（1925 年）三月，孙中山先生逝世。为此，中山公园搭起了追悼会的灵棚。棚内扎有一殿一卷式的灵龛，龛门上叨出抱厦，探出五佛冠式的挑，上悬长短彩绸、绣球。

在民间，商市开幕、公祭、上元灯会，寺庙祈建法会、道场等活动都可以用彩。但扎彩必须按民间的规矩来做，其图案、色彩依庆吊性质分别使用，有固定套路。

后 记

实事求是地说，本书应该算是常人春先生的专著。因为全书90%以上内容系他亲笔撰写，况且选题也是他同编辑商定的。但是，进入夏季以后，常先生常感身体不适，在精神和体力上难以完成本书的写作。与此同时，他觉得既然已经与出版社签约，所以就应按时按量地完成。

在此情况下，常先生提出让我续写完后面的七篇，并编排出次序和目录，代写前言。尽管我手头也有紧张的工作要做，却依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工作。因为，这不仅体现了常先生对我的信任，而且是他给我的锻炼、学习的机会。事实也的确如此。尽管做这项工作的时间很紧，难以静下心来认真阅读、领会，但我依然从中获得了很大的收获。况且书中的有些内容，平常也听常先生讲起。尤其是承担《北京文化史》（民俗卷）的编写工作以来，经常为此向他请教，因此多少也有了一些积累。而这项工作再一次给予了我学习此方面内容的机会。

因此，在我勉为其难，完成此项工

作之际，真诚地向给予我指导，并提供机会的常人春先生表示谢忱。同时也为自己因力所不及所造成本书在内容、编排等方面的遗憾而汗颜。

今年是常人春先生的七十诞辰，我愿以此工作中所付出的努力，作为一点薄礼，向他的寿庆祝贺！同时也是献给广大读者的一点成果，供大家在阅读、消遣中能有所收益。

高 巍

2003 年 7 月溽暑中